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63期

上海文革专辑（一）

编者说明：

《记忆》自2019年9月起，分为国外版和国内版。国外版为季刊，突出学术性。国内版为不定期，突出资料。国外版有实体版和电子版两种，两种版本都有国际刊号，需要者可以在亚马逊、巴拉巴等网站上订阅。国内版沿续原来《记忆》的编号，但是没有国际刊号，也没有实体版，只有电子版。凡本刊会员都可以得到国内版的电子版。

戴立清回忆录（未定稿）¹

整理者按：

一、戴立清，1937年生，2019年5月逝世。文革开始时，戴是上海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改名为标准件材料一厂）电工。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在厂中首先写大字报批评厂党支部领导的错误，并组织成立战斗队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1月6日，戴组织的江南厂战斗队代表，参加了筹建“工总司”的会议和以后的筹建活动。11月9日，戴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安亭事件”后，作为江南厂造反队的代表，戴成为“工总司”的“筹委会”成员，并任总部一些部门的负责人。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市工代会）召开，戴当选为“工总司”（市四届工代会）委员。73年4月，上海第五届工代会召开，戴当选为市总工会常委，后又兼任上海后方基地工会主要负责人。

戴立清能认真学习和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政策，他有很强的组织、协调和工作能力，不怕困难能吃苦。在担任重要职务后，有很强的责任心，努力做好所担负的工作。在上海文革工人新干部中，他是个优秀代表！

二、这份《戴立清回忆录（未定稿）》在初稿写出后，戴在征求有关人员意见后作过修改，改稿再次征求意见后，本拟修订后定稿的，却因他身体健康状况日差而无法

¹ 本期稿件由上海文革学者李逊女士提供，其编辑排版亦由李逊女士完成。谨此致谢。

完成。为了完成戴立清的遗愿，我们根据征求意见稿整理后，作为“未定稿”发出，供关心过他的朋友，以及感兴趣的朋友参阅。

对整理(修改)部分，如有问题，由整理者负责。

1. 整理的原则是尊重作者的意愿，凡涉事实和作者观点的部分，都不改动。

2. 对原文所述，需作说明的，或所述有误，或疑有错的，在所述处加注，如【叶注：……】。

3. 对原文中明显的错、漏字已作改正，标点符号使用不妥的也作了改正。对有些分段、断句，在不违原意下，有所调正。对同一事，前后都有叙述的，也在符合原意下，酌情合写一起。原文中有些句子很不通顺，或缺头少尾的，也都在不违原意下，酌情补全、修改。

4. 原文中(特别是第一和第三部分)，有大段引自中央文件、社论、文章的内容，视情摘留有关内容，其余删去。

三、这份整理后的《戴立清回忆录》(未定稿)，专请李逊女士作了校对和格式化规范，特此致谢！

叶昌明

2019.6.12.

目 录

引子

一、革命造反，我在“工总司”

造反前后

参加“工总司”

上海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

“一月革命”夺权

解决内部争权问题

·解决“联司”和“支联总部”问题

二、组建工宣队，任职市科技组

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

组建市工宣队办公室

任职市革会科技组(三办)

上海科技系统的变化

建立市科技“5.7”干校

清队运动的问题

全面落实政策

工宣队中的标兵徐松宝。

与国防科委的关系

科技交流

上海科研的成绩

结束语

三、负责上海王维国专案

接受新任务

材料组的工作。(线索来源和重点, 所得材料)

上海小组问题

中央办林彪罪证展览

关押刘松林问题

结束在“材料组”的工作

四、任职上海后方基地(小三线)

引子

接受新任务

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的概况

联合厂的问题

解决单位小社会的困难

抓革命促生产, 推动各项工作

后记

五、杂谈

引子

文革运动已是现代中国的一段重要历史，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革命造反派，就是这段历史的产物。任何事物的出现都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绝对地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唯心主义的。应该对这些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认真总结，回味它给予人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事隔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觉得旧事重提，不再会那么感情用事，对人和事的观察、分析也不会那么固执。能比较冷静、客观地回顾历史，能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那种捕风捉影，以偏盖全，强加于人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于事（世）无益。有人讲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你打扮，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种现象也不足为怪。出于某种压力或某种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甚至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也是时有发生。这种人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到头来只能是身败名裂，逃脱不了千夫所指。

既然讲历史，首先要讲事实，当然也免不了讲自己的观点，至于论点正确与否，看是有道理，有无事实根据，后人会予以评判。某些人一时得势，不择手段，借用政治需要，讨好当权者，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并不鲜见。以什么“高志杰”、“叶永烈”等等为名的“文人”，居然堂而皇之的造文章出书，有的刊登在杂志上发表，可悲可叹！再者谈论任何事，总该有个时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孤立的评判某些事物是非与否。比如，不能用当今的科学进步苛求先辈的无能。任何时代的人，他总受到历史时限的束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既包括你，也包括我。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我写这些，不过是对自己的往事进行剖析，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当然，我也得承认，自己所写的东西也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所讲的观点和结论与今天社会所灌输的论点会出现距离，甚至对立。但我可以讲，自己是以对历史负责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即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回顾往事，写下自己的回忆。当然，毕竟因事隔年久，且人已到老年，回忆往事时很可能出现一些错漏之处，望知情者指正。

一、革命造反，我在“工总司”造反前后

1. 江南金属制品厂概况

江南金属制品厂是个金属拉丝厂，都跟圆铁、钢筋打交道，全厂大小行车有十多台，一台35千伏安的变压器，55千瓦大功率电机多台，大小电器有二百多台，用电量很大。因生产任务重，设备的利用率较高，保养维修和更新的任务很重。我当时在厂里还只是个临时工，但又是厂里唯一的电工，还兼着机修工，带着两个徒工负责全厂设备的维修，所以我因工作关系在厂里各处都得跑。当时各车间班组的竞赛很热烈，很怕设备有毛病而影响他们完成任务，因有求于我故对我很客气。而我自己应做的工作从不马虎，只要设备一出故障，我随叫随到，有求必应，不论何时必到现场认真修理。因此我在厂里的人缘很好，师傅们有什么事也愿向我讲。除了白天在厂里忙着生产，晚上我还要去技校读书“深造”，整天忙忙碌碌的。

2. “四清”和“文革”工作队

1966年初，上海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已全面铺开，我们这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也由市机电一局直接派驻了社教工作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就改名为文革工作组。开始仅是组织大家看电影《槐树庄》、《夺印》，又开大会小会动员、讨论，找人个别谈话，内查外调。只见干部们、党团员们个个面部紧绷着，也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开大会，就点事不点人名，算引而不发，要大家评议和检举揭发。

这个厂是由几家个体作坊和私营小厂“合营”起来的，一些私营小厂和个体作坊的老板都留在单位里任职。上级派了党支部书记、厂长和人事干部，人数不多。但是一些干部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各自拉小圈子。由于历史原因，厂党支部书记借用工作组的力量，在党内开始整抓生产的厂长。书记是店员出身，有点文化，是年轻的单身汉。厂长是工人出身，平时埋头抓生产，经常见他穿了工作服跟工人一样上班。凭心而论，厂长工作勤勤恳恳，非常辛苦，除了上面要他开会，否则厂里哪里忙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对厂里的每一个职工，他都利用星期天进行过家访，很是难能可贵。相比之下，厂支书和工会主席就逊色多了。对这样一个实干的厂长，书记却说他觉悟不高，不突出政治，给他扣了不少的帽子。厂里的老工人、师傅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纷纷向我谈论。

厂里的运动又从整党内、整干部转向了整工人群众，也就是整他们认为不顺眼的人、不听话的人。为此，要运动群众，形成声势，造成气氛，工作队和支部书记就选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定为“积极分子”。他们利用这些“积极分子”，经常召开小范围的会议，支部书记和运动的负责人赤裸裸地抛一些人的档案材料：有指名道姓讲某人是参加过汪伪军的“黄狗子”，某人是“一贯道”的头子，某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挖社会主义墙脚贩卖香烟票，某人对社会主义不满散布旧社会资本家的糜烂生活等。这样做目的是让这些“积极分子”们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打手，写大字报“揭发”，开会发“炮弹”。这样使厂里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不敢声张，任其摆布。

可笑的是，我这个后来的叛逆者，这时正由厂里上报到公司、局里，要代表厂里参加机电一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工作组和工会找我这个临时工谈话，让我写总结，写如何活学活用的上报材料。但这个时候我却是在想，这次运动究竟搞什么，怎么搞？总觉得方向不明，目标不清，不大对头。本来大家生产上热火朝天，人们之间的气氛还算融洽。而厂里的运动，硬是把人们的关系搞得复杂化，相互之间不敢信任，各自都防一手。怕不知什么时候讲一句错误的话，无意中做一件错事，给自己带来麻烦。

1966年8月某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共中央十一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通过学习全会公报和《十六条》，认真领会党中央的精神，使我明确了文化革命的性质和重点对象，感到厂里运动整群众的方向是不对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也就是各级领导中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让群众来揭发评判。可领导者们谁有这样的素质和气魄，会让群众来评判自己呢？党中央的重要精神怎么才能在厂里落实，厂里的文革运动该如何发动群众，才能按正确的大方向深入发展呢？就在这时，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掀起了红卫兵活动的热潮，特别是红卫兵的大串连也带动了各地文革的发展。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了上海，他们在各学校串连，也到了一些工厂调查了解情况。

我厂对面就是华东纺织工学院，那里接待了许多北京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其中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来我们厂了解运动情况，也联络了以我为首的一些造反派，向我们宣传了许多中央领导人有关文革的讲话精神。在当时政治气氛的熏陶下，我们厂里几个有相同看法的年轻人，在相互交谈中有所了解后，已暗中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大

家根据我厂的实际情况，议论怎么揭开厂里“文化革命”的盖子。1966年8月25日，由我执笔起草，贴出第一张批判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标题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贩卖资本主义黑货的我厂上层建筑——党支部》。大字报的内容是厂里一些老工人给我们提供的，从支部书记本人的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从工厂所有权的性质到厂领导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多方面以事实进行揭发批判。这张大字报拉开了我们革命造反的序幕，我们的“战斗队”也由地下转为公开，正式以“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出面。从此以战斗队的名义，不断写出有份量的大字报，也得到了许多老师傅们的支持和群众的关心。

3. “8·31”夺权事件

厂里发生了一起群众出于义愤，把党支部书记“扫地出门”，要他交出支部办公室的钥匙，去车间参加劳动的事件。1966年八月廿八日，也是我们战斗队公开造反后的第三天，厂里出现一张大字报《我的控诉》，写大字报的人就是被党支部书记提拔重用的“积极分子”，被工作组批准脱产抽调到党支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女艺徒。她的大字报内容具有爆炸性：她揭露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让她脱产整天在办公室陪着他，经常对她行性骚扰调戏之事。而平时为了遮人耳目，让她整理、抄写群众贴出来的大字报，然后分门别类，对号入座，收入各人的档案里。也就是工作组进厂之后，党支部书记对看不顺眼的人，头皮翘、犟头倔脑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抛档案，再让“积极分子”按他们的意图造舆论点名，达到整人的目的后，再把这些大字报内容整理放入各人的档案。这种手段相当卑鄙，也是他历来惯用的手法。

这个支部书记，就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利用自己的一点点权力，从心怀鬼胎引诱调戏发展到对女艺徒动手动脚。支部书记对女艺徒大献殷勤，常给她买零食、买饭菜到办公室内吃，把自己的银行存折拿给女艺徒看。还约她外出玩，甚至到女艺徒中午休息的地方强行不规。这个女艺徒，因父亲是个小资本家被抄过家，对党支部书记的行为怕得要死，碍于面子又不敢声张。

对这表面上道貌岸然却口是心非的伪君子，“造反派”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我的控诉》大字报一出来，成了发动群众的活教材，等于党支部后院起“火”。全厂群众在“造反派”的带动下，纷纷表示不能容忍这样的党支部书记，于是鼓动一些党员和厂长、副厂长把支部书记赶出党支部办公室，要他交出钥匙、印鉴，下车间劳动。

这一行动是在女艺徒大字报贴出后的三天出现，全厂称之为“8·31夺权”。在全市来讲这也是比较早的造反行为，工作组诬之为江南厂的“台湾小政变”。

“8·31”事件被工作组迅速上报，从公司到局、市里，《简报》上报后惊动了某些权威人士。这还了得，作乱反上，必须镇压。在上级工作团的支持下，把被赶下去劳动的党支部书记请了回来，又是发动“积极分子”，又是找党团员个别谈话，对造反派则大字报围攻和大会小会上纲批判，这种“泰山压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使厂里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扬言有地、富、反、坏、右的破坏，还要工会和团支部组织人到我家去抄家。但厂里大卡车驾驶员是我们的战斗队员，他不愿开车。同时几位耿直的老工人也讲话了，戴立清是地主还是反革命？你们去抄家的根据是什么？这倒提醒了这些“积极分子”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幕后指挥的党支部书记无奈作罢。

由于我们得到了大多数职工的支持，党支部书记尽管有工作组和上级公司撑腰，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整我们，只能虚张声势地不指名道姓的含沙射影。厂里双方就这样形成了僵持状态，而每当造反派们外出串联时，党支部书记和他的骨干们也就忙于叮哨、跟踪。厂里群众刚起来这样被压下去了。

4. 赴京上访

造反派们心有不甘，就到厂对面的华纺工学院接待站，邀请北航“红旗”的红卫兵来厂指导，这使厂里一些人感到了惊慌。但这样搞无非造造舆论以给造反派鼓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还白天上班，晚上就去上访，从公司到局里再到市里逐级上访，这种上访虽说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但是使大家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我们一次次到市接待站和静安公园看大字报时也结识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后来一起筹建“工总司”的一些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北航“红旗”的红卫兵鼓动我们到北京上访，于是厂“战斗队”决定选派我和房有柱老工人（烈士子女）去北京，钱不够大家凑。两人带上行李，买了车票于1966年9月下旬离开上海。【叶注：9月下旬到11月9日返沪，在京四十多天？与后面讲的半个月有矛盾。】在我们离开之前，战斗队写了《声明》，由留在厂里的队员，在火车离开上海之后贴出。

两个人初次到首都，车站人山人海，到处设立的接待站，到处排起了长队，等待登记接待。我们背上行李跟着人群，也不知排了多久，总算凭厂的工作证进行了登记，

但明确告诉我们接待的时间安排在1966年12月3日，给了一张纸条让我们到水电部招待所。我们人生地疏，总算找到水电部的招待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到北京航空学院，找我们在上海结识的两个大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他们。听我们讲了情况后，就要我们搬进他们的宿舍，相互好照应。于是立即赶回招待所取了行李，住进了北航的学生宿舍。

之后我们就到附近的大学等处看大字报和抄录好文章，感到遍地皆是资料，令人目不暇接。北京文革运动的声势之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种种使人激动的场面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我想到各个工厂里势单力薄的造反派也应该联合、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进行斗争。我们及时把看到的和学到的发讯给厂里的造反派。我们还借了铁板和蜡纸，把在厂里写的大字报进行整理刻印成册。我负责刻写，房师傅印装，有十几篇材料二十多页，装钉成册后请北航的朋友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住了半个多月，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去“就地闹革命”。

一天半夜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楼上楼下吹哨声大作，一看表只有三点多钟，让我们起床到楼下排队，都是部队的同志在指挥，给每人发了两个大馒头作干粮，说是去受首长接见。我们跟着人流，有秩序的上了车，车开开停停，等天亮下车时看到是西直门。又不知转了多少圈，随着满街的人群队伍到了天安门。坐在地上等了很久，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了讲话和口号声，这才知道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叶注：经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应是11月3日。】但因为距离较远，我们只能看到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们的不太清晰的身影。当然，这也应算是我的一种荣幸。

【叶注：以上原文中提到的“造反派”，都据实改为“战斗队”，不是讲组织的改为“造反派”。下面参加工总司后，组织就称“造反派”。】

参加“工总司”

1. 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

1966年11月9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我和厂里的房师傅是九日早晨从北京乘火车抵达上海站的，在出口处见到“工总司”《海报》说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欢迎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两人背上行李先各自回家，又立即同厂里的造反派取得联系，得知我们厂战斗

队的王汉清参加了“工总司”的筹建活动，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大会下午要在文化广场召开。我赶到文化广场后找到了我厂造反队的人，还见到了一些“炮司”和交大、复旦等学校的红卫兵，还与王洪文、潘国平、岑麒麟、黄金海、陈阿大、张宝林、蒋周法、谢鹏飞等等一些后来才知道名字的人员见了面。大会秘书组本打算让我介绍一下北京的最新情况，后因会议中发生了混乱就没介绍。

上海“工总司”是由17个单位发起筹建的，我们厂是其中之一。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先在愚园路一幢别墅里召开了17个单位造反派的座谈会，商定筹建“工总司”组织，起草了成立宣言，决定了开成立大会的日期，还准备了几个单位在大会上控诉资反路线的发言。

9日下午的成立大会先由潘国平主持，会上宣读了“工总司”成立《宣言》，铁路局蒋周法和谢鹏飞作了控诉发言。会前曾通知市委“康办”，要求市委负责人出席大会听取群众的揭发控诉，而他们采取不理睬态度。会中曾发生混乱，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还冲上了主席台抢话筒，使大会发言一度中断。然而各单位来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保卫着会场，让会议继续召开。会上发言的人拿出血衣，露出被打的伤痕，控诉工作组和厂里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激起了参会革命群众的愤怒。

大会之后大批人群跟随着一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的大红旗，一路游行到了市委机关大楼(延安西路33号. 现贵都大酒店)，要求市委负责人出来接见，进行对话。我是厂里电工，在对面28号的房门顶上，安装了扩音喇叭进行宣传。马路上站满了人，与大楼门口保卫人员蘑菇了几个小时后，传出消息讲市委领导在友谊电影院接见。于是人群又随一面大红旗向南京路展览馆而去，可到了友谊电影院，这里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接到通知。工人们绝大多数只穿着单薄的工作服，也没吃晚饭，天上还下着小雨，挨饿受冻等了这么长时间，却是这么个结果。这时有传说：周总理来电指示，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可以到北京来……。又有人呼喊市委负责人根本不在这里，市委领导不接见，我们上北京去。这样大旗一挥，大批激愤的人群就从南京路展览馆涌向了北火车站。

人群冲进了火车站，到站台后见了空的列车就涌上去，整整两列空车厢挤得满满的，而站台上还有不少人。“工总司”和红卫兵的代表找车站领导谈判，他们先是拒绝派车，过了段时间又通知同意分批放行北上。拖到凌晨五点多，第一辆满载的列车开出了上海站。我们厂里的“造反队”除个别人上了第一列车，大多数人在第二列

车。等第二列车开出之后，我就回了单位。因为厂里的一辆卡车被“工总司”借用，还停在车站外。我是刚从北京回来，厂里不能没有人，因此。我把汽车开回了厂里。

2. “安亭事件”

9月10日中午，我正在厂里上班时得到信息，第二辆列车上午8点多钟被停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火车头开走了，岔道也锁掉了，大批北上的造反派人群就这样被困在安亭车站了。人们经过一夜的折腾，饥寒交迫，有的人因疲劳和饥寒而昏到，造反派们只得分头联络附近工厂和找当地农民求助。我赶到安亭已是下午6点钟了，车站内外皆是人群，大家对上海市委这种倒行逆施义愤填膺。此时上海市委开动权力“机器”，指使各系统、各部门派出大批的干部来到现场，企图劝说北上人群返回上海，回到本单位去。这时也有不少的单位把馒头、面包、饮水送到列车旁，有的是支持鼓励造反派们的革命行动，有的是劝说造反派回单位。有的厂领导到现场后，甚至用威吓手段，似劝带拉的办法让列车上的人回去。在列车上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们商量，我们被围困在这里相当被动，应该派一部分人立即赶回市区，把这里的真相告诉广大市民，争取支持，留下的继续斗争。

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派张春桥来沪处理。11日深夜，张春桥到上海后就直赴安亭，很快就同现场的广大群众见面，听取在场人们的意见。就凭这一点，敢于接近群众，到群众中去，无形中就缩短了双方的距离。而市委一些领导人截然相反，他们害怕群众，躲在背后专出馊主意，玩弄甚至镇压群众。张春桥听取了造反派们对市委搞资反路线的控诉，又与“工总司”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商谈解决的办法，他按中央的精神极力劝说北上人群众返回上海，并表示他一定会解决好此事的。王、潘等人商议后决定听取张的意见，12日下午带领了大部分北上的人群返回上海。13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又与工总司代表商谈后，签署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也即承认了“工总司”组织的成立。

王洪文等决定听从张的意见，带北上队伍回上海。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由于不相信上海市委，也怀疑张能否处理好，决意要继续北上。在步行北上的途中，还选出耿金章和孙玉喜等为他们的头头。他们步行到苏州，在一所中学休息时，“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根据张春桥的意图，赶到苏州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后张又亲自到苏州找了耿等人谈话，并签署了他们提出的五条要求，终于把这批人群领回上海。

而 11 月 10 日从上海开出的第一列北上火车，到了南京就不再向前走了，把车上的造反派留在南京，当时也有一部分队员继续北上，沿着大运河北上，先头部队已经走到了六合。王洪文等人又去南京，介绍了张春桥签署“五条要求”，承认“工总司”组织的情况，把大家劝返回到上海。

后来，南京回来的某些人自称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苏州回来的某些人自称之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一、二兵团出现后，他们拉队伍发展得很快，并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半独立性，甚至发展为与总部的对抗，这就使工人造反派有了分裂的危险。

3. 我到“工总司”工作

“工总司”17 个发起单位各派出的一名代表，成为总部最初的领导班子成员：上棉 17 厂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822 厂岑麒麟、31 棉纺厂黄金海、五一电机厂丁德法、保温瓶二厂范佐栋、铁路装卸机械厂蒋周发、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良工阀门厂陈阿大、147 服装社徐美英、沪光灯具厂黄文海、江南金属制品厂戴立清、建工基础公司张宝林、有色金属压延厂孔繁胤、大德拈线厂陈金星、人民电器厂张伯生。“安亭事件”后，经商议推选出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耿金章为总部常委(后范、耿因故去职，只有 5 个常委)，王、潘因是成立大会的两“主席”，也就成了总部的第一和第二负责人。

总部的组织机构有：秘书组、组织组、后勤组、保卫组、宣传组等，以及造反报。“工总司”从筹备在愚园路（乌鲁木齐路口），正式成立设在巨鹿路 691 号内，不久又转到杭州路的纺织技校，再搬到市政协等不断转移。多数的活动还是在国棉 17 厂、31 棉等地，各自发展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在“一月革命”夺权期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工总司”为什么不可以搬进上海市总工会呢？于是搬进了市总工会大楼，以后再没动过。

开始，我还坚持天天上班，业余闹革命。我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我又是“工总司”领导班子成员，还是“工总司”秘书组负责人，保管着秘书组的公章，一般对外联系工作大多用的秘书组公章。在这时，我已离开厂里，全天待在“工总司”工作。

造反队与赤卫队的斗争

1. 赤卫队的成立

“工总司”组织经过“安亭事件”的斗争终于获得承认，于是上海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就授意组织起了“上海工人赤卫队”。11月中、下旬，一些单位中反对张春桥承认“工总司”和反对造反派的人，在市委负责人的支持下筹建上海赤卫队组织，并同时以此在社会上活动。12月6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赤卫队总部，还发布了成立宣言。上海市委一些负责人支持“赤卫队”，是想利用这个御用组织来同造反派进行对抗，也是为了保市委。而这种组织不符合文革的大方向，也就没有战斗力，“赤卫队”经过“《解放日报》事件”、“色织廿四厂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后，就彻底垮台了。

2. “《解放日报》事件”

“赤卫队”在社会上组织了几次大的行动同造反派进行较量，第一回合就是“《解放日报》事件”。那是1966年十二月一日，当时上海“红革会”的报纸，是造反派非常欢迎的《红卫战报》，它经常传递一些文革的动向和中央领导的精神。他们想扩大宣传力度，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夹在一起发到全市各用户。《解放日报》社根据市委的指示，当然不肯这样做。为此双方闹起来了，一些红卫兵便进驻报社阻拦《解放日报》发行，报社就此停止印刷。正在筹建中的“赤卫队”大批人马包围了报社，他们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冲击报社的大门和窗户。“红革会”进驻《解放日报》社是他们的独自行动，事先没有同各造反派组织商量。

事情闹大之后，“红革会”向“工总司”求援。王洪文立即召开会议，王洪文认为虽然事先没同我们商量，但是《红卫战报》是我们“造反派”的报纸，这个行动应该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工总司”派一批人进入报社支持“红革会”。“赤卫队”人群把《解放日报》社外道路全包围起来，报社内的造反派被围困在里面，一方在外猛力冲击，一方在内坚决守卫住。这时只有报社后面一条小弄堂里的小门是唯一对外联系的通道，里面的吃用全靠外面从这里送进。“工总司”办公室的姚志诚利用华东物资局机关造反派的车辆，搞好后勤供应，运进了一批批饼干、面包、榨菜等急需物品。上海市委迫于压力，只得派王一平、宋季文与造反派会谈，在十二月五日签字同意了

“工总司”和“红革会”的要求。

谈判已告结束，斗争达到预期的效果，王洪文决定马上撤出报社。但面对外面大量的“赤卫队”人群，如何将里面的造反派接出来？我和王洪文，还有总部宣传组的王腓利，以及二兵团耿金章又一次进入报社。这时里面的红卫兵和一些工人造反派已组织了“火线指挥部”，王洪文传达了谈判结果，与他们商量队伍撤出报社问题。“火线指挥部”的一些人坚决反对撤出，说王洪文是逃跑主义，他们的要求是长期占领，控制舆论阵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洪文决定“工总司”的造反派撤出。

但要撤出报社并不简单，首先要解决的是在汉口路大门外的层层围攻人群，如何使他们能让出个通道。“工总司”不理睬报社内一些人的反对，通知“二兵团”调动队伍，不戴袖章、不打旗帜，由王腓利负责联络带队，整个队伍在西藏路福州路口集中，分四路纵队走向报社，沿途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他们走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大门外，先把两头道路截断、守卫，然后打开大门让报社里的造反派安全地撤出报社，就这样结束了“《解放日报》事件”。还留在报社的一部分人，后也全部撤到交大校区，还成立了一个由孙福祥当头的“战到底”组织，但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

3.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

上海西区的古北路有家色织 24 厂，离我们厂不远，也是我妹妹所在的厂。在 1966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叶注：据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中的有关注释，应是 12 月 8 日前后的事。】我回到厂里后就听到造反派讲色织 24 厂的造反派来告急！因该厂造反派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求驻厂工作队交出运动中整群众的黑材料，但工作队一直没有交出，而是按照市委的布置要把工作队撤掉，想溜！此前“工总司”也曾发出通令，要求造反派警惕上海市委的新阴谋——撤走工作队，工作队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得到清算和批判。现在该厂造反派不让工作队撤，而“赤卫队”帮腔工作队，造反派人虽少但心很齐，他们占领了工厂大门和门房不许工作队撤离，并向附近厂的造反派和区联络站告急求援。

我听到这个情况后同厂造反派的人到了色织 24 厂。该厂造反派控制着大门，我就以“工总司”代表名义找厂里的工作队负责人了解情况，却遭到该厂“赤卫队”和工作队围攻。我退到门房，把厂里的情况向“工总司”值班的同志汇报。大约在一个小

时后，有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打着造反派旗帜，跑步来到24厂。这支队伍的领队是“一兵团”的一个人，名字我叫不出，他说接到总部通知就赶来了。我把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让他注意矛头不要对着群众，主要责任是厂里的工作队负责人，把工作队队长找出来，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祸首。根据“工总司”的要求，工作队必须清算搞资反路线的罪行。这时区联络站也来了队伍增援，厂里力量对比的形势突变。我们临时在厂门口，找来工作队队长和工厂的副厂长，要他们承担今天事件的责任。当我听到市里“赤卫队”和区“赤卫队”已经聚集在天山路，正向24厂来时，为了避免双方发生冲突，我迅速让“工总司”和区里的增援队伍撤出厂里。厂里的造反派继续留在厂里，坚持斗争。我随增援的造反派撤出厂区，走时把工作队队长一起带走。

当天晚上我随市工业党委杨怀清和“工总司”的代表为解决色织24厂问题重新进入厂区。全厂里外上下全被市和区来的“赤卫队”挤得满满的，他们依仗人多势众很是神气，我们去的代表到了厂里就被分割开来进行围攻。有一个市“赤卫队”的头头自始至终“陪”着我，在我坚持要求下去看了厂里的造反派，厂造反派人员全部被赶到厂后面一个小仓库里，不许他们自由活动。到第二天下午，我见厂后一条小河的对岸也挤满了人，为了把里面的情况能及时通报出去，我就手写张条子，用女工们扎头发的橡皮筋做成弹弓把纸条弹过河。也不知是不是这条子的作用，到晚上六点多钟只见原来陪了我一夜的市“赤卫队”头头匆忙来找我，非常客气地把我带到厂门口，只见厂里的“赤卫队”也不是那么神气，门口进出也随便了。我的母亲出现在厂门口，冲过纠察进来拉住我，还要找女儿，我把她带到后面相见。母亲拉着我和妹妹就往厂外跑，谁阻拦也不听。这时这个市“赤卫队”的头头始终跟着我，一起出了厂门。路上挤满了人群，走到天山路不到，迎面见到区里的造反派，沿途都打着造反队的旗帜。这次事件中，据说总部共调了五十万造反派，他们让我到沪西体育场，那是现场指挥部。我让母亲和妹妹回家去，那个“赤卫队”头头不知何时把袖章取掉了，我也让他回去了。

色织24厂事件中，原来在那里的“赤卫队”不攻自溃。这件事锻炼了造反派，大涨了造反队的志气。这件事完全是工作队搞出来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煽动厂里的“赤卫队”无理取闹，借机把事态扩大。他们有权在手呼风唤雨要把水搞浑，而大多数人出于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只是跟着跑，结果变成站错队，这也可以理解。

【叶注：我认为戴的上述回忆是有误的，因戴原文没有讲清几点：一是戴第一次

到该厂后是什么情况，厂里有否外来支援的“赤卫队”？因我记忆中，当时是戴在24厂被赤卫队围攻后才求援的，而照文中所述只是本厂“赤卫队”和工作队，那这个人数不会多的（这是个小厂，按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书中所写“赤卫队”人数只有二百来人），戴为何求援？再说在戴求援后，总部派来了约二百人，后区联络站又来了增援队伍，戴带了这几百人队伍撤离的原因，是已知赤卫队在天山路有大批队伍向24厂来后，而当时的古北路很短且是断头路，只能从天山路进出，那双方队伍应碰头了。就似戴二次出厂后就在天山路碰到造反派一般。二是戴为何又要再进该一个厂？（按《革命造反年代》书中描述，戴是连续被围二天，不是出厂而再进厂的。）他是已知大批“赤卫队”要到该厂而撤出的，这时又主动进去干什么？文中讲是为解决24厂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本来是为撤工作队事而矛盾的，而工作队长又已被戴带出厂了，他进厂去找谁谈呢？三是戴讲他们第二次出厂时，走到天山路口已碰到来支援的造反派，且沿途都是造反派旗帜，24厂到天山路只有短短的几百米，而要到沪西体育场却很远，两派的队伍眼看很快就会接触，很可能发生冲突，戴作为总部代表怎么能不管而走呢？再说戴到了沪西体育场指挥部后，又是怎么处理了结此事的？四是文中讲总部这次调了五十万造反队员，这在当时绝无可能调这么巨量的队伍。其时工总司的组织尚初建，参加造反派尚属冒险的，造反派总人数不可能很多的。赤卫队也只号称八十万，造反派倾巢而出怕也没五十万的。如真调了这么巨量队伍，总部头头自王洪文起都要出动了，而戴文中没提到一个其他人。在我记忆中，“色织24厂事件”远不及“《解放日报》事件”的规模，但因我没参与此事，无法讲清此事情况。】

4.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

12月23日，曹荻秋参加了“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签字同意“赤卫队”提出的明显针对造反派的“八条要求”。

12月25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大会，曹荻秋在会上表态，宣布原同意赤卫队“八条要求”的签字作废。为此“赤卫队”总部从27日开始，调派大批人员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占领了各办公楼，甚至还进入了柯庆施遗属家和张春桥的家里。他们要曹荻秋出来谈判赤卫队新提出的要求，并有头头宣称若上海市委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全市将要“三停”（即停水、停电、停交通）。“赤卫队”总部头头同时还在策划要赴京控告“工总司”的“罪行”。

对于“赤卫队”冲击“康办”的行动，“工总司”和各造反派组织一开始是不予理会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赤卫队”与市委的内讧。但第二天(29日)一早，“市机联站”负责人徐景贤邀集全市各大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开会，徐向大家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大意是“赤卫队”也要批市委了，造反派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让“赤卫队”抢去胜利果实。徐要求各造反派组织赶快采取行动，要与“赤卫队”针锋相对。“工总司”总部和下属组织很快就调派队伍去康平路，我和王洪文先到五原路的“二兵团”找了耿金章商量，然后又同“机联站”和各红卫兵组织在衡山饭店商量对策。各组织分头行动、调动人马，把康办四面全部包围，再对“赤卫队”人员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他们。12月30日凌晨2时，开始对占领康平路市委机关的“赤卫队”进行驱离，到早上6点左右全部结束行动。我到机关院子里查看，在一幢大楼内发现了我厂几名“赤卫队”员，我要他们交出袖章、丢掉手上木棍后让他们回厂去。

因为“赤卫队”挑起“康平路事件”，还企图搞“三停”，“工总司”在12月31日向各区、县下属组织发出了特急通令，要求各单位把区县以上的“赤卫队”头头抓送公安机关。有人说“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搞的大规模武斗，“赤卫队伤了91人”、“打得血淋淋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赤卫队”、造反派都调动了大批人，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主要是强大政治攻势瓦解对方。

在“康平路事件”的同时，“赤卫队”又在闸北公园结集了几万人，进行所谓的北上控告“工总司”。康平路事件结束当天下午，“工总司”决定要“二兵团”耿金章解决此事。在12月31日下午，“工总司”造反派人马追到昆山，把“赤卫队”围起来，抓了“赤卫队”的头头，又劝返了绝大多数“赤卫队”群众，“昆山事件”宣告结束。

“一月革命”夺权

1. 接管两报和“1·6”人民广场大会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社夺权，二报都是由报社内部造反派接管。1月5日“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谴责了“赤卫队”破坏生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

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个大会原定是“工总司”潘国平主持，临开会了，不知潘国平在哪里，没到会。结果大会临时由我主持，我是既高兴又紧张，反正稿子议程都写好的，我照本宣科。

毛主席在1月8日，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把毛泽东的讲话，刊登在1月9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里，并经毛主席审定。

2. 反经济主义风和中央贺电

1月9日“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的《紧急通告》发表。此时，上海市委和各区县局的一些领导人在被打倒之前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一些领导乱批条子，随意增加(补发)工资和补助费，任意提高劳保福利待遇，滥发各种物资，肆意挥霍国家财富。到各银行取款的人竟排成了长队，社会上还发生了强占公房的歪风。如此种种歪风邪气严重干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为此王洪文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发出“紧急通告”，并采取措施派人到银行监督停止滥发现金，号召各单位造反派把牢单位的关键要害部门，并责令市委有关部门、市公安局执行。文汇、解放二报对此作了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1月10日毛泽东对上海的《紧急通告》作了批示，并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了贺电：“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中央又发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1月12日“工总司”和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后，各单位接管夺印，批斗顽固坚持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港务局造反派把交通部北方区局的局长李广押送到工总司来，当时总部在杭州路纺织技校，我接待了他们，收下了李广，劝大家回去。然后，我同范佐栋把李广批评了一顿，让他紧跟形势，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让他回去了。隔了二天，海运局造反派把劳动模范杨怀远押到总部来，说他是“赤卫队”的顾问。留下来之后，我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态度非常好，然后也让他回去了。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批准了上海的夺权！毛主席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

1月26日，毛主席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2月3日，毛主席接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但我们一开始时并没意识到这是夺权。我们只是认为各级领导人利用权力，不坚持原则乱批条子、乱发钱物，是错误的。为了不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造反派就去制止、接管，这样在全市各系统很快地形成一股接管风。当时，不少单位造反派为了不让当权派批条子，就把公章封存起来，还有些单位造反派把收来的公章一包包送到总部来，像轻工局有个公司就把各单位的公章都收来上缴到总部。

3. 建立“火线指挥部”

由于“赤卫队”因“康平路事件”等的失败，对工总司等造反派恨之入骨，组织了大批“赤卫队”人员北上赴京“告状”；而在上海市委某些负责人“经济上可放宽些”的怂恿下，社会上刮起经济主义妖风，许多单位职工拿了补助费外出串连。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工业和交通单位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工厂因大量人员外出而停工，车站和码头积压了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当时据调查全市电厂用煤只有3天的存量，

港口码头积压了 40 万吨货物待运，全市一度处于有瘫痪的危险。

生产不能停，交通不能停，运往各地的物资不能停。工总司和各造反派组织商议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班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迅速组织工厂生产，恢复铁路运输，号召和组织大批造反派群众到码头突击搬运物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支持下，上海文革的形势大好，造反派们扬眉吐气，成为时代的英雄。原来同情和暗地里帮助造反派的，现在敢公开支持了。原来与造反派对立的一些人员也纷纷向造反派靠拢。工总司在王洪文的提议下也发出通告，要求各单位造反派要团结大多数，要善于做工作，欢迎原赤卫队人员回来，不得歧视他们。总部的一些负责人日夜奔波，一有什么事就是半夜三更也要碰头商量的。那时经常集中到国棉 17 厂、31 厂开会，这二个厂我去的时间最多。

4. 解决“工总司”内部分裂问题

在形势逐步好转之际，“工总司”内部却出现了争权和分裂的危机。

在“工总司”建立初期，由于总部机关没有工作制度和活动规范，对总部成员的行事没有约束力，从而产生出一些矛盾。在对“兵团”问题的处理上，总部主要成员间有很大分歧。总部的多数主要成员经常不待在机关里，而且往往也不告知自己去了哪里，有事要找他们很是困难，这种情况也使总部的工作人员很有不满。这给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总部内部接连发生了二件大事。

一是在 67 年 1 月间黄文海串连了一些人，企图成立所谓“双造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他拉拢了总部少数成员和几个区联络站头头开会，以要求撤掉“兵团”为名，提出成立这个新组织，还自封为负责人，写出了成立宣言，妄图分裂工总司。但因遭王洪文和大多数人员的反对，他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是在 67 年 2 月间范佐栋、黄文海等人擅自以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名义在机关大楼贴出所谓“决定”，宣称常委和主要成员必须到机关坐班工作，3 天不来者就除名。这是把矛头明显指向王洪文、潘国平，企图取而代之。

在此之前，范、黄为了控制总部机关，向王洪文夺权，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我。王洪文把工总司秘书组的公章交给我保管，在当时形势和环境下我是把公章随身带着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黄文海通知，让我下午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开什么会也没讲。我跟着他到那里，进门后见到多数人是陌生面孔，少数人是认识的联络站头头，

其中有闸北区分部的马振龙和“八革会”（军工系统八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金仁典。会场上一会范佐栋来了，一会陈阿大来了，一会徐美英到场，人员进进出出。会议从下午直等到晚上还没开，想走又不让走，还让普陀区一个人借口什么事要盖公章，来试探我是否带章在身。他们一会讲王洪文马上到，一会又讲潘国平半小时就到，但左等右等都没来。看来他们也等不及了，就由范佐栋、黄文海主持开会，范、黄他们开门见山要我交出工总司秘书组的公章，而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什么王洪文扶持个人势力，拉“兵团”树实力，什么经常不来总部等等。其它人也吵嚷着我交出公章。

我很沉着地对他们说：“今天这个会是不正常的一个会，因为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参加。不错，公章是在我这里，这是王洪文在工总司会上，当大家面交给我的，如果要我交出来，也应该要由王洪文到会……”。没等我话说完，一个从来未见过的人，把桌子一拍叫喊跟他噜嗦什么，揍他！这时马振龙发言了：今天是总部开各区的头头会，怎么好这样，还要打人？说着他站起来讲：我们不开这个会了。坐在我旁边的“八革会”头头金仁典也发言表示异议。到底是邪不压正，我听了那个人蛮不讲理的话，理直气壮的说：“今天是什么会，谁通知你来的？如果是各区头头开会，今天到了几位？工总的头头们到会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请各位想想，上海两派的势力闹得很利害，我们还没有摆脱危险。外面斗争很激烈，自己内部先斗起来，谁高兴呢？今天的会想让我交出图章，是不可能的，要人我有一个……”。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人出来打圆场说：好了，现在会不开，等潘国平、王洪文来……。

就这样，等到夜里十二点多，不但等不来王洪文、潘国平，原来参加会议的人也一个个先后溜走了，看门的人也没有了，这样我让马振龙、金仁典陪着我，主要保护公章。到了外滩，同马振龙他们分手，我赶到国棉17厂，找王洪文汇报。此时王洪文已经知道，因在对付我的同时，这个“内部造反司令部”在瑞金剧场，纠集了不少人开会，打算用非常手段罢免王洪文，让他交出工总司的公章。这个会，工总司联络组的缪南生知道之后，他出了会场在瑞金剧场门外等候王洪文，把情况汇报了。王洪文立即回转，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

范佐栋等人主要抓住王洪文对“兵团”的问题，他们认为“兵团”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解散。而王洪文为首的认为，“兵团”解散缓一步，在“赤卫队”实力比我们强的情况下，不应解散“兵团”。从表面上看，“兵团”的几个负责人除了对王洪文和我之外，对其他人都不买帐。特别对潘国平、黄金海等人看不惯，对总部的其他人

不放在眼里。

弄清了是那些人在捣鬼的情况，王洪文不动声色，照常工作。在2月底的一天晚上，通知总部所有主要成员在静安区文化馆开会。会上王洪文把前阶段在总部内发生的上述一些事情进行了揭露，面对面的批判，最后宣布清除范佐栋、黄文海出总部，解除了“工总司”内部分裂的危险。范佐栋在这次会上被抓，关了一段时间后放出回厂劳动。

【叶注：范佐栋，上海保温瓶二厂工人，筹建“工总司”的主要成员，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安亭事件”后为“工总司”“常委，被抓放出后回厂劳动。

黄文海，沪光灯具厂工人，筹建“工总司”的重要成员，“安亭事件”后为总部“筹委会”成员，因上述事件被短暂关过，后调手工局联络站工作，又因插手苏南地区武斗和涉“李、戚集团”案被审查，放出后回厂劳动。】

解决“联司”和“支联总部”的问题

在“三结合”夺权时，有些造反派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结合进领导班子，有种失落感。其中一些人便为单位中和社会上串联有相同情绪者，伺机寻衅滋事搞些扰乱活动。各单位中这种人虽是少数，但全市的绝对数也相当可观的，而且他们还得到了社会上各种反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无视新生政权的权威，串联闹事，搞得一些单位不太平，生产不正常，摩擦常发生。他们的活动很快扩大升级，由单位冲向社会，不但企图分裂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总司”，还把矛头指向上海的新生权力机构——市革委会，妄图搞所谓的权力再分配。一场由上海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对“联司”和“支联”分裂势力的严重斗争，在67年夏季的上海展开了。

1. “联司”问题的由来

上海柴油机厂是部属大厂，由地方和部里双管。该厂文革中有两个对立的“工总司”“造反派”，一个简称“联司”，他们的组织关系挂在“工总司”杨浦区分部；另一个简称“东方红”，组织关系挂在“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东方红”组织中，党、团员多，干部多，复员军人多，是典型的多数派；“联司”组织冲冲杀杀有战斗力，但在厂里“三结合”班子中远不如“东方红”得势。上柴厂是部属大厂，有个很大的招待所接待各方来客，所以四面八方来访、插手的人和事也多，两派背后都有人支持，

厂里常常出现两派的冲突。一次在双方冲突中，“联司”一派揪斗“东方红”一派的中层干部（车间支部书记）解福喜，结果这位支部书记死了。市里有关方面作为死了人的刑事案件，抓了“联司”的涉嫌头头。为此，“联司”组织人马冲向社会，在福州路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而“东方红”也不甘示弱，借题发挥，扬言抬尸游行，人民广场开追悼大会。于是两派矛盾陡然升级。

2. 抓“支联总部”

由于“联司”走上社会活动，四方串联寻求支持，从而吸引了一大批各怀目的之人群会聚到一起，组织了一个个“支联站”，配合“联司”搞各种活动。几乎每天晚上在闹市区的人民广场、大世界、南京东路等市中心地带聚众寻衅滋事，进行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这些活动日益发展，一些人也利令智昏，打算成立全市性的统一组织——“上海市支持联司联络总部”（简称“支联总部”）。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联司”的头头杨仲池，交通大学的一名教师全向东，汽车配件厂的陈卜昌。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他们分头准备，打算在1967年8月1日于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支联总部”成立大会。他们想从幕后转到台前，公开拉队伍、竖大旗，以分裂上海的工人队伍。他们还公然喊出“上海必需第二次大乱”的口号，矛头直指市革会，目的是妄图搞权力再分配。

他们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要在1967年7月30日晚上召集各区和工厂的“支联站”头头会议，落实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不幸的是，这个筹备中的全市“支联总部”的组织部长，正是与王洪文单线联系的“卧底”（名字请允许我保密）。所以“工总司”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以及各区“支联站”的头头名单。为了乘“支联总部”召开筹备会议之际把他们一网打尽，王洪文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了“工总司”核心人员会议，具体策划了这次行动和分工：

一是请“上体司”负责人胡永年派体司人员冲进会场抓人，并让陈阿大调五十人在衡山路1号总后华东物资局大院里待命，作为二线力量备用。

二是让王明龙负责调一辆冷藏车，停在华山路泰安路口，等上体司胡永年派的队伍抓到人后，就用此车押送杨浦分局。

三是戴立清坐阵指挥部负责电话联络，其他人都等待行动事态的发展。

整个行动的具体时间等待内线（他们的组织部长）指令，在行动中注意“自己人”

的标记，在晚上七点钟之前，各方面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待命。上面三个地方专门有人不停的来回把信息汇总到指挥部，三只电话统一指挥。

当各区、大厂的“支联站”负责人纷纷到场了，不知是内线的人没协调好，还是误传，行动提前了十几分钟。到会的“支联站”头头都被抓了，塞进了冷藏车。这时一辆老式的英国吉普车开来，车上坐着“支联总部”的头头——全向东、杨仲池、陈卜昌等人。他们看到门口这样的局面，车子没敢停留即溜走了。内线说，车上装的是印发的传单和成立大会的安排。行动的“上体司”人员也没注意到什么“自己人”的标记，把所有人全塞进车内送到杨浦区公安分局。这就是对上柴厂“联司”问题解决前的一个插曲。

【叶注：戴文所指在“支联总部”中的“卧底”，即是与戴同厂的陶国正。陶文革中造反后，曾与姜延良一同组织“野战兵团”，后该兵团撤销，姜进入“工总司”工作和参加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姜参加了这次抓“支联总部”人员的活动，但他看到陶国正也在被抓人员中时，却擅自把陶私押他处殴打。王洪文发现陶不在被抓人中，马上派人追查，才把陶救回。姜也为此被清退回厂。】

3. “8·4” 砸“联司”事件

随着上柴厂内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联司”完全控制了厂区，大批的“东方红”人员被赶出去回不了厂，而“联司”和“支联站”在社会上也越闹越凶。市革会领导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召集各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一致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新政权建立的标志，我们现在是有政府、有领导的，而不再是原先造走资派的反了。必须在新形势下维护新秩序，开展斗批改。出现“联司”和“支联站”的现像，是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集中的反映，他们汇聚成一股反对势力，在社会上大肆活动，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这 不是上柴厂一个单位的问题，这种状况如任其发展下去，上海将会发生大分裂的严重后果。市革会的领导和各大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都表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政权机构，在市革会的领导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新形势下维护好社会新秩序。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全市各个群众组织，于1967年8月3日上午派出代表五十多名，还有驻沪三军“支左”人员代表，以及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记者，共有一百多人去上柴厂，是送给“联司”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本想通过宣传教育，能让

“联司”多数的群众和支持者觉悟，让头头们能理智些。不料，市里派去的各方面代表被“联司”一些人无理的扣押。他们关了厂门，把派去的代表分割成多处围攻，甚至把人关到地下室和防空洞，新闻记者的摄影机、照相机全部被没收。去的代表中，只有对三军支左的人员没敢动，直到当天很晚才被陆续放回来。市革会领导们得到消息后，当晚九点钟在康平路办公室开会商议，决定于1967年8月4日零点，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各系统组织大会，声讨揭露“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的罪行。这个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徐景贤等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还有老干部和部队代表发言。

对于“联司”和“支联站”的问题，在总部和许多联络站头头中，早就有了要对他们采取措施的要求。但张春桥一再强调要多做“联司”的工作，王洪文在总部也一再说服大家，不主张用强力手段处理。虽然后来因“联司”越闹越凶，为防止发生大分裂，终于下了要解决他们的决心，并已经秘密抓了“支联总”部的头头们，但仍没确定何时对“联司”动手。这次临时决定召开人民广场大会，也只是想对“联司”施加强大压力，并没要在大会后就采取行动的。所以大会一结束，市革会的领导人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各自回去了，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也由各自的组织带回。

不料凌晨约五点钟，“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来电话汇报：上柴厂外马路停满了汽车，各单位的队伍包围了工厂大门，工厂的大门紧闭，“联司”占领着所有的大楼，厂内不断传出高音喇叭喊叫。经询问知道，原来冶金局在杨浦区的几个工厂队伍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回厂时，在外滩遭到“联司”车辆的冲撞并有人受伤，冶金局头头曹可祥得知后发火了，通知局下各厂队伍赶去上柴厂，包围了工厂，但没能冲进去。之后其他单位知道了也都派队伍去支援，上柴厂外的人和车就越来越多了。

凌晨五点多钟，市革会几个领导在康平路小礼堂紧急会商后决定立即赶到现场，尽量做工作以避免发生冲突。在上柴厂边上的一个单位里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各路头头在现场召开了碰头会，定下的原则是围而不攻，尽力多做宣传争取“联司”群众，甚至想以断水断电来迫使“联司”妥协。然而领导者的“围而不攻”策略虽制约了围攻人群的行动，却使他们反而被动挨打。因当时先到上柴厂的各单位队伍并没武斗的准备，不仅没拿棍棒，连安全帽都没戴。而“联司”他们在大楼上居高临下，用高音喇叭指挥，把桌椅腿和橡胶内胎做成弹弓，螺丝、螺帽作子弹，向下面的人群射击，还扔下自制燃烧瓶，使不少人身上和头上受伤。“联司”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围攻人群，附近的工厂开来装载机，推倒围墙铲除障碍，人们用铁板在前防护，冒着铁弹和燃烧

瓶的攻击，从三面冲进厂区。临时在现场组成的突击队是冶金系统的造反队，前面用大铁板掩护，组成梯队从侧面厂房屋顶进攻，很快全线发起进攻，大批造反队、红卫兵和各组织人马涌入，一幢幢大楼争夺、占领……。

“联司”残余人员逐步收缩，向主楼撤退，并把能上楼的梯台全部封闭，进行固守，准备负隅顽抗，不时从大楼上向邻楼和下面攻击。八月正是大热天，围攻的人群都是衣着单薄，不少人被弹伤和汽油烧伤。一开始没估计到这一点，没有作救护医疗的准备，还有现场大批人员也要喝水吃饭等。“工总司”办公室同各方面联系后，市卫生系统派来了医疗队、救护车，食品厂送来了饼干、面包等。现场指挥部要求上柴东方红组织接管工厂食堂，烧水做饭，做好后勤保障；并对占领的大楼做好安全保卫，防止破坏。指挥部决定并公开宣传，对主动放弃抵抗、走出大楼的“联司”队员不追究，让其回家，受伤的予以治疗包扎。

双方相持到下午三点以后，只剩下“联司”总部的大楼还没有攻，本打算给他们一点时间，望其能内部分化放弃抵抗，减少双方损失。但剩下的看来都是“联司”的骨干分子，他们根本不愿放弃顽抗。最后现场指挥部认为不能再拖了，拖到天黑后再解决就更难了。这时就商量怎样减少损失，又能迅速解决问题。市公安局“消革会”的头头吴步林果断调来两辆消防车，升起云梯用高压水龙压制大楼顶上的“联司”人员，大楼外人群立即全线一涌而上，很快解决问题占领大楼。聚集在大楼里面的人一个个举手出来，外面的进攻者气愤的指责谩骂，有的还拳打脚踢。此事及时遭到现场指挥人员的制止，由戴立清、胡斌、杨小兵等人在现场组织起隔离人墙，不允许打人。然而还是有人从人墙背后几次冲过来打里面出来的“联司”成员……。从楼上下来的男人上身赤膊，女的双手抱头，不少人头上打破。大楼对面就是市里的医疗站，有伤的包扎治疗，全部安排到停在厂外的大客车，统一送到同济和交通大学大礼堂，等候处理。

这样大规模的由市里出面解决的行动在上海是仅有的一次，虽然冲突的规模很大，但进攻的人群主要依仗的是人多势众，大多是赤手空拳，没有什么长矛之类的，甚至也没戴藤帽。倒是到了上柴厂遭到“联司”的铁弹攻击伤了不少人。当攻打“联司”结束，我挂在胸前的两支笔被打断，白衬衣被也打破，由于紧张，自己一点没发觉。在进攻主楼时，二兵团耿金章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两台对讲机，给一台让我用，他掌握一台，前后可以呼应，掌握情况。

整个行动在下午五点钟结束。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跟我商量，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会议决定戴立清留下负责处理后事，各组织配合协助。

“工总司”还有黄金海、王腓利也留下。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恢复厂里的正常秩序，“联司”残留人员由同济大学“东方红”组织配合厂里的“东方红”审查处理；为了做好安全防范，通往厂里的道路全部封闭，夜间行人、车辆通行必须有现场指挥部的通行证，道路管理由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负责；厂区安全和后勤保障由厂里“东方红”组织安排，需要支持的由“工总司”组织力量，整个厂区和厂四周夜间巡逻队，由机动力量完成。为了防止意外，现场指挥部撤到隔壁的一个厂里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紧张行动，觉得人已经散架了，继续留在现场处理后事非常辛苦，等一切布置妥当已是夜晚十一点多钟，在指挥部板凳上倒下就睡着了。黄金海半夜里来指挥部，他搞来一辆三轮摩托车进行巡逻。第二天市里开会，我撤回总部，厂外来的人员也都撤掉；厂内由上柴“东方红”负责，要杨浦区联络站多加关心，要求一个星期恢复生产；“联司”除极少数头头之外，其他人员回厂报到。对上柴厂的问题，以后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进行处理。

4. 后话

经过“8·4”行动之后，上海表面上是稳定、平静了。但之后全市一些公开的和未公开的“支联”组织也遭到了冲击，在这些行动中也不乏是因派性，借口对方“支联”来压制对方，甚至砸掉对方。然而被压的一方心里是不会服的，有些单位内多数派或掌权的一派，在处理两派问题上和掌握政策上失当等因素，使单位内矛盾突出了，经常产生冲突甚至武斗，有的还非常激烈，影响了上海已经平稳的形势。这些单位就被称之为“老大难”单位，后来王洪文就让我组织力量，着重来处理和解决这些“老大难”单位问题。

上海出现“联司”、“支联站”问题，这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反映了文革运动中两股势力的较量。当时，文革在不断深入，而“夺权”已在全国全面铺开，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家白天黑夜地全身心投入，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拥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对，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憎恨！

【叶注：戴原文这篇中有许多引用毛主席讲话、指示，中央文件和中央报刊重要

文章的内容，视情摘留部份有针对性的内容，余皆删。原文中还涉及全国和外省文革情况，如关于“二月逆流”事件，武汉“7·20”事件等，因皆系抄摘报刊内容的，故全删。】

二、组建工宣队，任职市科技组(三办)

1968年的全国文革运动形势，许多地方的大中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保”与“革”、“左”与“右”的两股势力进行激烈的较量，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生产。上海的形势虽说较好些，但也有不少单位由于派性严重，争吵不休，甚至发生武斗，我们把这些单位称为“老大难”单位。王洪文要我组织人员调查、解决这些“老大难”单位问题；后来根据市革会统一安排，又让我到市科技组(三办)工作，前后约有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简要地叙述如下。

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

1. “工总司”设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

为了解决一些单位久拖不决的派性矛盾，“工总司”决定组织力量下基层调查、解决问题。总部指定我和王秀珍、康宁一为主，成立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组织总部机关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到一些长期闹得很凶的工厂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单位解决点问题。【叶注：王秀珍时任总部宣传组组长，是总部领导核心班子成员。康宁一时为上海警备区支左小分队负责人，参加总部领导核心班子活动。】

我们对调查来的情况进行分析，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达到既“救火”，又确实帮助下面解决些具体问题。这些单位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后面有“靠山(背景)”(如5703厂有空四军)，有些著名的大厂、老厂(如江南造船厂、101被服厂)上面也都有支持者。还有一些重要的交运系统，如铁路、海运、港务等也很混乱。这些“老大难”单位干扰了文革大方向，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也破坏了上海的稳定局面。我们根据排摸到的情况，再按系统由总部主要成员分工负责去做工作。

2. 市革会设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

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犹如啃“硬骨头”，除需对症下药，更要有“权威性”的处理。鉴于此，市革会首先决定把“工总司”的“老大难办”升格为市革会的“老大难办”，我们的办公室也即搬进了市革会大楼内。其次，为了不干扰全市的工交生产，决定把这些“老大难”单位（包括局或厂）划归市“老大难办”管理（生产业务关系不变），以市革会的名义来直接处理。为此“老大难办”进行了改组，增加了市工交组核心成员秦学能（机关造反派头头）和熟悉原来组织情况的干部，请三军支左办派来军代表，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班子。

市革会“老大难办”组织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市工交系统的8个局、24个公司下属的454个单位。在进驻单位较多的局设局工宣队团部；对没有局团部的进驻单位，我们另设个“工业团部”，代表市“老大难办”对这些单位执行组织管理任务。“工业团部”负责人有纺织局的万高兴、仪表局的孙振兴，还有军代表，他们还在组织、输送工宣队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建上海工宣队

1. 毛主席向清华大学派工宣队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68年7月27日，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校内的武斗工事。有些武斗人员不听，当晚对“宣传队”袭击，“致使五名宣传队员惨遭杀害，731人受伤”。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毛泽东严厉的告诫了他们（讲话省略）。

1968年8月5日，毛主席向首都工宣队赠送芒果。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8月26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明确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

2. 上海工宣队的组成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选派工人阶级的代表，组成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各单位；以工人代表为主体，与驻沪三军支左人员，共同进入市部委办和区县局领导机构，与那里的干群代表实行“三结合（军、干、群）”；又从运动发展较好的工厂中，选派代表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全市的“老大难”单位，同那里的干部群众一起，落实“大联合”、“三结合”，清队，抓革命、促生产。市革会决定，按各大系统组建市工宣队办公室，负责领导、管理本系统工宣队事务。

市工宣队第一办公室(一办)：进驻市文教组管理的文化、教育(大学)、出版、新闻、卫生、体育等系统。负责人为王秀珍(“工总司”领导核心成员)、徐海涛(上警军代表)、姚力(老干部)。

市工宣队第二办公室(二办)：进驻市地区组管理的十个区所属的文教、卫体等系统。负责人为黄克(老干部)、张宝林(“工总司”领导核心成员)、上警军代表一人。

市工宣队第三办公室(三办)：进驻市科委系统和市工交系统中“老大难”单位。三办是由市“老大难办”与进驻市科委工宣队合一组成，【叶注：后经市革会决定，市科委改名市科技组。】负责人为戴立清(“工总司”领导核心成员)、田树尧(海军代表)、秦学能(市工交组核心成员、机关造反派)、许言(后增补的老干部)。

市工宣队第五办公室(五办)：进驻市郊区组管理的十个县所属的文教、卫体等系统。负责人为张宜爱(上警副司令员)、张辑五(老干部)、王明龙(“工总司”领导核心成员)。

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进驻市财贸系统。负责人为高志荣(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黄金海(“工总司”领导核心成员)、续中一(老干部)。

【叶注：一是：市工宣队各办公室的负责人，这里只提军、干、群三人，实际还有他人，是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各办的上述三人，之后的变化很大，如王秀珍升任为市领导人，高副司令回部队，张宝林和王明龙被调离，这个初始名单仅供参考。二是：不久又按张春桥的决定，市工宣队各办公室与所在的市革会各组(部门)合二为一，对外大多称市革会某组，并可简称为某办，如市革会文教组(一办)、市科技组(三办)等。】

根据市革会决定，由市“老大难”负责调集市工宣队的人员，协助各工宣队办公室组成队伍。我们集中力量，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工交各局选调了工宣队员近十万人（其中约二万人是为解决老大难单位的）。工宣队的编制仿效解放军的班、排、连、营、团的建制。在组织上，派出工宣队时，一般都同时派出军宣队，尤其是进驻上层建筑单位时；另外根据进驻单位的级别，还配置相应职级的老干部进工宣队领导班子。

【叶注：据知，当时在进驻系统的各局设工宣队团部，在大学则每校各设团部，一般以团为工宣队的一个“独立”单位。】还是在“老大难办”时，我们按市革会指示，协助市一办、二办调配了120支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医院等单位；按市革会玩决定，还对普陀区政府各部门和下属各区局、各街道、一些基层单位全面派驻了工宣队，同时明确告诉区工宣队的领导人，要全面支持区革会负责人杨富珍的工作。现在有的文章中胡说：“当年上海派工宣队完全是王洪文个人指使的”。这不是事实，王洪文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这里引用当年张春桥的话作注脚，张说：“我这次从北京回来，一看情况变了，因为你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地派了工宣队，市革会又一次更新，一、二、三办都是实权派，所以，现在的上海是工宣队的天下了。”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叶注：原文引用张春桥的话，没注明出处。】

任职科技组(三办)

1. 市“老大难办”变为市工宣队“三办”

根据市革会的决定，市“老大难办”负责派驻市科委系统的工宣队，并同派驻工交系统老大难单位的工宣队，合称为市工宣队第三办公室(三办)。【叶注：“老大难办”名称取消，后市科委名称也经市革会决定改为市“科技组”，以后就都称为“三办”或“科技组”。戴立清为主要负责人，同为负责人的还有海军代表田树尧和市工交组核心成员秦学能，后又增补老干部许言。戴调离三办后，许言被升为主要负责人，田和秦也先后调离。】

(1). 按市革会的要求，工宣队和军宣队密切配合，共同开展工作，主要的任务：一是消除派性，促进联合；二是建班子，抓好工作、生产；三是落实政策，开展清队工作；四是在斗争中改造、提高自己。

经过一段艰苦的整治，形势很快得到了控制、改变。有的单位不仅很快解决问题，摘掉了“老大难”帽子，还由进驻的工宣队带出一批工宣队员，滚雪球似的壮大自己，

转而进驻其它需要的部门(单位)。我们重视抓工宣队的自身建设，要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些工宣队员用自身的经历、体会进行言教、身教，认识到私心重、搞派性，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危害性。及时总结一些比较好的典型，交流经验。发现问题立即进行通报，要求及时解决。强调让事实讲话，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样至68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们根据市里提出的摘去“老大难”的标准，先后从工交系统撤出三百多个单位，有留了“尾巴”的则交给各局自己处理。也有些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工宣队一批又一批的调换，可是“老大难”的帽子仍是摘不掉，拖到1969年底还剩三十多个单位没有完全解决。

(2). 大量派出的工军宣队涉及到方方面面，出现的矛盾也很多。进驻到一个单位，由于对“文革”的认识不一致，各人所处的位置角度不一样，各自碰到的人和事也不一样，所以看问题的观念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会不一致，由此出现的种种矛盾，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暴露出来。鉴于上述原因，工宣队之间，军宣队之间，工军宣队之间会有矛盾，有了矛盾难免会反映在工作上，有些还直接影响了执行政策，妨碍工作。

为此，我们及时发现，采取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理出、发现问题。我们组织较大的联络员班子，各自调查，各自写简报，对发现问题的及时上报，并采取不同的措施，必要时进行调正。如当时的科技系统工宣队，原来是市科委自己选派出的，分为四个团部，我们从实际出发改编为一个团部，人员全部轮换。二是在市科学会堂专门建立一个班子，由耿金章负责，【叶注：耿原系“工总司”下的“二兵团”负责人，时为参加“工总司”领导核心活动者，随戴在三办工作。】专门轮训和整顿工宣队，办学习班思想务虚，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协调工军宣队的关系。三是强化工宣队的自身建设，普遍开展评比活动，树立典范表彰交流，收到较好的成效。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李济逊率领的一支工宣队，汽车底盘厂徐松宝率领的一支工宣队。李济逊带领十七名工人组成的小分队连续作战，经过在梅林食品厂和航道局的锻炼，又解决了供电局“老大难”，最后转战物资局。徐松宝的小分队被派到浙江省淳安县的一个工厂（属国防科委21所），1969年夏秋一场暴雨，山洪暴发，奔腾直泻，徐松宝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带领工宣队员，奋不顾身地在激流中拉绳索，拦截被洪水冲走的群众，因水势太猛，他来回冲刺，终因体力不支而被大水卷走，光荣献身。同时遇难的还有该厂的一位女技术人员，她在徐的行动鼓励下，冲在第一线，也因体

力不支而被大水卷走。此事震动了整个淳安县，当地老百姓久集不散，洒泪祭奠二位英灵，并传为佳话。据1968年底的统计，我们三办全系统共评出工宣队“四好”单位36个，“五好”个人450人。于1969年1月2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表彰大会，当场颁发了由市革会签署的奖状和奖品。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结束。除了本系统工军宣队外，还邀请了报社、电台、电视台和一、二、五、六办的代表，到会一万三千五百多人，声势浩大。

2. 三办初成立时的概况

“三办”又称科技组，它是1968年11月4日正式成立。按照市革会的规定，这个机构是由市科委和市解决“老大难”办公室合并组成。但是在合并前，原进驻市科委的军宣队全部撤离了，只留下六名工人代表和几名工作人员，双方领导既没碰头，也没有交接公文印信。实际上我们进去时，仅仅是几间空办公室，所以对市科委以前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的人员来自各方面，一是由我从“老大难”办公室带来的，还有从工交组调来的秦学能同志等人，二是前科委留下的和以后市里派来的许言同志（老干部），三是驻沪海军支左派来的田树尧等同志，在当时称之为“三结合”的班子，戴立清、秦学能、田树尧、许言为负责人。

市科委系统共有48个单位（后陆续下放了六个单位），除市属8个单位外，余下的全部是中央部门在沪单位，国防科委16个，国务院部委9个，中国科学院9个单位。其中局级研究所22个，处级研究所20个。按照中央当时的规定，凡是中央在京外单位的“文革”运动归所在地部署进行，但科研、生产任务仍隶属原关系管理和领导。

三办成立后，市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除继续抓好工交系统二百多个“老大难”单位外，还要对科技系统实行全面领导，具体任务概括四句话：建党是重点，清队是基础，班子是关键，革命化是灵魂。

刚接手时，对科技系统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把各研究所的工军宣队请到办公室听取他们的汇报。逐步了解到他们都是在68年9月份前进驻各所的（称为第一届），而军宣队比工宣队还早一个多月。各所的运动，都是在前科委的布置下进行的，而且在清队中已经揭出了许多问题：华东分院的“两线一会”，国防科委系统的“516”、“4·12”等；有的所领导已被靠边审查，有的被办了“学习班”（实际上是关押），

各所均关押有一批人，说是什么叛徒、特务、间谍、现行反革命等等。这些都是各单位自己定的，没有人规定统一搞，也不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当时工交口的“老大难”单位多、问题急，我们每天基本上处于“救火”状态，大部分精力被那里拖住了。对于科委方面的工作，确实顾不过来，至于那些被“冲击”的对象，更是无暇过问，只能把下面汇报的情况用《简报》的形式上报市革会领导。

1968年10月底，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席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全国都以北京的“六厂两校”为榜样，继续开展清队的工作，上海当然也不例外。马天水、王少庸说过：你们三办要重点抓抓科技系统这个“老大难”，工交的“老大难”单位可逐步交还给各个局去处理；王洪文也说：“当前上海要掀起清队的高潮”；姚文元也传话说，要看科技系统的《情况简报》；张春桥在一次汇报会上质问我：自然博物馆为什么就是联合不起来？我们的回答不是他想听的，最后他自圆其说：“为什么不联合？因为那里有个馆长，他是留学法国震旦大学得过学位，回国之后就成为中国第一个标本专家。这样的人，现在批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能服吗？象这样的例子上海还不少，所以说上海这个海深得很呐！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不抓阶级斗争行吗？！”【叶注：原文没注出处】

科技体制的变化

1970年7月6日市革会专门讨论了三办科技组的问题，根据当时的记录归纳几点：

1. 三办科技组要否存在

市领导指出，文革前市里设科委、科技局，另外还设立了一个“赶超办公室”，这三驾马车是因人设置，有人为的矛盾。刘述周搞科研，曹荻秋搞赶超。要不要这三个部门，还是一个部门？这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统一领导。对过去有合理的东西应予保留，不合理的就改革，不是讲斗、批、改嘛。“文革”中有人把基础理论看轻了，这是不全面的，基础理论的，它是若干年之后才可能产生作用，由于生产水平的发展，目前还无法兑现。上海应保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院。上海的研究所分两类。一类有80多个属大专院校和各局管理，另一类是40多个归上海市直接管理。随着科技的发展，还要建立新的研究所，还要搞国内外的科技情报和学术交流，还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教育。所有这些都需要保留三办科技组，还要进一步加强其领导力量。

2. 市科协改为科技交流站

有人提出将原“科协”改成“群协”。张春桥说：关于“协会”问题，中央没有讨论，上海想设立各种名目的协会，我不赞成原有的应砸烂！过去全国有个科协，上海也有个科协，并有一座科学会堂。60年代时，刘述周在里面搭起席棚，摆摊搞展览、搞协作，场面十分热闹。但是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地方，拒工农兵于门外，这种事不能再搞了。现在你们三办如果感兴趣的话，可搞个科学技术交流站一类的单位，在全市进行技术、学术性的交流。【叶注：这段是戴原文。我理解：张春桥并不赞成“砸烂”原“科协”，也批评了原“科协”从“十分热闹”变成“为少数人服务”。但对张所讲“上海想设立各种名目的协会”这句话，我疑戴述有误：因这与下句不赞成“砸烂”的意思不符，且当时状况也不可能会想设各种协会的。】

根据张春桥的这个讲话精神，我们就撤销了原“科协”这个组织，成立了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由聂安义、阮崇武负责。从1970年下半年起，科学会堂即向全市开放，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全市的科技工作者、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能工巧匠，有的放矢地攻克重点项目的技术难关。同时，开展全市性各种专业的技术讲座、交流，紧密的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以求专业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并在全市各区、县、局和大厂建立网络，成立相应的交流站。这种科普交流活耀起来，深受广大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的欢迎。

3. 华东分院改为科研物资管理站

市领导指出，“文革”前市里有科委，科技局和赶超办公室，此外还有中科院华东分院等机构，领导名头不少，但华东分院只管几个“生”字头的研究所。实践证明，管理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在会上一致意见要撤销这个机构，新建一个物资管理性质的单位，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研究机构，保证各所的物资、车辆、住宿等后勤供应。为此，我们根据这一精神，撤销华东分院，新成立一个华东科研物资管理站，向市科研物资管理站过渡，由赵守拙等人负责。其主要任务是将原华东分院的业务、物资、设备、车辆等统一管理、安排调度。改变过去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造成极大浪费。如食堂各单位都想自己搞，器材各所都要全，车辆的重复浪费也相当严重。

总之，科研物资管理站就是各研究单位的总后勤，资金费用的统筹安排。住房、食堂、托儿所，包括学校，特别是各科研所设备的利用，过去浪费相当严重，应该统

一调度，充分发挥物尽其用。

4. 划出和新建的单位(计算中心、激光中心)

为了使实用科学与生产结合得更紧密，市革会决定将原属于科技组管辖的医药工业研究院、玻璃搪瓷研究所和香料研究所等六个单位划归各属工业局管辖。

根据实际需要，我们分别建立了5个单位和接受一个挂靠单位。新建五个单位：物资管理站、市科技交流站、市计算中心、市激光研究中心和科技“五七”干校。挂靠单位：“1122”工程，该单位专门研制雷达，属军工保密单位。

物资管理站、科技交流站前面已讲述，不再重复。

计算中心的建立，对计算技术的发展是个飞跃。50年代，我国的计算工具只有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到了60年代，大型的工程结构设计和工业产品设计复杂得多，需要更快速的运算工具。我们审时度势，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的功能，以适应工、农业和国防工业的需要。在组织力量积极推广计算机应用的基础上，三办科技组及时向市领导报告，成立了上海第一家计算中心。它的建立不仅缓解了计算机研究所为社会服务的压力，而且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按现在的话说，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确实解决了造船、钢铁和建筑等设计单位大困难。

激光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是科研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科技走出研究室，到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去的成果。应用科学同实践结合，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伟大的生命力。特别受粟裕大将来上海视察工作的启示，国防科研成果也要服务于民用生产。我们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又报请市领导批准正式成立了激光研究中心。激光技术在当时是一种新技术，它适用的领域很广泛。如机床用激光精密测长，在钻石切割、金属切削、医疗手术，通讯设备、电子元件制造等方面，激光的用途十分广。光盘的问世，除让歌星大展歌喉外，还有许多用途。

建立机关干部“五七”干校

1. 建立市直机关“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主席1966年5月7日和1968年10月4日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当时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系统、各区县局机关，都划分大、

小班子。小班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减少脱产人员，主持日常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大班子按系统归口编制，集中起来组织学习，搞斗批改。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市直机关的大班子就首先积极响应，市革会决定由我和王承龙牵头，【叶注：王承龙，原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成员，市级机关造反组织联络站负责人之一，时为市革会常委兼市办公室负责人，后下放工厂劳动。文革后被判刑十年。】由市直机关的头头丁庆丰【叶注：丁是原市机关事务局干部，机关局造反派头头。】等人具体负责筹办市直机关“五七”干校之事。从选点、察看、报批，我们一马当先，积极带头，从各方面借调了大批的帐篷、工具等物资和车辆，并从大班子里抽调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员，组织先头部队，开赴奉贤的海滩边，就地选址，现场规划，安营扎寨。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就地取材，运材料、割芦苇、和泥浆，自己动手建造第一批简易营房。这些都是住在帐篷里完成。实践出真知，劳动锻炼人，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各自特长，组织了一批专门营造房子的队伍。另外抢季节，请农民为师，组织种菜、养猪，养家禽。

在市直机关大班子干部的积极行动带领下，各系统、各区、各局，有的在市直干校两侧，也模仿造起各自的干校，先后有科技干校、文艺干校、工交干校等等，有的区、县各自在崇明和就近选点建干校。截止1971年5月份的统计，全市共有51个干校。进入干校的人员约4万余人。以后根据工作需要陆续进行安排，如1万多人开赴工交战线战高温，1万多人重新分配，最后在干校储备1万多人。尚有老弱病残者三千多人，按国务院的规定做退休、退职处理。

2. 建立科技干校

三办科技组的干校起步较晚，1969年初才开始筹划，第一学期学员主要以华东分院、市科协为主体，共有21个单位的大班子人员674人（部分人未到场），其中干校管理人员14名，组成7个连队。同年3月份落实了地点、建房材料等物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陆续完成了简易营房四千平方米，围垦四百多亩地。

由于学员对农田耕作，自然季节生疏，我们还请了当地的贫下中农为老师，请专家现场指导示范，及时抢插单季稻270亩、抢种棉花204亩，同时养猪种菜，逐步达到半自给。在农忙的时候，包括刚开始时的土地开垦、造简易营房，我们都组织小班子的在职干部到干校劳动。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短期的劳动，互相增

加了解，缩短距离。干校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从食堂一日三餐开始，到医疗条件、交通工具，逐步创造条件，改善生活。干校实行农忙每月休息一次，回家四天，到后来天天有公交车，可以回上海，家属也可以去。使每个干校的学员，每餐可吃上二分钱一大盆新鲜蔬菜，一角钱一块红烧肉，免费的菜汤，一荤一素一盆汤二角钱就摆平了。有的学员原先有胃病、失眠等病，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原先的毛病不治而愈。有的原来思想包袱沉重，来了干校精神面貌有很大变化。有的老同志说：现在来到农村，似乎又回到南泥湾，我们到了干校，似乎又进了抗大。

从1969年初到1972年初，到我离开科技组时，科技干校连续办了三期，共进出学员1889人（含干校内部人员和工军宣队）。这些学员，有的是从大班子中调来的，有的是带着各种问题待查的，有的因领导工作粗糙而被迫调来的。所以第一期学员，因思想不通出现过多次反复。又因科技干校归属问题，要划归市直干校统一领导，学员思想波动较大，后经过工作比较稳定。

干校的第二、三期，我们加强了领导班子和派驻工军宣队力量，以及相应的工作人员。学员仿部队编制，人员保证，干部到位，小班子和在职科研人员也分期分批下干校轮训。农田耕种土地达平均每人1/3亩，蔬菜地扩大了30亩，养猪一百头，养羊几十只，鸡鸭几百只。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各种头绪理顺，生活也逐步改善。有的学员在结业会上深有感受的说：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劳动锻炼有五个不一样，一是学风正，理论能联系实际，边学边劳动；二是感情不一样，能与贫下中农实行五同，对他们的感情深了；三是干劲不一样，学习劳动特别卖力；四是团结互助精神强了，过去文人相轻老死不相往来；五是觉悟提高了，对看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一样。

然而，有人写文章说，干校“这是劳改农场”、“是集中营”、“是迫害干部的地方”等等。这表明一个人有了成见之后，不论什么问题都不会实事求是，带着偏见甚至颠倒过来看问题。当然，这里不排除有被冤假错案所牵连过的人，审查没有结案的人或被排挤下来的人。应该看到大多数人是因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精简下来的。试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海有四万多名干部已经不在岗位上了，不知讲这些话的人有何高见，如何解决安置办法？！国家出钱，工资不少，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储存爱护国家的财富，保存培养着干部，随时根据需要输送到第一线！我想凡是去过干校的人，都会实事求是看待这个问题。别的地方干校，我没有发言权，而我在上海市直干校是生活和劳动过的，绝非像有人说的是“劳改农场”或者什么“集中营”，

因为不是事实！

科技系统“清队”的问题

1. 情况不明

1968年11月4日，经市革会批准成了“三办科技组”，它名义上是由前科委与市解决“老大难”办公室合并而成的。但实际上前科委的领导层在我们决定进科技组之前就全部撤走了，我们与他们事先不认识，这时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进行交接，只留下六名刚从基层选调上来的工人代表和两名工作人员。

我们接手之后，既不了解过去两年多来，运动的发生、发展状况，又不知前科委对整个运动的部署。因此，开展工作十分不利，一切均需从头做起。刚进入科技系统，听到的是各研究所都有大案，各单位都有被审查的人员，“敌情严重”且根深线长，显得复杂无比。我们对科技系统这个“深渊”心中无底，只能先和大家见见面，宣布下三办科技组的新领导班子，强调下清队运动的政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我们发现整个科技系统的状态比较混乱，比如清队扩大化、干部解放不出来，已建立起的领导班子没有权威性等等。根据党的“九大”精神和有关党的政策，我们深深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必须立即行动，彻底纠正。我们的方针：一、要拆“牛棚”；二、解放干部；三、建好班子。具体的措施：就是撤出第一届四个工宣队团，报请市革会批准之后，我们从新改派第二届工宣队团，同时加强工宣队团部的组织和专案队伍的力量。与此同时，通过东海舰队党委全面撤换第一届支左的军宣队。

我们上面的决心和措施，并非一下子就形成，而是经过1968年12月9日科技系统“清队交流大会”以后，有了沉痛教训才逐步认识的，对极左思潮的危害性也有了进一步理解，不予解决后患无穷。事实上从党的“九大”以后，这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落实党的政策上。

2. “12·9”大会，沉痛的教训

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我们想结合本系统前一阶段的清队情况，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地开展清队工作。1968年12月9日，在市革会（福州路）大礼堂召开科技系统清队工作交流大会，选择植物生理所、材料所和电器所在会上发

言、交流，再请市领导对清队工作做指示。参加大会的有全体工军宣队人员，以及各所的室、科以上负责人。会议由秦学能主持，戴立清代表三办科技组讲话，马天水作指示。

首先由植物生理所军宣队李光华发言，其大意：这个所是国民党留下的反动学术权威比较集中的单位，运动初期停止不前，我们与工宣队举办了抗大式学习班，连续组织了四个会战，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对杜聿明的促降书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语录等，最后各人作交待，有一个人就交待了一百零九名。材料所、电器所的发言从略。

我的发言，主要强调“清队是基础”，在实践中，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对于反革命份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他们。我们根据初步了解的情况，结合下一步的工作，觉得科技系统的情况复杂，与工交或其它单位相比，有“几多”的特点，即知识份子多，国外回来的多，叛徒特务多，现行反革命案件多。但是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所靠边留所检查的有一大批，有的所仍在那里搞派性……。

最后由马天水讲话，我们事先给他拟的稿子他没用，即席发言，根据当时简要记录：科技战线，由于这段时间没有接触，工军宣队进去已有三个月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派的革命群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叶注：以下三条，是否马天水在这次大会上所讲，存疑！因原文中，这不是紧接上段马天水讲话连贯下去的，而是另起一行分三段所写。原文中没讲这是谁的，也无法分辨是谁的。】

一，科研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其情况与工厂相比更加复杂。这条战线都被刘、邓、陈、曹包庇下来了，每次运动根本没有触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斗批改，搞清队，一定要把它搞彻底，这是硬仗，是攻坚战，要打好这一仗必须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去发动群众。毛主席指示，要抓准要抓好，抓准就是要掌握政策，抓好就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二，不仅组织上清除敌人，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科技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们的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帝修反。过去罗瑞卿主张科研单位的厂、所合并，聂荣臻反对厂、所合并，因为罗是

管国防工办的，聂是管国防科委的，为什么要合并或不合并呢？双方主要是想抓权。

三，聂荣臻不是一贯正确的，他搞多中心，在晋察冀搞征兵时，要人家跟他走，“文革”中挑动两派群众搞武斗，压制解放派，支持无革派。1969年即将来临，工业大跃进即将出现，希望科研单位不要拖后腿，要搞大批判要抓好清队。

这个大会是我们刚去科技组不久，匆忙召开，市里有要求，正值十二中全会精神贯彻，我们新班子同大家见见面。特别对三个“经验”发言，没有深入调查，轻信汇报，值得总结。

3. 深入基层，有错必纠

(1) 发现问题

1968年12月9日大会之后，我们针对三个所的“经验”，专门派人去那里蹲点，解剖麻雀。本打算抓住典型，不断总结经验，特别是大会之后有何新的推动。然而，事实完全出乎意料！

当我们蹲点的几个联络员，与所领导，工军宣队和科研人员广泛的接触后，发现所里气氛不正常。开始所里的科研人员都不敢同我们接触，再深入了解，逐步发现科技系统前一阶段的清队，明显违犯了党的政策。对关押审查的人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的现象。第一届工宣队进所之后，就配合军宣队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致使许多人留所审查。据不完全的记载，植物生理所88人，材料所74人，其中有高知或知名人氏18人靠边。尤其是植物生理所搞的最为严重，工军宣队由军宣队挂帅（工宣队是化工机修总厂），将全所三百多人，全部留所不准回家。办什么抗大式的学习班，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白天要他们写材料，半夜里搞突击提审，按办案人员的思路交待问题。如交待了，就给予物质奖励，改善伙食或给予生活上的方便。如不主动交待，办案人员就拿着全体人员的花名册，让他指认。有一个人，一下子就指认了103个人，军宣队还不放心，还怕有坏人漏网，再三继续追问。那个人也干脆指着他就说：“还有你。”

(2) 有错必纠

为此，我们深感问题严重，同时也认识到12月9日我在会上指出的“几多”现象，不是事实，它无疑会对清队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知错必改，有错必纠，我们下定决心要彻底纠正违犯党的政策的错误！事实上，以后的一年多，我们一直在落实这

个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迅速上报市革会，专题反映情况，并建议调换原有的工宣队，将原来的四个团全部撤出。新派进一个刚从交运局撤出的工宣团，统抓科技系统的斗批改；另一方面，我们办公室的领导亲自分头下所，找军宣队、工宣队谈话。明确指出这些违犯政策的做法，让他立即停止搞逼供信，考虑到69年元旦、春节将近，把各所举办的抗大式学习班解散，各所先放人回家过节，案子以后查。大部分的军、工宣队表示同意，立即纠正。但是植物生理所的军宣队思想不通，几个办案的军宣队员，都是年轻人，他们手里掌握着清队材料，思路简单固执，坚持有“证据”，所以怎么也谈不通。

我和田树尧只得直接找到东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解决，支左办主任彭林同志解释：这批军宣队是“文革”开始前，某卫生学校刚召来的新兵，“文革”中他们也停课闹革命，不久就派出来支左了。支左办同意采取措施，通知舰队后勤部，让这批军宣队的主管部门来处理。后来我又两次找高志荣副司令员，表明我们的态度。直到69年2月5日经舰队同意后，把植物生理所和科技系统第一批进去的军宣队全部撤出整训、调换新的军宣队。

1969年2月9日，以洛川（政委）、许兰仙（团长）等人组成的工宣团开进了科技系统，其团部驻在华东分院。我们找了团部领导人谈话，明确告诉他们：进驻的任务三条：一拆“牛棚”，二建班子，三认真纠错结案。指出：前一届工军宣队一些人违背了毛主席的清队政策，搞逼、供、信扩大化，干部解放不出来，自搞一套等。同时，我们责成三办组织组负责人周强华等人，组成专案材料班子，按党的政策，实事求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出客观的结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伪中央研究院是不是特务组织？是不是都是国民党？是不是有中统、军统？出国留学回来的是不是有间谍等等问题，认真回答，大胆回答。对那些没有什政历问题者，先大胆解放一批，对一时搞不清的先挂起来，用起来。即使是有问题的人，实事求是、重证据。我们的态度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经过三办的直接参与，工宣团和专案材料组，经过认真仔细的工作，截止1969年4月中旬，从全科技系统四百零柒个审查的对象中，解脱了二百四十六人。

(3)叶永烈在他的《王洪文传》中讲：（在科技系统）“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蒙冤……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这完全不符历史事实！

从上述情况可看到，在三办科技组成立前，也即我进入科技系统前，科技系统的清队运动是由“前科委”部署的，各研究所的清队也是当时（第一届）的军宣队、工宣队搞的。在我们进入科技系统时，他们的清队已揭出了许多“问题”，如：“两线一会”、“5·16”、“4·12”等，各所办“学习班”关押了一批人，揪出什么“叛徒、特务、间谍、反革命”等。

当然，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68年12月9日的大会就是个沉痛的教训。对大会上介绍“经验”的发言，只听信汇报，没有去调查核实；尤其是我在会上的讲话，提出科技系统有“几多”，会对违反政策的清队工作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但当我们通过深入调查，知道事实真相后，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决心彻底纠正错误。在调换了新的工军宣队后，也在三办科技组的直接参与下，不到三个月就把各所被关审人员的大多数给解脱出来了。

这充分地证明是我们，也就是三办科技组和工军宣队去落实了政策，又怎么能说：“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为了某种需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是对历史不负责！

4. 几个有影响的案子

(1) 科委系统的“两线一会”

我们进驻科委后，原先进去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汇报讲，开始清队时他们就采取了行动，主要针对“两线一会”的人员，但这个案子究竟从哪里来的线索？究竟是谁首先归纳成为“两线一会”这个名称的，已无法查证。所谓“两线”，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历史时期划分的，即日伪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所留下的人员为一条线，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留下的人员为另一条线；另一种说法：就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条线。所谓“一会”，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应变委员会”，另一种说是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工军宣队采取行动后，涉及到的人多面广，尤其是中科院（华东分院）系统闹得最凶，影响也较大。彭加木当时是中科院系统造反派的头头，筹建中科院华东分院革委会时，彭加木是“革筹委”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听了工宣队、军宣队的汇报之后，感到有点玄乎，好象到处都是特务、间谍，真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就连生理所的大楼，也说成是日本人有意建成“日”字型的试验楼等等。

可是要承认它，必须要有事实，否定它也得要有根据，那种违犯政策，搞逼、供、信是制止了。但是要否定它，我们要查根据，即使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没有查出根据，还要说服本人加以否定。对“两线一会”，我们当时理出了九个问题，（包括彭加木的问题），查不出具体的根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有人揭发 1950 年“二六”轰炸时，曾有人聚集在华东分院图书馆的大楼里开会，挂国民党旗、唱国民党歌，欢迎蒋介石反攻大陆。但是一接触到实质时，就是找不到参加会的人和具体的活动。此案我们以“查无实据”的态度，陆续解脱了許多人，最后予以否定。

原工军宣队刚开始时大轰大擂冲击比较容易，但是要真的立案审查就有难度。然而，再要否定它那是难上加难，这需要大量的旁证和工作，不能草率结论。直到 1969 年 9 月我们向市革会做了全面的总结汇报，经同意，批准“两线一会”案件一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全部否定！其案卷也全部整理好送市专案归档。

“两线一会”案，第一届工宣队、军宣队办案时共揭发出 607 人，其分布：有机所 150 人，是汪猷和黄耀曾两人交待的；植物生理所 120 人，是夏征沃交待的；实生所 120 人，是罗登交待的；药物所 108 人，是曾广方交待的；余下的 100 人则分布在华东分院的生化所、生理所、硅酸盐所、冶金所、昆虫所、光华出版社、图书馆和天文台等单位。据说此组织是朱家骅（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逃往台湾之前，于 1949 年 3 月在岳阳路 320 号建立的。这个材料的来源是朱家骅女儿和其私人医生在新疆劳改时交待的。他们两人都说，朱在逃往台湾之前，经常在岳阳路 320 号开会，参加的人员有黄耀曾、汪猷、彭加木、曾广方等人。另据昆虫所的杨某某交待说：“朱家骅在会上说过我们是暂时的失败，中共在上海是呆不长的，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的。”实生所的罗登（副研究员）交待说：“1949 年 3 月会议，朱家骅要我去伪公安局取几十支枪。”

这个集团案子，经过一年多的查证，没有发现什么罪行和组织方面确凿的证据，我们上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予以否定，档案全部上交。余下十多人未解放，是另属个体案件。

(2) 彭加木案

1969 年 12 月 31 日专案组赵惠兴、李然的汇报，彭加木有以下问题：

一是彭本人地主家庭出身，其母因枪枝问题曾被管制过，但彭加木隐瞒了这事，没向组织交待。有人揭发，他有个朋友去美国时，曾寄存一只箱子在彭处。后来那朋

友死了，有人就问彭加木关于朋友存放的箱子之事，但彭一口否认。

二是伪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逃往台湾之前，在上海搞了一个《技术人员联谊会》（可能是应变委员会）彭加木参加了，没有向组织交待过。

三是在六十年代，中科院曾号召青年科技工作者去大西北考察。原生理所负责人王星九说，当时是自愿报名领导批准，彭加木主动报了名。1963年他到新疆的沙车治沙站，后又要求去罗布泊考察。当时的新疆科学院不同意彭去，但他坚持要去。彭组织骆驼队，带着收发报机，沿着公路进入罗布泊地区。新疆军区发现后，即制止他们前进并向上级请示。此时彭私自拍摄了许多照片，有雷达天线，有桥和烽火台等等。因当时我国正在该地区进行核爆炸试验，绝对禁止外面人员进入。经请示上级部门，一切人员禁止入内，彭只好返回。

根据市科委派来的(第一届)军代表刘如衡说：“北京的王锡鹏与彭加木是一个观点（彭加木是华东分院科技界造反司令部的头头）。王锡鹏于1968年5月份来沪，专门到华东分院，王指名要彭加木参加分院的革委会，王回京之后又写来一信，指定华东分院革委会要彭加木当第一把手。”【叶注：按戴原文分析，王锡鹏似为中科院造反派头头。】

彭加木案件，后在上海乃至全国曾轰动一时的，这个人最后确实还是个谜。叶永烈胡编：“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划入特嫌名单……在戴立清亲自督促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这完全是移花接木、故意栽赃！

彭加木是上海科委系统公认的造反派头头，是被推荐为华东分院建立革委会的筹委会成员的红人。当他被留所靠边交待问题时，我还没进市科委，根本一点不知道此事。我们进驻市科委后，三办科技组连续接到华东分院的(第一届)军宣队、工宣队送来的报告，要求我们批准对彭隔离，一共打来三次报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到华东分院，听取了工宣队季逢春和军宣队负责人的汇报，才知道是公安部门曾怀疑彭加木有泄露国家机密的嫌疑：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几天，香港报纸就登出此消息，那时彭加木正在西北考察，并到过罗布泊发射场的边缘地区，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个雷达站的天线等。彭加木因涉“两线一会”案被留所审查，并抄过彭的家。我曾问过他们，抄家是否去派出所办过手续？回答说办过了，季逢春还给我看了抄出来的几件东西：一是彭在香港读书的中学毕业证书，二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组织部的

名单，三是上面所说彭在新疆考察时所拍照底片。我也如实向市里报告了。

彭加木是个知名人士，原是中科院生化所的科技人员，文革前曾被树为科技界的标兵，文革中是科技界造反派的头头，“三结合”时，人们利用了他的知名度，把他推上了华东分院领导成员的位置上。第一批军、工宣队进去，清队开始，因“两线一会”等问题冲击，彭也留所审查。本来要他交待在西北考察时的活动，但他在交待中却说自己是在国民党少将特务和应变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办案人员要他拿出根据，如证明或委任状之类的证据，他说没有。他说他是在敌台广播中亲耳听到的。别人还揭发他老婆也是特务，并收集情报，由其保姆发报与台湾联系等等。工宣团和我们组织组材料组接手后，没有任何证据，通过内查外调，也找不出具体的罪证。办案人员多次启发他，要彭加木实事求是的交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然而，彭加木始终坚持自己是国民党少将特务，不肯推翻前面的交待。我们是无法查证，最后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与“两线一会”一起结案，其材料归档。

彭加木的问题，明明是自己交待出来，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少将特务”，怎么成了“戴立清把彭加木划入特务名单之中”的呢？至于说戴立清率队去彭家抄家，更是无稽之谈。

(3) 李志侠案件

叶永烈撰文说：“上海 708 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不对！此话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事情的经过和结果是这样的：七院八所隶属于国防科委，其党、政由上海市代管。文革中，七院在沪的研究所形成了两大派，即无革派和解放派。该所位于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嘉陵大楼上，所内两派的派性严重，秩序混乱，是上海有名的武斗单位。1968 年 9 月 23 日，原上海市科委直接向该所派遣了工军宣队。工宣队由上海先锋电机厂的杨振泉和上海水工机械厂的钱大公两人率领进所的。当时李志侠（原所长）已是该所革委会第一把手，其本人属于无革派的观点，因李与“4·12”炮打张春桥有牵连，因此工军宣队进所之后，即把李志侠留所检查。我们三办科技组成立于 1968 年 11 月 4 日，所以对该所之前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要李志侠留所检查的情况，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1968 年 12 月初的一天晚上，约十点钟左右，该所工宣队钱大公和杨振泉二人抬了一架老式录音机来到三办，那天晚上我不在办公室，由秦学能、田树尧二人接待。

钱、杨说：“李志侠留所检查后，就在大楼的二层亭子间里，我们向市里打报告，要求正式隔离审查，至今一直还没批。而李志侠在所里喊反动口号，上下楼的人都听到，影响极坏。我们在摇头窗上装了只话筒，将他喊叫的内容录下来了，有40分钟。现把机器和录音带一起送来，请求处理。”秦、田两人叫他们到机要室打开录音机，清晰地听到拖长的声调讲：“我现在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枪毙林彪。”此种声音重复几遍。秦、田两人当即让其停机，并立即请示“康办”，办公室请示后回电说：“马上把录音机、录音带送来！”当即派机要秘书（军代表）顾关兴开车送去。当晚他们把情况向我汇报了，第二天又把详情说了一下。

关于李志侠，我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其人，更没有听见录音带里的啥声音，只知道他有喊反动口号的事。我觉得事情已经上报，录音已经上交了，如何处理没有放在心上。不久，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领导上已经把李志侠的事情交给了市“公检法”处理了。因此，我认为此事已经了结，与三办无关了。

事隔半个多月，一天上午，市公安局军管会来了两个人到办公室找我，他们说：“市领导交办的案子，拘留李志侠，请你们主管上级部门在拘留证上补签一个手续。”原来是王洪文等人听了录音之后，即让市公安局拘留李志侠。人早已抓了，后来他们让七院八所补报材料，要我们补签拘留证手续，以后究竟如何处理的，我不知道了。

这明明是李志侠自己喊了当时定性为“反革命”的口号，并由市革会交给公检法，依法拘捕关押，这怎么能说成是“戴立清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呢？真是荒唐！至于李志侠当时喊的口号有其录音带为证，这不仅许多人亲耳所闻，就连他老婆也直言不讳地说了这是李志侠喊出的声音。而李志侠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喊这样的口号算不算“反革命”，应由历史来作结论。

全面落实党的政策

1. 落实清队政策

科技系统在原科委领导下，自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开始到1968年底，他们共清查“八类”人员2072人，我们进入时并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这些人总有点受极左的东西影响，认为科技研究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难弄，因为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说实在的，当时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不公正，什么“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加上有些人追逐名利不择手段，文人相轻互相倾轧，又不

愿暴露思想，确实难搞。所以在我们刚进驻科技系统时，开始也说过一些错话，这对当时的清队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清队一系列指示，主席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把八类分子挖出来，但要谨慎，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没有错误，有的单位搞了那么久，北京有个大学 9000 多人，就关了 600 余，这就扩大化了。（毛泽东“九大”在各大部负责人讲话）【叶注：戴原文中，前句有引号，后据无引号。也没注明讲话具体时间、来源。】

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本系统的清队情况，发觉全系统共有 23500 人，而被清查出 2072 人，约占 9%，这显然扩大化了。对此，我们有所认识，深感问题严重。必须要纠正，有错必改，有错必纠！从派下去的联络员和蹲点的汇报，清队中确有违反政策，逼供信等情况，就立即采取两条措施：一条是立即把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摸准、摸实向市革会汇报，并建议更换第一批进驻的工宣队、军宣队（因科技系统第一批进驻的工军宣队，我们不清楚，是市革会马天水、王少庸决定派的）。第二条措施是改派新的工宣队，加强团部专案材料的力量，并明确告诉他们的任务，拆“牛棚”、搭班子、开展整党建党，迅速对八类人员清理甄别。要求他们对人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既不能一风吹，也不能冤枉好人！凭心而论，在科技系以后的两年多时间，绝大部分精力是抓落实党的政策，并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冤”，真是一派胡言。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根据 1969 年 7 月的统计，科技系统从我们接手的 2072 人中，解决了 1521 人，约占 74%，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学部委员或三级以上工程师）28 名解放 11 名，局级干部 88 人，解放了 41 人，处级干部是 527 人【叶注：按下文二处提及的人数，这里的 527 人应为 505 人。】解放了 309 人，集团案子（二线一会）处理掉 4 起。

再根据 1970 年 12 月上报统计，被审查的人员解决了 2009 人，占当时关押审查的总数 97% 弱，余下 63 人。我们分析，已解决的 2009 人中，属一般性问题有 1909 人，约占 95%；属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有 46 人，约占 2%；戴帽判刑有 54 人，约占 3%。余下 63 人中有三种情况，仍须抓紧进行，一类是“一打三反”中又发现新问题的，有 18 人；第二类是问题基本上搞清但未结案的，有 27 人；第三类是本单位领导未抓紧处理的，有 18 人。

解放干部方面，局级干部 88 名，解放了 57 人，结合进领导班子有 27 人；处级干部（含科研、行政）解放结合工作的有 398 人。

2.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自文革开始至我们接手，科研单位的干部和专家、学者，绝大部分都已靠边，或者冲击审查了。在成立革委会时，他们虽有部分人被结合进班子，但大多数人没有被解脱出来。加上第一届工军宣队进所之后，又靠边了一批人。在我们第二届工宣团派驻之后，有意加强团部组织、专案材料的落实。我们明确交待，要他们加快拆“牛棚”，解放干部和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在经过较短的突击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据 1969 年 7 月份的材料统计，全科技系统共有局级干部 88 人，已解放 41 人；处级干部（含党政科技）505 人，已解放 309 人；知名人士 28 名（含学部委员 8 人）先解放的有：黄叔培、袁随善、计策、陈念贴、邹元■、黄鸣龙、卢鹤绂、蔡晔盎、张香桐、周光宇、施子京等 11 人。正在做工作的有李珩、王子江、沈岳瑞、葛和明、叶福年、王应睐等六位，正在审查中还有罗宗洛等九人。另外，由市专案组审查的有葛明（纺研院）、吕大元（光机所）两人。

在解放干部和“三结合”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干部的本身。因为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特点，其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参加革命时长，级别高，而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绝大多数人是进城以后从部队转业进了科研单位，环境变了，工作和生活都安逸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被冲击是难免的，但是有的人认识模糊，总是耿耿于怀，纠缠一些具体事实，鸣冤叫屈，与本单位的群众严重对立。这样就长期得不到解放、结合，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除了个别交谈，还多次办学习班，学习张子文同志的思想品质。

张子文同志是七院十一所的一位中层干部，也是从部队转业下来，他服从组织安排，急国家所急，克己奉公带领一批人常年坚持在环境艰苦的大三线建设工地上。他任劳任怨，远离上海的所领导，远离家庭亲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以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为榜样，处处以大局为重，事事以共产党员的要求起模范作用。尤其是文革初期，他抵制了无政府主义，坚守岗位，勇挑重担，保护了国家财产。也由于长期劳累，医疗条件也差，把身体拖垮了，得病也没有及时的治疗。累得有时肝区疼痛，他就蹲下来用木棍顶住，借以缓解痛苦。他从一般肝炎发展为肝硬化，再发展成肝癌……。虽

然当时得知这一情况，我让所里把他接回来治疗，并送华山医院的高干病房住院，请了肝病的教授和专家会诊治疗。当时能用的药、贵重的、进口的都用了，可惜太晚了。他在病重期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忘我无私的精神很是感人。虽然延长了张子文的寿命，但终于挽救不了他的生命。为此，我派三办办公室的胡斌同志，去七院十一所蹲点，调查了解整理张子文同志的事迹。对张子文的事迹在科技系统各单位宣传、学习，还举办巡回图片展览广为宣传。同时，通过报纸、电台扩大宣传。许多干部学习了科技战线上的标兵张子文同志事迹有很大的触动。

他们反映说，工宣队出了个徐松宝，知识分子中出现个姜真，我们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张子文。他们三个人，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心系群众，舍身救人，克己奉公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泣。赶有目标，学有榜样，对照典型，学不走样。一些干部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艰苦历程，对照和平环境的舒适安逸的生活，深感内疚愧对当年！一些干部认识提高了，就主动与群众接近。同时各单位工军宣队对各所的造反派办学习班等，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促进各所领导班子的团结，对消除思想上的隔阂，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技系统在“拆牛棚、解放干部、建班子”中，也有些人就是盯住某个人不肯放，可是又拿不出什么证据。为此，我们就采取易地安置，如原华东分院的万金，就安置到冶金研究所去；光机所的刘杰，就解放到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原材料研究所阮崇武，就安置到市科技交流站。这样处理的效果好，易地解放安排，从感情上，精神面貌上，工作的积极性等都有起色。

根据 1970 年底的统计，科技系统的局、处级干部共有 593 人，已经结案的有 552 人，其中局级干部已解放 57 人，结合进班子有 27 人。党政处级干部已解放 190 人，结合使用的 76 人；科技处级干部已解放 208 人，他们已全部回到各自的实验室岗位上。余下 41 人，因问题比较复杂，如陆为平、吴桂宝等人，尚待进一步查清。

另外，科技组根据上海市委、市革会的要求，分别协商推举了胡世全（胰岛素科题的青年代表）和林华英（高山生理科题组青年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协商推举了张香桐、黄叔培、周光宇、邹元■等科学家为爱国人士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礼，还有协商推举了光机研究所的专家甘福玺、计算研究所的陈仁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匡定波和生化研究所的施溥涛等人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里顺便说一下汪猷的问题。汪猷原为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所长。1968年2月，该所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汪猷是九名领导成员之一。但是1968年清队，9月间第一届工军宣队进所后，由于“二线一会”的牵连，就把他隔离审查了。当我们进驻科技系统，重派第二届工宣队、军宣队之后，明确指出“拆牛棚”、重证据，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汪猷被解除隔离了。事实上，隔离汪猷时，我根本不知道。然而叶永烈先生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却不择手段，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胡说什么“是戴立清把他（汪猷）列入了‘特嫌’名单的”——见《王洪文传》293页。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空军导弹部队，曾多次击落美蒋高空侦察机，从“U2”无人高空侦察机的残骸碎片中进行分析：其一它烧的是什么燃料？这件事是送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破译，是汪猷参与了解密试验，并检测出该燃油的比例成份。知己知彼、为我所用，汪猷是作出贡献的。其二，有一个电器类的玩艺，不知为何物？经上海技物所破译，最终发现它是一种红外线装置，作用于导航。把它的材料和构造破译出来，无疑对我国防军工的生产运用和掌握新技术是一个推动。

3. 抓学习，促进整党建党，完善班子

(1) 混乱状况

前面讲过在我们进驻科委时，没有与前科委的领导人见过面，对各单位有的领导班子和运动状况不清楚，只是从个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一点情况。

1967年5月份，总参在上海的办事机构以上海警备区名义，派以赵文为首的几位军代表进入市科委，当时马天水曾交待过，叫他们只管科委机关，不管下属单位。但是，科委系统下面单位的情况十分混乱，各方争吵不休，处于失控状态。曾经出现过三个组织都来夺市科委的权，还都声称自己是“新的科技组”，结果引起了“8.23”在华东分院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同年【叶注：戴原文讲“同年”，从上段内容和本段下面内容来看，似是67年。但后文讲与国防科委关系段中，有内容同本段内容一样的，时间标明为68年。但从全面分析来看，这个时间应是“68年”。】5—6月份，国防科委的研究院，从北京空军直属部队直接派来“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光学科技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五个单位；北京十四院也派来“军宣队”，进驻21和23研究所，据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审查这些所内各类人

员是否可以穿军装，各所由此引发较长时间的骚动。他们会同前科委一起，共同进行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工作，这七个所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进所的“军宣队”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加上1967年3月国防科委七院十一所首先成立的革委会，这八个所成立革委会后的领导班子都直接上报给国防科委审批。同年十一月份，【叶注：按后文与国防科委矛盾段内容，在68年3、4月间这些研究所才“一片红”都成立了革委会，同年5、6月间国防科委来人找马天水汇报的，马讲按中央67年11月2日通知，京外单位运动归地方管。】国防科委曾派人来沪向市革会汇报，马天水当即表示：你们国防科委的单位成立革委会，不要急嘛，因为运动归上海地方领导，等我们搞好班子再交给你们！从此，凡是北京在沪的单位已成立的革委会，未经上海市审批的都没有被明确承认，所以原先进驻八个所的军宣队不久也陆续撤出。

1968年3—4月份，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派出了军宣队，经市革会统一指派归口进入科委系统。以东海舰队后勤部副参谋长（后为副部长）廉林和袁叔平为领队的军代表（军宣队）进入科委机关，并设立了办公室。但到1968年10月份又自行撤离，什么原因不清楚。在他们进科委后的布置下，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2) 完善领导班子

当时由于清队扩大化和解放干部的政策不落实，许多所即使成立了革委会，工作也难以开展，有的无威信，有的形同虚设。我们进去后的方针是下决心“拆牛棚”、解放干部和搭班子。对已经成立的革委会采取调整、巩固、提高的办法，把一批已经解放的干部充实进去，把有条件的工宣队、军宣队代表结合进去。同时为整党、建党做好准备工作。

整党、建党的工作我们穿插在调整革委会班子同时进行。1969年下半年整党建党陆续开始后，由于我本人当时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可以插手党建工作，自己便主动退出，让军代表田树尧和老干部许言二人主持（不久我入党也过问此工作）。先搞建党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普遍展开。到1970年下半年，已有34个单位展开了，其中有153个单位建立了核心小组【叶注：“153”的数字，不应是“单位”数，疑是指到党支部这一级的数字。】个别支部还“吐故”了党员5名（4名开除，1名劝退）。按当时市委的规定，凡是建立党组织的单位，必须有“老、中、青”三结合，同时必须要有工宣队、军宣队两结合，否则上报的班子一律不批。

事实上，当时的新老干部和工军宣队代表都有不愿进班子的想法。老干部认为自

己文革中受冲击，是出力不讨好，多做多错，少做少错，还不如当个好党员；新干部没有经验，缩手缩脚，不敢挑重担，害怕犯错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政治上低头，业务上埋头，有事就干，无事扫地、泡水、洗瓶子；工人代表总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与知识分子缺少共同语言，难以搞好团结；军代表认为上级要求层层结合，但具体政策不明确，结合后是长是短，是否脱军装？有的认为，结合进去工作不方便等等。针对这些思想，我们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分析形势，提高认识，克服怕字当头推动各自工作。

(3) 抓学习，促整建党工作

首先在三办科技组成立一个中心学习组，办里三位领导当召集人，扩大组干组长周强华参加。中心学习组也吸收基层单位骨干人员，如老红军王慰农，老教授张香桐、王应睐、邹元■，老干部刘端、徐尚贤、刘杰，新干部胡世全、林华英等人参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带着问题分散调查，集中学习统一认识。每周一次的上午到三办学习半天，每次学习有计划、有课程、有主讲，以学习马列原著为主，联系科技系统实际各抒己见。这样连续组织了十多次学习活动，后因批陈（伯达）整风而中断。同时，我们要求在各基层单位推广，效仿中心学习组的方法，各级领导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务虚，提高政策水平。通过学习，上下普遍反映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

这里我摘录从美国回来的老科学家张香桐教授 1971 年 2 月 28 日在中心学习组的发言摘要。他说：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列宁在 1905 年批判孟什维克时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与过去不同，这是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故对知识分子牵扯较多。1952 年我回国要选派一批留学生，当时中央某领导有篇讲话，其大意是“现在中国的革命搞的差不多了，三座大山已被推倒了，我们要搞建设，你们到那里去不是学什么革命的理论，而是要学习人家的技术和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生理所选了一个人去英国留学，在出国之前先学英文，但他连组织生活也不参加了，结果英文学的不错，可政治上不行。培养专家，不要他参加政治学习，还说什么，“你们是科研人员，可不必学习马列主义。”这能行吗？改造知识分子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人，领导干部要创造条件，要有耐心，要认识到改造的长期性、反复性，不能急躁。但是，能否改造好，这要看自己主观上的努力了，决不能蹲在书斋里、实验室里，一定要与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才有作为。【叶注：这一段是戴的原文。戴讲是摘录张香桐的“发言摘要”，但因原

文中的“引号”用得不够明确，难以确认这一大段是否都是张讲的。】

对我们作为领导而言，应对科研人员有个基本的分析。本系统共有六级副研以上人员 315 名，其中从国外回来的占 80% 以上，他们都是中年科研骨干，能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爱国行为！他们在回国后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特别是在“文革”清队和落实政策中，对他们有不公正的对待，从而发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产生些看法，乃人之常情，应予以理解。只要坚决落实党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再引导有方，是能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我们作了这方面的努力，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同科研人员交朋友，生活上予以关心，真正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同时，选派一批科研人员进各级领导班子，明确一部分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课题的负责人或带头人。对少数不愿结合的人，待他们认识上有了提高，愿意由组织安排的，及时为他们创造条件予以安排。

所以，这次学习对促进科系统的整党、建党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系统属于党委或总支级的有 36 个单位，属于支部级的有 8 个单位，截止 1971 年 12 月 4 日的统计，已建党组织并经市委批准的有 26 个，结合工人代表 29 人，结合军代表 26 人，还有 8 个单位因工、军代表没有配齐，还有七院八所和上海计量局尚未搞好。另外 8 个支部单位已报审完毕。

工宣队中的标兵徐松宝

1.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工宣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体现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在各方面实现统治地位。因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中的领导阶级，这是她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她的先进性和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

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就不仅在名义上、形式上，其内容上都应体现她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中优秀分子要参加国家的管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意识到了这样做的重要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意识的培养工人队伍，工宣队就是一种尝试之一。我们的国家宪法、中共党章都明确写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但文革前的各级领导层中（特别是上层领导）有几个是工人出身的？为此培养工人和农民的优秀分子，逐步走向各级领导岗位，要从组织上体现

出来，而不仅是名义上。

“文革”中凡是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就能左右形势，各方面工作就有生气。远的不谈，在被称之为“动乱”发源地的上海，在各兄弟省市的支持下，经过上海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的努力，文革十年中的上海经济总值，“一个上海变为2.2个上海”。上海生产的轻工产品80%是调拨全国，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是上海上缴的！工人师傅们急国家所急，想人民所想，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我们没有物质刺激，没有奖金，凭的是一颗火热的心。因为困难前面有领导，冲锋带头有党员，根本没有名利观念。

“文革”中，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工人当成宝，事事处处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机会，让工人自信、自强、自立。作为有良心的工人，如何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自身非无产阶级的弱点。所以，毛泽东也告诫过：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环境中，发扬正气克服丑恶，积德扬善服务人民。

2. 抓先进典型，学习榜样

我们要求工宣队在工作实践中事事注意自身的形象，在工作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思想教育是我们组建工宣队工作中抓住不放的，仿部队编制，给他们创造机会，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不断总结、评比，交流、学习先进经验。还要抓住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让大家学有榜样，使工宣队在工作中提高，在提高中工作。

1969年7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纪念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一周年的大会，会上除了几个典型单位的发言外，市革委会还宣布了一决定，即“授于在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战斗中，为抗洪抢险而英勇牺牲的中共党员徐松宝同志，以‘优秀工宣队员’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向徐松宝同志学习。

徐松宝同志，是上海汽车底盘厂的一名老工人，他参加科技系统的工宣队后，就进驻国防科委十四院的21所。该研究所有个军工科研项目产品的工厂，在浙西临安县境内的于潜川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他带领几名队员来到浙江这个工厂。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没有怨言，远离大城市，克服种种困难，处处以身作则，使厂里

各方面工作很有起色。天有不测风云，1969年7月初，一场特大暴雨倾盆而下，顷刻间山洪暴发，沿山沟奔腾而下，瞬间房倒屋塌。徐松宝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突然喊出洪水就是命令，带领工宣队员冒雨冲出厂门！可是水势太急，无法下水，他急中生智，急忙跑回厂中找了几根粗绳，一路冲下找了个水流缓慢处，带着绳索游向对岸，让绳子两岸生根，利用绳索拦截被冲下来的人和物。徐松宝又和队员一起依托绳索相互接应救人、抢物，在洪水中往返十数次。这时在工宣队的带动下，厂技术科的女技术员姜真深受感动，也奋不顾身的跳入水中与徐松宝等工宣队员共同战斗。由于在水中时间较久，水流越来越急，体力不支，徐松宝同志和姜真同志先后被洪水淹没冲走，最后两位烈士光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消息传开，临安县为之震动，当地民众不用动员，纷纷自觉成群来瞻仰烈士，久久不肯离去。金高村有两位老人，泪流满面的表示，一定要把自己心爱的棺木捐献出来给两位烈士。当晚有三十余人自愿排列在烈士身边，彻夜为之守灵。县委决定第二天召开追悼大会，周边几十里外的民众一早赶来，献上一百多只大花圈，群众手采鲜花献给烈士，场面十分动人！工人阶级的代表、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他们的行动，永远鼓舞着我们。追悼会一直开到上海派来的灵车到达，可是当地的老百姓仍然不散。当灵车启程返沪时，民众边送灵车边喊灵车呀“慢慢的开啊！”一直送到十多里地以外。临安县委常委娄去仁同志也随灵车送至上海，代表当地政府和人民表示对上海工人阶级的致敬和谢意！

据浙江省水文站的测定，此次特大暴雨是历史上百年不遇，降水量达200毫米，所发山洪比1922年的特大洪水还高出1—2尺，使整个于潜川内六千多人口无家可归，民房倒塌七、八十间，供销社房屋冲倒十六间，二千立方米的木材全部被冲走。最惨的是人员伤亡和被洪水冲走一百多人，损失惨重！

徐松宝和姜真两位烈士的光辉事迹，对我们上海工宣队员，特别对科技系统的运动推动很大，教育深刻，不少科技人员说：“工宣队师傅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那里有危险，那里就有共产党员。”这个事实活生生地批驳了那种不怀好意的人，说什么“工宣队是棒子队”的谬论。同时对知识分子中涌现像姜真这样的女英雄，深感自豪！

我们抓住这样事实进行宣传、学习，对加强工宣队自身建设，进行自我改造，向英雄学习找自身差距，各单位联系各自实际学英雄。这样对各项工作开展，搞好团结，抓好科研的开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科技系统的斗、批、改。

应该看到，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产业工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派出工宣队全面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特别解决了“老大难”单位七百多个，对稳定上海局势，促进各个领域、各方面的工作，推动生产、科研的发展，广大工宣队员是有很大贡献的，工宣队的功绩不可抹杀！

与国防科委的关系

国防科委在上海有不少研究所和工厂，它们分别属于第六、第七、第十、第十四等研究院管辖，仅我们管辖范围内就有十六个单位。在国防军工产品的研究、生产上，上海与国防科委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文革中却发生了许多的矛盾和磨擦。因为上面的研究院有各大派组织，也就直接影响了下属单位。如上海的702所、704所、708所和711所最为突出，上面7院有两派，这几个所也分裂成“无革派”和“解放派”，且派性十足，势不两立，互相攻击对方。“解放派”指责国防科委是“无革派”的后台，“无革派”指责上海是“解放派”的后台，文斗不成就搞武斗，甚至联合几个单位一起搞武斗。“8·8”大武斗就造成南京东路交通阻塞数次，闻名全市，影响极坏。在我们接手之前，他们已打斗了两年，在我们接手之后，仍打斗不休，有些问题竟发展到一派直接对着市革会！为什么对市革会越来越对立，我们分析有两件事市革会处理不当，一是“4·12”炮打，二是不承认国防科委批准成立的所革委会和派出的工军宣队等，由此埋下了几次大波动的根子。【叶注：戴原文中讲到：对在沪国防科委研究所的问题，我们分析“有两件事市革会处理不当”。但下面讲的对这二件事的处理，并没指出“处理不当”处。】

1. “4·12”炮打问题

1968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街头上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七院各所的“无革派”分别卷入，七院11所原党委书记田震环、八所原所长李志侠等均直接地参与起草和审定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口号。八所原副政委靳立民两次派人去摸张春桥的底细，还写了“叛徒最后的留言”等。据八所一个技术员反映：“‘4·12’炮打之风是从北京刮过来的。”张春桥自己也说过：“‘4·12’事件是否聂荣臻搞起来？也不能定，但有迹象表明与聂荣臻有份。”

我们接手科技系统后，由于情况不明，开始并没有重视，后来王洪文、马天水要

求一、二、三、五、六工宣办把“4·12”问题查清。王洪文还上纲上线的说，谁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等。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认为“4·12”的炮打焦点是“叛徒”问题，所以我们第二批工宣队进点后，要求他们认真清查这个问题，弄清事实。结果是徒劳，实际上炮打的人怎么也拿不出证据。此事一直拖到1970年初，根据中央“一打三反”的文件精神，经市革会批准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斗田震环等人的大会，会上由市公检法拘捕了田震环，以后此案如何发展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2. 审批革委会的问题

1968年国防科委对上海的研究所均派出了军宣队，同年三、四月间这些研究所在原市科委的领导下，搞了所谓的“一片红”即普遍成立了革委会，送到国防科委审批，其成员基本上全部是“无革派”一派的人，国防科委派的军宣队不少也结合进班子。1968年的五、六月间，国防科委派人来上海向市革会汇报在上海各所的情况。马天水当时表示：按中央1967年11月2日的通知，凡在京外单位的运动应由当地部署进行，关于建班子问题，要等我们搞好了再交给你们。讲话的意思是对已成立的革委会不予承认。此后，王洪文也讲：军宣队为什么要从外地派来，上海有三军的部队嘛！于是原先派去的各所军宣队也随之撤走。由此又引起新的矛盾，“无革派”说：你们不承认国防科委批准的各所革委会，我们也不承认你们批准的所革会等。以上两点可以说是以后几次反复的根源。

3. 关于批“二月逆流”问题

当时全市都在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康办”的联络员曾去七院几个所采访，写了篇稿子登在647期的《简报》上，王洪文批语：“告诉工宣队、军宣队‘二月逆流’一定要认真批判。”马天水批：“进驻二、四、八、十一所的工军宣队，这样表态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应该通过批判‘二月逆流’干将聂荣臻，消除流毒，增强团结。”同年12月9日马天水在市科技系统大会上再次说：“聂荣臻挑动两派群众斗群众，压制解放派，支持无革派，我们不应该说解放派翘尾巴”等。

此话一传开，反应十分强烈，“解放派”一方纷纷起来指责工宣队和军宣队，认为（第一届）工军宣队支持了“无革派”，压制了“解放派”，认为军宣队不敢批判“二月逆流”。四所的王金荣质问：“海军支左人员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宁波海军

支左支错了，他们倾向‘无革派’，要求调换陆军来，如果不接受教训，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工军宣队赶出去！”还有人说“丁恒高的入党是上海光机所原副所长邓锡铭介绍的，邓曾五次翻案，中间去找过丁，丁就去请示聂荣臻，聂说叫他回去干工作好了。”

“无革派”一方则说：“上海批判‘二月逆流’，聂荣臻究竟有什么错误？请工宣队讲讲，批聂不能否定国防科委的成绩，对他也要一分为二。”

“康办”的这份《简报》对军宣队震动很大，尤其是四所的军宣队认为《简报》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纷纷要求联络员来所解释，承认错误，此事闹得很大。我们反复做工作，仍劝不住，甚至指着田树尧说：“你没有原则，‘和稀泥’。”后来把事情反映到东海舰队政治部，刘济民和刘浩天政委均有批示，刘济民副主任批：“我们军宣队应该表态，严肃批判‘二月逆流’中的聂荣臻，军宣队不表态是错误的。”刘浩天政委批：“同意刘济民同志的意见，要查清，严肃批判，并写出检讨报市革会和舰队党委。”此事总算告一段落。以后七院各所的工军宣队也陆续撤换了。

4. 关于“放假”和“游泳”的问题

1969年7月，国防科委下发通知，要求各所一是执行军队的夏季作息时间，二是“八一”放假一天，三是开展游泳训练。各单位看到此通知反响很大，工宣队认为这些研究所并没有穿军装，怎么可以享受军队的待遇呢？至于游泳，上海游泳池也很少，各所就租借大客车去淀山湖，往返三个多小时，既费时又耗油，所以纷纷向三办反映，要求制止。我们向市里如实报告，张春桥知道调看通知后，表示不同意放假，于是国防科委在沪的单位又掀起一场大风波。此时恰逢上海正在贯彻中央“7·23”布告，7月31日在人民广场20万人大会上，全市点了三十三个单位的名，其中就708所、711所和21所，这些单位会后更是火上加油。711所的“无革派”就直指市革会，李明德说：你们过去批聂，说他搞多中心，这次放假是军委的命令，为什么不准放？他妈的，是谁在那里搞多中心？包围（指闹得凶的单位）问题，中央是用解放军，你们却用文攻武卫，与中央唱对台戏，游泳也与中央唱对台戏。王永祥说：“4·12”扩大化了，我们上当受骗了……。房再勤说：张春桥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说啦，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张与许世友是互相反对的，尤太忠与许世友同观点的，搞不下去时，我们就去无锡找尤大忠，一起打回上海来……。马德恩说：708所有人说李志侠的录音（见后面）

我们没有听见，这完全是马天水搞的鬼……。

针对七院系统出现的情况，我们大力宣传了“7·23”布告，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言论进行批判，针锋相对，稳定形势教育多数。

5. 苗宝鹏事件

国防科委 14 院在上海有两个所，一个工厂，即 21 所，23 所和 822 工厂。1967 年 4 月 29 日，两所经该院批准成立革委会，原有军代表参加，后因故被召回。两个研究所属市三办科技组管辖范围。1969 年 6 月份，院部一个叫苗宝鹏的科长来上海，在院属的所、厂推广一种润滑剂，他本人支持“无革派”观点，在 822 厂和 21 所、23 所内讲了许多不利两派团结的话，并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式，到处传布说：“你们的体制马上要改变，‘8.1’要下命令，再改成军队”，“谁把器材调走谁就是反革命”等等，对立派自然很反感。822 厂的头头就报告了机电二局，二局的头头岑麒麟就把苗宝鹏扣起来。这时 14 院院长彭煜也在上海，他知道后，马上要 23 所开介绍信住进和平饭店，他自以为这样较安全。此讯传到北京说苗宝鹏失踪了，14 院的韩刚于 7 月 4 日即打电话给 23 所的徐毅，要追查苗的下落。消息一传开，两个所的“无革派”就哄起来了，扬言是工宣队把苗关起来的。

此时正逢上海大规模地宣传贯彻中央“7·23”布告，21 所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全所共有 615 人，而平时旷工不上班的占 50%，技术人员中有 70% 无事可干，要求调离的就有 90 余人。所内的事故不断，自 1968 年 12 月以来，连续烧坏微型电机 22 台，其中范祥洪一人就烧坏 8 台。“八一”晚上人民广场开 20 万人大会，【叶注：上面文中讲是 7 月 31 日开的大会。】所里仅仅去了 47 人。

第二天工宣队拟向未去开会的人传达大会精神，但该所第二把手周长新却闹得很凶，他刚从北京回来就说：“谁想用宣传‘7·23’布告来压制群众，我们所革会就坚决抵制！你们宣传‘7·23’布告，首先是工宣队要检查，因为你们违犯了‘布告’和‘6.6’通令的，‘8.1’不放假，是上海搞独立王国嘛！”说完拂袖而去退出会场。23 所对市革会不同意放假的事，反响更强烈，他们到处打电话，找国防科委，找上海警备区给予支援，并与各单位串连。为了苗宝鹏的事，他们串通一些人闹起来，逼迫工宣队放人。如果不放人，就赶走工宣队……。

6. 王尚文和清查“516”问题

“516”这个组织是1967年5月在北京发展起来，当时它对上海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1970年2月4日和8日，张春桥、王少庸分别在市革会会议上讲过，清队中对历史问题较重视，对“现行反革命”重视不够，有些人名义上造反，实际上在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516”那些人，他们专搞阴谋活动，这就是现行反革命，应该下去摸一摸。1970年3月27日，中央颁发了(70)20号文件，主要内容是肯定有“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批判那些认为不存在“516”的思想。

我们三办科技系统，对“516”问题反映不大，行动并不积极。当时我们的重点，是贯彻市里关于抓好本系统三分之一单位的问题。我们派了三办组织组负责人在七院八所蹲点，发现该所的工军宣队相互观点分歧很大，互相不协调。其焦点人物是对军宣队负责人王尚文的问题。王尚文调来八所之后，对该所的清队认为是右倾，没有大张旗鼓的搞下去；对整党、建党工作，认为走过场，持否定态度。对此，我们领导层很重视，及时向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反映。支左办公室也去了几次，希望他们把八所的王尚文调换。高志荣副司令表示，这件事不要急，王尚文是带着北京的观点来上海的，再观察一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王尚文本是海军装备部的一个处长，为了照顾其家属分居两地，1970年1月就安排他到上海708所支左。然而，他下车伊始，象上面派来的大人物，到处指指点点，信口雌黄，从不安份，不讲正气、能吹善拍。他一到八所就散布：“上海有许多事情不如北京处理得好，对‘4·12’事件，一搞再搞，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而对‘516’问题，却按兵不动，不清查。”王尚文多次来三办找我们，介绍国防科委系统清查“516”的情况。并向我们提供了查出来的“线索”，要我们按他提供的“分布图”、“组织系统”清查。我们当时听他所讲，清查面之大，人员之众，简直不可思议。由于我们科技系统清队初期有了严重的教训，而且正在逐步清理落实政策，如果按照王尚文的说法，不知又有多少人遭殃。对于如何把中央的精神同本系统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同田树尧、许言等人意见一致，坚决抵制王尚文观点，并且提出要警惕有人故意想搞乱我们，破坏上海的形势。我们认为必须通过抓三分之一的单位，进行蹲点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摸准情况再开展工作，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绝不搞“大呼隆”。我们多次向王尚文表示三办科技组的态度，他根本听不进，还追问对中央(70)20号文件，外地均已传达，为什么上海不传达（实际上海是逐步分批传达）。王尚文一意孤行，

不听我们解释，自己在八所布置、发动，开展清查“516”了。这是我们三办科技组与王尚文的第一个分歧。

第二个分歧，对清查是抓组织还是抓罪行。王尚文不知从何处搞来所谓的国防科委“516”组织的分布图，他说五〇二厂的朱国大1968年7月在北京参加了七院“516”头头召集的会议，朱还填了表并带回（一般成员）的表格200份。王尚文根据此线索在八所清查填表的人，一下子就搞了几十个人，但什么具体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我们对王尚文的如此行为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2月8日，中央发了（71）13号文件，明确指出：“清查‘516’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集中抓罪行，一个个落实……不要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表格”。此时王尚文自知搞错了方向，犯了错误，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大放厥词迷惑群众，企图嫁祸于人。王说三办不支持他清查，并说：“我来八所是不怕困难，首长对我说过，你顶得住否？我说，我顶得住……。”王尚文还散布，三办不支持他，三办里也有“516”分子。

清查“516”在八所搞不下去了，有人问王尚文怎么办？王说：“不要急，我要向王维国汇报一下。”但不久“913”事件发生，运动转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上来，这时王尚文却急急忙忙地想要返回北京。经请示市革会批准，即于1971年10月23日宣布王尚文留在八所办学习班，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在八所学习班上，揭出了王尚文的许多新问题：

一是极力吹捧林彪，他说“林彪副主席”是最忙最忙的人。不论大小会上，王尚文选读语录，总选林彪语录比毛主席语录多，他还胡说：“丘八管秀才，这是林副主席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化了。”

二是吹捧李作鹏，他说李政委一贯紧跟、一贯高举，一贯正确，学得早、学得好、学得活，去年（70年）五、六月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各方面焕然一新，部队有很大的变化。李作鹏真是了不起的人，别人找他不容易，我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直接去他家见面。并讲：“李政委指示我在八所召开一次干部路线的准备会议，到时候我一定让你们科室来参加。李政委的姿态很高，过去整过他的人，如苏振华现在都安排了他的工作。”

三是自吹自擂。他说当年马克思不同意《巴黎公社》的起义，但是他认为“公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同八所开展清查“516”一样，我明知搞不起来，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又说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我那时正在苏北与国民党谈判……。

四是重新挑起派性。王尚文散布北京大小三军，大三军是支持“无革派”，小三军是支持“解放派”，你们八所的两派都是与北京两派挂钩的，上海只搞“4·12”，不查“516”。七院二所全搬到无锡，他们的运动就是比上海搞得好。现在七院归海军领导了，属于军队系统，为什么还要派工宣队，为什么要工宣队结合呢？等所长、政委体制确定下来后，现在的革委会就要一脚踢开，你们工宣队也要撤走了等等。

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1971年11月17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王尚文又被上海警备区收容去办学习班，其后如何处理，我们不清楚。

7. 一个穿军装的骗子——陈问心

陈问心原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处长，一九六九年五月间，他持国防科委原主任王秉璋给马天水的介绍信，专程来上海搞所谓的“课题研究”，住在延安饭店三楼。当时马天水批示要“三办科技组”给予支持协助，马天水还当面对我讲：“陈问心多次写信给周总理，说要搞个什么项目，总理让王秉璋过问一下……。”有这样的来头，我当然不能怠慢，于是我同田树尧商量，让他负责派两个人了解一下。田树尧亲自去延安饭店，拜访洽谈。后来才知道陈问心是陈庚大将的堂弟，据国防科委驻沪办事处白处长介绍，陈问心在单位中名义上是在工作，实际上每年小病大养，养尊处优，专门寻医找长生不老药。

陈问心谈话的大意：我这次来上海，主要是想搞一项尖端科技“电磁分离”的研究（其实，他本人是不学无术，狗屁不通的）。这个项目搞成了，其作用非常大，一是航空航天需要它，二是用在医学手术上，开刀不出血。现在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报导，目前美帝、苏修都在竞争，都想抢在前面。现在我已经找好了协作对象，就是你们上海的一位医生，叫吴度民。希望你们科技组给我创造条件：一是要求提供一个研究的场所，最好是把交通大学游泳池边上一幢小洋楼改建一下，由华山路开门单独进去，可以通汽车；二是要求配一个年青的女保姆，最好独身一人，既会烧菜搞卫生，又能接待客人，政治上绝对可靠；三是要求拨给经费，我们请来的人费用和补助上海市粮票；等我们进去之后，再具体规划一下需要的人员、添置的设备，比如简单的科研设备仪器、电烘箱、电冰柜等等，这个我造个预算给你们。

我听了这些“天方夜谭”真有点玄乎！他提的什么“电磁分离”，科技业务组还专门请原子核研究所的专家从理论上论证过，根本不可能的事。我既不信，又出于好

奇，再次同田树尧等人去延安饭店找陈问心交谈。陈又是大吹特吹，他的新发现“电磁分离”是现代科学尖端，我只有与吴度民合作才能行，这个科研项目没有他不行等。他还领我们参观了对面房间，看到两个（女军人）护士及一些盆盆罐罐，医用器皿。我把女护士叫出来询问情况，原来其中一位就是陈庚大将的女儿。她说：我早想回医院了，他不让我们走，也不准我俩出门，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中草药，整天叫我们磨碎，还得给他推拿。我母亲对这个叔叔很反感，说他一直不干正事，到处吹牛说假话。听了女护士的诉说，更加怀疑陈问心来上海究竟想干什么？我当即同田树尧商量决定，找饭店领导，以市革会三办的名义通知，请两位女兵立即回原单位。陈问心的这个谜要揭开，谜底必须从吴度民入手，决定由老田亲自调查搞清。

首先找到市卫生局工宣团团部专案组的金国民，金说吴度民没有工作单位，是无照行医，现住静安区胶州路，据吴自己吹嘘说，他在北京时，有总理的秘书开车送他回家，有个张军长对他很好，自己家中有一种贵重的药品，每斤二百元等。

因吴度民没有工作单位，我们就去了静安区愚园街道了解。据该街道负责人陆光生和民警张文娟的介绍：解放前吴是贵州省贵阳市伪警察局的秘书，有特嫌。解放后他从北京来上海，进入中西药厂，1962年时被开除出厂，文革中被抄家，今年（69年）三月我们曾发动群众检举他。同时也去过市专案办，但市专案办的王传彦却为吴说好话，说他给许多人治过病，今年四月份还给四个人治病，有张军长、王少庸，另外两人不能告诉你们。还说，北京也有人为吴度民翻案等，现在（69年）市革会有关方面已把吴度民的问题交给了杨浦区公安局军管组去审查。

接着我们找到了杨浦区公安局军管组（空军）代表段永德组长，段说：今年（69年）5月13日市革会把吴的问题交给我们办理，但没有详细的材料，去“公检法”也查不到。卫生局一把手洪明贵曾说过，这一类的问题，要找他才行。有人揭发吴度民曾在周立夫家住过，后来从周家抄出手枪和电台，周母称这是吴度民给的。段说：吴度民是1954年就认识了陈问心的，吴给陈治过病，陈在二军大、空军医院均住过院，还拿吴给的药送给同病房的人吃，据说吃死了一个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又走访了市专案组（高安路），正巧又是王传彦接待，王说：吴度民你们应该保护他，毛主席都知道他，有“手迹”，刘少奇也有批示，抄家时都遗失了，现正在查找，如果找到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能治肝病，开刀不出血等等。

根据以上我们了解的陈、吴情况，如实向市革会汇报（简报形式），马天水很厌

烦地对我说：陈问心这个人陈庚大将的堂弟，他一直以其兄的名义在外搞招摇撞骗，不务正业。王洪文也说：你们去批他一顿，然后叫国防科委来人领回去。我根据王、马的意图，就与“工总司”几个头头在康办开好会，一齐到了延安饭店对陈问心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主要问他三个问题：一是“电磁分离”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与吴度民合作；二是究竟来上海干什么？三是到上海后还与那些人接触？在他的房间，我和陈阿大、黄金海等人都讲了话，陈问心自己感到荒唐、理亏，语无伦次，支支吾吾认了错。至此，我们当场决定，让陈问心搬出延安饭店三楼，另找一间房子写出到上海活动的交待。过了十天左右，陈问心草草地写了两张纸，承认自己有欺骗行为，企图利用研究“电磁分离”这种虚构项目，想找一所小楼来供自己使用。我们连同三办出的《简报》上报市革会，并告知国防科委，请他们来人把陈问心领回去。至于吴度民，因他由杨浦公安局军管组办理，我们没有再过问。这场由陈问心“电磁分离”而引发的闹剧，至此完结。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陈问心的检查只是表面应付一下，其灵魂、内心却潜伏着杀机，韬光养晦伺机反扑。

一是陈问心在同年七月份又回上海，再与吴度民串通实生所、生化所和曙光医院等人，搞什么偏方膏药，并派人去外地采购蜈蚣、蛇和乌龟制成的膏药，用在许多人身上，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曾记录有此药效果不好的结论。包媛美患者也说，用过吴度民的药是疼痛的，拒绝使用下去。说明陈问心、吴度民继续做江湖郎中，搞招摇撞骗。

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陈问心认为时机已到，一张状纸传送到周总理手里，胡说1969年5月在上海遭到空四军王维国的如何迫害。陈企图利用林彪事件把水搅混，来为自己翻案。说也凑巧，当时我正是王维国“专案组”的负责人，对陈问心问题的处理十分清楚，于是我如实把当时对陈的处理过程和材料，如实向总理办公室汇报了。正好，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也知道事情的全过程，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了此事。陈问心的妄想未能得逞，黑状未告成。

三是据海军外调人员和国防科委驻沪办的人员讲，陈问心在本单位小病大养，不工作，专搞歪门邪道，卖狗皮膏药。这种事竟搞到董老夫人何莲芝的头上，使其受骗上当。陈问心吹嘘说：“董老的病可以用他的膏药治好”，借此向老夫人索取贵重的中药材和毒蛇若干条。东西被陈骗去后，却迟迟不见膏药送去。此事即被陈问心本

单位的对立派发现，他们向中央办公厅揭发此事。说来也巧，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后，直接管过国防科委，下面揭发陈问心的材料，正转到王洪文的手中，联系到陈问心 69 年在上海的招摇撞骗，于是王批转国防科委，要求严处陈问心。这件事被王秉章拖着未办，但陈已知道王洪文的批示，他既恨又怕，处心积虑窥测方向，进行倒算。

四是文革之后，陈问心认为复仇的机会来了，他第二张状纸送到华国锋手里，他胡说：“上海有一个整周总理的黑材料集团。”其依据是：“1969 年在上海延安饭店，我被造反派批斗过，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指着周总理和康生的照片，责问我，是不是他两人派来的，他们叫你来上海干什么？”真是血口喷人，一派胡言。可谓“一封诬奏九重天，御笔一点囚数年。”华国锋立即钦指海军、上海和东海舰队严加揭批查，于是被停职的、被关押的、被审讯的、被会上批斗的……。凡是参加过当年在延安饭店批陈的人无一幸免，而且层层加码，轮番挤压。假的就是假的，对陈问心这种渣子有什么可交待？主审者乱扣帽子，被审者不知内情。有时被审者主动提出：“你们想要问什么写在材料上，我签字可以吧。”根本不讲事实，本来就是一场子虚乌有栽赃，陷害的冤案，就是抓住不放。

就这个问题，审查了四、五年，什么也没有查到，市科技组军代表田树尧就是为了此事，深受不白之冤。直到 1981 年，他们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就此草草收兵结案，还胡说什么“当初立案审查是不当的”。【叶注：应指当年审查陈问心事。】真是草菅人命，田树尧同志被停职审查达四年之久，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然而，那个制造这场冤案的大骗子——陈问心，却安然无恙，逍遥法外，岂有天理可言？！

李志侠、陈问心、王尚文之流，虽然他们胡作非为，各人表现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就是心术不正、品质低劣。李志侠早在苏北解放区时，就生活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名声狼藉。进城之后又披上老干部的外衣；陈问心、王尚文都身穿军装，招摇过市，拉着虎皮作大旗，掩盖着无耻的行径。明明他们自己违反党纪国法，受到应有惩罚，是咎由自取。然而，却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窥测方向。一有风吹草动又成了“大英雄”，贼喊捉贼，恬不知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败类，此种人不除国无宁日，公民的权益是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科技交流活动

1. 国际学术交流

党的九大以后，上海科技系统在国务院外办的关心下，也陆续展开了对外科学技术的交流。

首先是美国的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登先生来访，高本是去越南实地考察美军施放绝灭庄稼的生物毒剂，顺道来访中国。他对美军这种破坏生态的罪恶行为深表愤慨，他说道：人们既然可以使植物不开花结果，同样人们也可以相反，让它能开花结果。经外事部门安排，由植物生理所接待，客人访问马陆公社，了解市郊的农业生产情况。高对“文革”中发现和推广的“920”植物生长激素很感兴趣，详细的询问，并和当地农民洽谈交流。中午由马陆公社作东，邀请客人们共进午餐，当客人尝到肉丝蛋汤时，就觉得其中的榨菜味道特别鲜美，就问陪同（翻译）人员，此为何物？其植物学名称？可是译员语塞翻不出来，解释了半天，只是说榨菜、榨菜……弄得哄堂大笑。

接待的第二位客人，是国际地球物理协会负责人，是加拿大籍的人，他携其夫人来我国，走访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上海佘山天文台，并向有关科研人员作了“大陆漂移”学说的学术报告和交流。客人比较满意中国之行，表示感谢中国友好的接待，我们完成第二批接待任务。

第三批外国客人，有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植物系的田中教授夫妇，他们是慕名“920”生长激素来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另一对是德国的科学家。我们都热情认真接待，离沪前由我和田树尧作为政府代表，分别在锦江饭店、和平饭店宴请他们。对锦江饭店丰盛的午宴，两位老人非常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十分羡慕、称赞，尤其老夫人拿起相机把每道菜都拍摄下来，还问是什么菜名。

我举这几个小例子，一是想说明早在建立中美、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策划与全世界人民进行交流交往，不仅是第三世界，也包括第一世界。二是想说明，东西方的国情不同，文化、生活饮食不同，需要相互交流、相互融会发展。

2. 成立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我们进驻市科技系统后，经市革会同意，把原上海市“科协”改组为市科技交流站，并以原“科学会堂”作为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市和各区、县、局、大学的科学技术交流站，以科学会堂为中心，把全市的科技工作者、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能工巧匠们集中起来开展交流活动，可以对重点工程项目，各种疑难技术问题进行“会诊”

攻关，搞社会主义大协作。这样能更好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研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解决生产上存在的技术难题。

市科技交流中心在日常工作中，也注意发现人才，把各行业的高手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批技术专业队伍，如电焊专业队、金属切削队和大型机修队等等。每一支专业队，都是在全市挑选优秀选手，进行技术比武，选出来的尖子。交流中心还组织各种展览会，如比较有影响的电焊展览会，金属切削展览会。各区县的技术交流站，也根据本地区实际，按不同行业特点，进行科技交流和科普活动，如电子行业多的就推广有关电子知识，农村按季节和生产的需要宣传普及有关农业知识。这些科技交流活动，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技术难题，有效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各区、县的科技交流站在普及科技知识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有的结合本地区的生产、生活实际举办各种展览会、图片展、培训班等，传授生产、生活、卫生的科学知识等。一些地区的科技交流活动搞得很活跃，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市科技交流中心还组织一些单位，在全市较醒目、人流量大的地段设立科技橱窗，用文字、图片、模型向市民展示科技成果，传布科技知识，达到推广普及目的。

3. 华罗庚教授在上海

(1) 接待华罗庚教授

1970年6月10日下午，华罗庚教授来到上海。早在前几天国家计委就电话通知了上海，马天水批示：华的食宿由机关行政组安排，学术交流由三办科技组安排。华罗庚教授就被安排在和平饭店南楼，给了他们两套客房套间。我和田树尧当天即去拜访华教授，我与老田都曾读过华教授关于“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立志要做一个有用的中国人”的故事，所以对亲眼所见的、和蔼可亲的老教授，我们十分崇敬。

华罗庚教授对这次来上海十分兴奋，同我们谈得也很多。其谈话的中心意思，他非常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关怀。老教授边说边拿出毛主席手迹的复印件，第一封是祝贺他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第二封是鼓励他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告诉我们，这次就是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上海，他想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同工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解决些实际问题。他畅谈了上海的变化，回想当年从上海出洋的情景……。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文弱的书生，身背行囊，从上海的码头边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海轮的舷梯……”

华先生此次来沪，正值炎夏，然而他住了两个多月。他的卧室正对着海关，大楼的钟声不断地报时，对他的干扰实在太。起初他不开口，后来从他的随从处得知，但尽我们的努力没法解决。不久老先生得了重感冒，并由此引发了心脏病。我亲自通知卫生局，陪他去华山医院高干病房，请华东医院会诊检查，请专家给予诊断、治疗。我和田树尧还请他到市府大礼堂观看“革命样板戏”，在生活上尽可能的予以方便。华教授在沪两个多月，我们经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为此结下了友情。华老回京之后，连续给我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给我和老田两人的，第二封信是给我个人的信。信中热情洋溢，对他和他的工作组在上海期间，得到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关心，表示感谢之情。华老还把他家的地址、电话都告诉我，让我有机会去北京时到他家作客。

(2) 聆听华老讲授“优选法”。

华先生来上海后深入生产第一线，用他的多年研究成果——“优选法”，解决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给国家作出了贡献。我自工作之后，不失时机的学习求知，过去就曾崇敬的大师来上海，我怎肯放弃这个良机呢？大师的谦和态度，令人无拘无束，于是我很随便的向先生求教。

我说：华老，我对数学一无所知，对先生的科研成果“优选法”，您是否能用简单的语言，最简单的方法让我能听懂你的“优选法”，也可以让人家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华老先生笑咪咪的拿了一张纸，用手裁下一条边，对我和老田说：“这一张纸条，它任何长短，始终确定代表‘1’，如果你想需要选出自己最佳点，不需要盲目的从0开始寻找，只要先在‘0.618’处先做一个测试，这一点作为基点。再对基点的另一端，也作为‘1’，在基‘0.618’处再作一点进行测试。把这两点的测试点进行比较，如果第一测点比第二测点理想，那就把第二测点处撕去。用同样的方法，把留下来的纸仍作为‘1’，在‘0.618’处作一测试，这样在原来的一张纸条上已测了三个数据。把三个测试数据进行比较，看那一点的测试是你需要接近的点，对那另一边不理想的测点撕去。留下来的纸条越来越短，反复重做上述试验，把一张纸条测试到最佳点。”

华老停顿了一下，看看我说：至于“0.618”的来源，那是我算出来的，非常繁琐，公式很多，你根本不要去理它。如果有的试验有几个不同的数据，比如有的既要温度，又需速度或其它什么，你可以用横座标、竖座标、斜座标用上面的方法分别进行。

有一次老教授外出讲学回来的路上，田树尧同志在路上问他：听说华老在美国时，用算盘计算，超过美国的计算机，有没有这件事？华老说：在计算领域里，美国现在也就是“0.618”这个水平，比我们高不了多少。

这次大师面对面，手把手的教诲，至今不忘。

(3). 华大师上海之行的三大贡献

华老来上海时间不长，但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深深的衷心感谢他。

一是提高汽油冰点。1969年苏联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在我边防军民的奋力抗击下，一次次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保卫了祖国的尊严。然而，在严寒的冰天雪地的冬季，温度冷到零下40℃多度，此时，我们的机车，凡使用汽油的设备都无法开动，原因是汽油燃料冰冻。战场上前沿需要补给，弹药、食品送不上，为此直接影响战斗力，造成严重的后果。

华先生急国家、人民所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深入上海炼油厂，同厂里的科技人员和师傅们，共同努力用大师的科研成果，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突破。高度的责任感，以自己独特的方法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把汽油的冰点控制到-50℃。解决了我国低寒地区长期没有解决的汽油低温结冰的困扰，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特别是国防军事上作出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里也与上炼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们的努力分不开。

二是解决造船放样的浪费。教授来到上海后一头扎进上海炼油厂，一待就是半个多月，解决汽油冰点问题之后，人也累病了。稍为休整下，又主动要去上海的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江南造船厂，因该厂是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标志，也是我国工人阶级的摇篮。随着经济的发展，造船事业要腾飞，特别文革中冲破了长期的束缚，解放思想，上海工人阶级豪迈提出，要改变“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历史，自己制造“万吨轮”。然而大胆的豪情更要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结合。

华老师到了江南厂被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精神所感动，他腿脚不便仍坚持上船台，看到工人和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造如此大船，以1:1的设计放样，然后再进行制造。大师发现这样的制造工艺既费时，又浪费材料，要彻底改变这种工艺模式，用科学的方法，计算最佳设计方案，改变落后工艺。说干就干，大师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

用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的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贡献，在短短的时间里，解决了造船放样的计算，节省了大量的财富。人民不会忘记大师的贡献，党和国家不会忘记大师的作为！

三是播种子，开花结果！华罗庚到上海第三个具体贡献，播下科学成果的“种子”，全面开花，让科学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趁大师深入工厂之际，由三办科技组进行组织，通知全市工交、科研各局、公司、主要大厂的有关科技人员和负责人，在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原科学会堂），举办华罗庚大师的《统筹法》、《优选法》的培训班，分批分期进行，请华教授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上课，传授他的科研成果。以市里组织培训的学员为“种子”，由他们回到全市各系系统，组织各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举办《统筹法》《优选法》的应用学习班，轮训本系统的骨干，全面推广应用。

总之，这次华罗庚大师来上海，其贡献不仅仅于此，他的行动说明，科学研究必须同工农业生产、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样才有生命，才有前途。科研技术人员深入生产实践、生活实践才能使展自身的才华，才有用武之地。科学技术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又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样才越搞越旺盛。

上海的科技成果

1. 综述

自1969年至1971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上海科技系统出了不少的科技成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每年都主动组织或者配合全国一些重大项目的研制。如《09工程》、《523项目》（上海的任务针灸、免疫、驱蚊）、《针刺麻醉》（全国针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上海各大医院临床手术观摩表演）、《防癌、治癌》是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给生理研究所张香桐教授。除此外，上海对全国的血防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叶注：原文有书名号，因不知此只是项目名称，还是有出版物(或项目书)的，故维持原样。】同时，每年的重大节日或国庆期间，还有一些献礼项目，据不完整的回忆如下：

1969年国庆节双37高炮指挥仪、硅片的处理工艺、双聚焦质谱仪、6895瓷杯军用、磁流体发电（15分钟发电68千瓦）、防弹衣等等，还有把胰岛素的形态结构研制成了模型送中科院。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总理亲自关怀的四个项目，文革中他十分关怀上海的科研工作，并在百忙中亲自召见上海的科技人员去京汇报，有时派人或电话来上海督促检查工作。周总理再三指示上海要搞出若干个有影响的科技项目，他在不少场合表示：“我就是迷信上海！”这对我们上海各方面的工作是莫大的支持。【叶注：周总理亲自关怀的四个项目见下述。】

2. 《728 工程》：核电站工程

《728》工程，即是今天的秦山核电站的最早的雏型。1966 年 10 月，中央专委第 16 次会议，决定要搞一个原子能发电的“原子堆”。同年 10 月 23 日颁发了（66 专发）69 号文件，任务交给了上海，并从“哈军工”和全国各大专院校抽调 55 名专业技术人员来沪，负责落实这个项目。上海市科委组织了一个《一二二工程处》（为核动力堆的代称），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 1968 年 7 月份，该项目仍没有明确的研制方案和确定的任务，处于停顿等待状态。1968 年底，我们接手科技组之后，一方面组织他们去原子核研究所实地考察，又到科技情报所搜集国外的有关资料；另一方面组织科研人员去吴淞化工厂等五个有关厂参加劳动，在实践中学习总结提高自己，做好准备。

1969 年 7 月，中央专委和二机部在京召开有关方面的会议，上海《一二二》工程处参加了这次会议，由我们科技组业务组组长朱亚根带队。会间，周总理在百忙中于 7 月 28 日接见了与会的成员。总理亲切的指出：“为什么叫你们上海搞核电站？因为上海缺乏能源，发展核电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上海的科技力量强，工人技术水平高，克服困难的能力也强，你们要同各方面团结协作，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搞上去。这座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和建造的任务就交给上海承担，希望你们在发展新的核能源方面开个好头！……”代表们把周总理指示立即传给上海。

上海市革会对周总理的指示十分重视，认识到这是对上海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阶级的信任，这是中央英明大胆的决策！要我们组织力量加强领导，把原先的《一二二》工程处改名为《728》工程处。市革会指示三办，迅速组织本科技系统、工交系统和全市大专院校的领导和科技人员，进行思想动员，组织他们对核电站的方案设计和经济技术性能的论证。为了便于对全市参与核堆研究的单位，进行跨行业、跨系统、跨部门的统一调度，由三办牵头在原工程处的基础上，成立《728 工程》办公室，我们选派了工军宣队和技术力量，还委派我办的业务组组长朱亚根（后期改派朱胜德）负责

核电站的筹建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比较，多数人倾向于“高温气冷溶盐堆”的方案，其优点是可提高发电功率，又可增殖核燃料，初步研究确定核电站为2.5万千瓦。但是，也认识到要搞这种“堆”，在技术上还有不少难关，在材料上和设备配件的研制等方面需要解决不少问题。

1970年7月6日，我们三办将决定的方案向市革会几位领导作了汇报，有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等人，边听汇报，边审查方案，当场决定：1. 按“溶盐堆方案”搞，功率同意定在2.5万千瓦。其建堆的地点，可选在湖州以西，建在华东电网以内。为取得可靠的各种技术参数，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同意我们先在嘉定的原子核研究所内建一座“0”功率堆；2. 考虑到搞新“堆”的技术复杂、难度大，需动用全市各方面的力量，仅靠三办的能力是不够的。在我们提议下，上海市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马天水任组长，许言任副组长。这样在1970年10月21日，由马天水负责召集了全市80多个单位的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直接落实布置各方面的具体任务。马天水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交给上海人民的光荣任务，要认识到开发核电站的重要意义，他要求大家一定要走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道路，把各项具体的任务，直接向群众交底，深入发动群众，相互协作，克服困难，善于发现问题，搞好综合平衡。根据论证，最后市领导讨论决定，核电站的功率为2.5万千瓦，地点选定在嘉定原子核研究所内。【叶注：按前述，建在原子核所内的应为“0”功率堆。】马天水要求在1972年上半年完成。

总之，整个具体工作，除了《728工程》办公室抓，基本上落在我们办公室（三办）负责。我们经常下去了解情况，听取汇报，检查工作，我曾同田树尧同志一起到嘉定原子核所，登上在建的“0堆”工程了解情况。此时原子核研究所的核物理专家卢鹤绂教授已解放，并请他参与该项目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71年9月原子核研究所的“0堆”建成了，于9月底正式开堆。此后不久，我和田树尧两人先后相继离开了“三办”科技组，对于以后的进展情况不太清楚了。

我现在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本意是怀念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他对上海人民的深情厚爱！然而一个偶然的机，我发现了许言的《回忆录思考》，看了之后觉得十分诧异，书中有些内容同历史不符，现从书中检出几点加以说明：

一是违背历史事实。《回忆录思考》（第156页）中说：“1969年上半年，因‘728

工程’需要，许言被市‘五七’干校解放出来，被上海市革会安排在科技组……让他担任科技组组长……（可）造反派一个头头说‘许言不是我们的人，不能重用’，于是许言被扣上‘穿新鞋走老路’的帽子，科技组组长的职务，也被降为第七位副组长”。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赶时髦”往自己脸上贴金，明明是趋炎附势，非颠倒黑白讲自己如何被迫害，甚至无中生有的编造一些谎言，欺世盗名。许言事实上是1969年12月中旬来三办报到的，那天他由市组织组金祖敏陪同一起来我们办公室。当时，我和秦学能、田树尧三人均在场。金祖敏说，许言同志结束了干校的锻炼，现经市里决定派他来三办科技组参加领导工作。因为许言调来三办是金祖敏事先跟我交过底，金在一周前就跟我打招呼，说给你们科技组派一个老干部来，并明确告诉我这是张春桥决定的。当时金祖敏既没有为许言排列领导名次，也没有提及《728》的事情。我们三办的领导层原只有三个人，再加上许言也只有4个人。我们4个人分工，我是抓总，秦学能主要抓工交各局“老大难”，田树尧原负责科技系统的运动和业务，许言到三办后就让他抓科技系统的科研业务。怎么一下子蹦出了有七位副组长呢？不知用意何在！

二是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728》工程的名称，本是纪念周恩来总理1969年7月28日的接见而命名，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一点许言到三办后应该知道的。遗憾的是，在《回忆录思考》书中却写成是许言自己定的名（见书226页），书中说是许言在一次大会上讲：“我们暂且把这项任务定为‘728工程’吧。”这里既没有向大会解释为什么改名叫《728》，又没有追述《一二二》工程的发展过程，这完全是混淆视听，有贪功之嫌！

三是言过其实，拔苗助长。从时间上推算，许言接触《728工程》，大约也只有七、八年时间。但是，这七、八年正是“四人帮”马徐王控制着上海的，也正是在这七、八年间，《728工程》得到了关键性的进展。然而，《回忆录思考》一书中，除了提到周总理与中央专委的指示与关怀外，在上海好象只有许言一个人在奋斗：什么从选堆型、定设计方案的论证，到设备的制造，以及攻克各种技术难关等等，都是许言一个人在策划和组织……。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吹捧太言过其实了，怎么能这样不顾历史事实把许言拔高呢？

试想在那个年代里，想抛开市里的领导能行吗？没有张春桥的拍板能定吗？没有

马天水的组织和发动全市各系统的技术力量大协作能行吗？没有三办科技组的集体领导能行吗？许言本人是否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程，我们同办公室的几个人都十分清楚！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两年之久（以后情况就不太清楚），许并非象文章中写到的那么高大。这里仅举一个例子：1970年7月6日，上海市革会决定在嘉定原子核研究所内建一座“0”功率堆，经过上下各方面努力，终于在1971年9月份建成开堆，那天是我与田树尧两人赶去现场，检查了开堆前的安全保卫工作，许言此时跑到何处去了呢？

《728工程》作为市里的重点工程，又是由我们三办科技组归口抓的，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落在我们这里，虽然有一个具体工作班子，要行施统一调度的职能还是有难度，经我们办领导研究决定，把科技组的业务组组长朱亚根抽出来，再配上军代表等人，加强《728工程》班子的领导力量。许言来科技组后，对《728工程》过问并不多。

许言是位老同志，资历深，阅历广，且经过各种艰苦环境的考验，本人作风正派，过去为党为人民作过不少的有益的工作。自然规律如今作古，其上下左右的同事好友，写一些纪念的文章，无非是寄托哀思、激励后人！这是无可厚非，很正常的事。但是，共产党有个规矩：一要讲事实，二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有什么写什么，决不能夸大，更不能胡编捏造。否则，适得其反！试问曹先生、蒋先生和郭先生，你们文章中有些言词有出处吗？我的判断，这并非出自许言的原话和本意，怎么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来路你们自然清楚！如果许言先生地下有知，他决不会同意这样做！

3. 《930工程》：原子钟（氦分子）工程

这项科研成果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即改革中央电台对世界报时台的时号问题。江苏省革委会1969年曾向国务院报告，要求改用新的“东方红”时号。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重视和关心，立即召见有关科技人员，并派专机到南京和上海接天文台的有关人员，在9月29日深夜抵京，30日凌晨2点30分周总理接见所有人员。听取汇报之后，认为新的“东方红”时号的频率还不成熟，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故暂且不发。总理说：“仍沿用以前的BP.V的呼号，暂时不能丢掉洋拐杖。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标准频率问题，你们上海徐家汇天文台能不能把原子钟的研制抓起来？”当上海天文台的苏锦源、沈志和二人表示很有信心时，总理高兴的说：“你们敢闯，

8120 部队又敢于支持，这就有人抓了嘛，过去为什么落后呢？就是无人抓。现在由上海牵头，你们回去向市革会汇报一下，再进一步落实人力、物力，调配技术力量，预计再有一年的时间够了吧……。”

故此，研制原子（氨分子）钟的任务，就命名为《930 工程》。市革会十分重视，责成三办组织工交、仪表等八个单位大协作，由天文台为主组成总体协调组。我们又组织领导、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并指示该台龚惠人参加该项目研制。在他们的努力下，参加研制的上海天文台、上海电钟厂、红星元件厂、上无 12 厂、上无 26 厂、上海无线电仪器厂、新沪玻璃厂、曙光机器厂等单位齐心协力，为国增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献出了《930-1 型》的样机，向敬爱的周总理报喜！紧接着一股作气，《930-2 型》、《930-3 型》也于 1970 年国庆节前完成样机的研制。

这个项目的成功，正如上海电钟厂一位师傅讲：“过去搞这种钟，搞了几年没有搞出来，这次成功是团结协作的成果！‘三结合’型式好，对某些问题能及时分析，及时处理，共同探索，从实践中增长知识。”天文台有五位技术人员，他们原先在办公室里搞方案设计，又忙又急。在共同协作中，他们看到老工人主动推迟去外地探亲，还把铺盖搬到车间里，日夜苦战，急国家所急，甚为感动。于是这五位科技人员也把铺盖搬进车间，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些厂的领导也深入到协作小组、下车间解决问题。应该说《930-型》样机的成功，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典型范例。

4. 激光技术的推广应用

激光技术在我国开展得比较早，据说仅比美国晚一年。1964 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长春光机所的激光研究室搬迁至上海来，命名为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该所以强激光研究为主，即开展大能量、大功率为主，主要用于攻击性的军事课题。据讲“二战”期间德国人就曾研究过这种武器，名叫莱塞光，又叫死光的应用。

1969 年 6 月，国防科委召集光机所去京开会，王秉章等人传达说，林彪曾提出要求，研制这种“光炮”，最好能打敌人的飞机。对此，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激光不能作为战术武器使用；一种认为，即使不能打飞机，也可以作为一种目标过渡，从中取得各种技术参数。国防科委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即将此项目研究定名为《6403

工程》，意指1964年迁沪后即开展激光研究。

1970年夏，粟裕大将受周总理委托，南下视察，路过上海，一定要实地看一下激光的研制情况，市革会就派我和田树尧两人陪同粟裕大将去了光机所。到了靶场，在烈日酷暑下，这位老将军在室外仔细的观看，详细的询问陪同人员，此时是一公里的距离，用激光把飞机的外壳——铝镁合金板，击中打穿。同时，又观看了用大容量激光的高温高速打出“中子”的试验。这位老将军谦虚和蔼，看了之后非常高兴，边看边说：“激光这个东西，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了。不过它是来自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人提出，要研制出一种‘死光（莱塞）’，用来消灭敌人空中和地面目标。我中学毕业之后就投考黄埔军校，以后又上了井冈山跟毛主席闹革命，在南征北战的年代里，我时常想起这种神秘的‘死光’。现在我们也有了，而且初具规模，这确实值得祝贺！现在我代表周总理向大家问好！周总理工作非常忙，尤其是九大以后，他几乎是日夜操劳，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很短，连坐在马桶上也在看文件。总理找了几个老同志，叫我们在他身边作参谋，这次来南方是视察规划港口码头的事，顺便看看你们的试验，我很高兴。大能量可以用在军事上，若要打飞机的话，不知还要多大能量？当然小能量也可以用于工、农的生产上……。”

光机所的同志向将军汇报了近期的计划，打算国庆节争取提高到50万焦耳（打飞机约需要30亿焦耳），明年空中目标的试验，距离争取8—10公里。此时粟裕大将笑了，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新的胜利！

在粟裕将军指示的鼓舞下，我们回来之后，立即组织光机所的工宣队、军宣队和所领导班子认真学习研究，落实措施。首先加强光机所的领导班子，新派有一定领导水平，知识化的所领导陆铭主持所的全面工作。另外明确表态，尽快解放邓锡铭等技术人员，使他们及早能参与《6403工程》的研制。

与此同时，将军对激光小功率的应用研究和推广工作的指示，启发了我们的灵感。由我们三办科技组牵头组织，积极整理收集原先已搞过的激光小功率应用的资料，在多种行业推广应用激光技术。由三办业务组与复旦大学等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开门办科研，科研人员深入到生产实践中去，提出课题，组织攻关，也很快收到了效果！如钟表行业用激光在钻石上打孔，还有激光绣花，激光开刀，激光通讯等等。1970年下半年，我们三办科技组正式打报告，经市革会批准，在华东分院内成立了激光技术试验站（1978年改为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

这次粟裕将军来上海，我和田树尧有幸陪他两天，将军待人可亲，毫无架子，谦虚近人，非常朴素，他的言行举止无形中给人一种力量，从内心感到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将军的期望。

5. 《655 和 905》计算机

《655 和 905》是两种计算机，是当时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655》是每秒计算 50 万次，《905》是每秒 1000 万次。前者起步较早，本来打算 1968 年向国庆献礼，但是没有成功，以后又拟 1969 年的“五一”献礼，也没有成功。查其主要原因是所领导的问题，原先派进的工军宣队之间有分歧。工宣队认为秦跃东方案的优点多，军宣队则认为郭书文方案的优点多，这两人都是所领导，秦跃文是一把手，这样形成长期不团结。我们发现后，立即撤换了工军宣队，加强领导统一步调。我同田树尧去该所，下到科室小组，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明确强调所里承担的科研项目是国家和上海市的重点科研项目，它不仅对我国工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支持国防建设！

在新的班子和全所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下，全所出现了新气象，大家信心倍增，如一室、三室、机房和武康路工厂的同志，他们坚守岗位，提出苦干 100 天，连干几个班次也不休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先拿出了《655》的样机。

不久所里又出现点反复，在使用什么人的问题上所领导层里发生分歧。如一把手秦跃东认为郭书文包庇使用有政历问题的人，如戚锡章、罗自实、虞浦帆等人。戚锡章是荣毅仁的女婿，他经常散布西方的生活方式，并胡说什么嘉定是监狱！【叶注：计算机所在郊区嘉定。】郭书文知道后，不仅没有处理，而且还想提拔重用他们，致使研制工作又出现止步不前。此时已是 1970 年 9 月下旬了，离国庆节很近，市工交组赵万吉又传话来说：对《905》机的研制，国务院办公厅三天打一次电话来催问，并传达周总理的关心。赵讲，你们如果再拿不出来，就到了犯罪的边缘！

我们得知上面情况之后，就再去计算机所，一是调整所领导班子，调换了郭书文的工作，恢复王方荆原来一把手的工作，并由他来抓总；二是重用技术骨干陈仁甫，并让一批原来被靠边的技术人员参加研制工作。这些措施深得该所干部群众的拥护，经工军宣队的广泛发动，真是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久就完成了《905》的样机试制，从此中国也有了自己研制的高速率的计算机！为此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

详细报导了研制过程。

结束语

1. 有人讲“四人帮”不要科技，这样说不符事实。客观事实证明：在错误的时候，也会有正确的东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存在错误的事情。那种走极端的，说坏的什么都坏，讲好的什么全好，那是唯心主义的产物，不是事实，要有分析的态度。

2. 叶永烈先生在《王洪文传》中，为戴立清杜撰了许多不实之词（详见该书第293…295页），迹近故意栽赃，有意诬陷！我要正告叶永烈先生：一个人无论是发表言论或者写文章，都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说话要有根据，对事实、对他人负责！那些专门歪曲历史事实，搞人身攻击和侵害公民权益的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三、负责上海王维国专案。

接受新任务

1971年9月下旬，正当我在市科技组（三办）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之时，我接到王洪文的命令，调我进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工作。

“913”事件发生了！【叶注：即71年9月13日，在北戴河机场，林彪、叶群、林立果乘一架空军专机仓惶出逃，专机在蒙古国境内坠毁，三人死亡。世称“913事件”，中共中央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对涉事人员进行了“专案”审查。】在接到命令之前，我只知道王洪文神秘地不见了人影，两天后又出现了。警备区陆军封锁了空军机场，王洪文频繁往返于上海—北京，让我总觉得有什么大事发生。

1. 向我布置任务

在我调进“康办”后，王洪文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命令，是周总理传达给他：“毛主席命令华东地区，林彪案件由许世友、王洪文两个人负责清查。”上海地区，征得许世友的同意，由戴立清负责审理涉林彪的王维国案件。【叶注：王维国时任空四军政委，并任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兼市公检法系统军管会主任，是中共九届候补中委。】

我们组织了一个专案班子，对外称材料组，由王洪文直接领导，对口中央办公厅

材料组，即中央专案组，是周总理负责的。市委其他书记、领导一律不允许干预，也不允许进“材料组”询问看材料。材料组只对中央专案组负责，所有材料上报给国务院周总理、政治局、许世友及王洪文。

(1)材料组的组成：负责人戴立清、王知常【叶注：市写作组领导核心成员】，成员：康宁一（上海警备区的不久调任市委办警卫处政委）、李恩承、杨序昭、晨波、祝家耀、汪洋、桑志达、李鸣岐，还有三位女同志黄树芬、郑雪珍等，从空四军还抽调来三位同志。

材料组的办公室，设在“康办”大院内西北角的一幢独立小洋楼里，小楼北面是沿马路的，所以一开始还在门口配了武装警卫双岗值勤，气氛极为紧张。

(2)我们的任务：负责上海地区三军和公检法系统关于林彪、王维国的专案材料，凡是上海的有关揭发材料都归口到我们材料组，而我们重点是空四军和由空四军控制的公检法系统。

一开始，我们以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名义进驻空四军军部，市公检法也相应派市委工作组进驻。在林彪事件没向下传达之前，王洪文已会同许世友派来的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抓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为了稳定部队，从六十军调来军长武占奎，任命为空四军政委主持工作。空四军开党委会都通知我列席他们的党委会议。

2. 关押涉案的被审查人员

警备区的警备团接受命令，在大场驻地空出营房，关押受审查的对象。每人一间房，一张床，一只单人写字台，一只靠背椅。警备团的任务：被看管的人，不死、不串、不跑、吃好，搞好警卫和生活管理。

空四军军长郑长华等领导成员，提供了一批王维国的亲信骨干分子名单。关押的人员有：空四军领导班子的一些成员；军部的一些中层干部，各部处的部长、政委、正副处长；下辖的无锡硕放空十五师的副政委（林立果安插的），盐城空三十二师的副政委、空廿六师、高炮二师（后为八师）的领导人等。如后勤部部长胡锦涛生、政委杜贵珍（王维国的老婆）、以及王维国的大女儿、儿子都抓起来了。特别还关有林立果在上海的“八人小组”（即“联合舰队”上海的“分舰队”）又称“上海小组”，编制是属空四军，但他们受林立果直接指挥。这个小组的头目为蒋国璋、裘著显和赵

铨……。

王维国为了讨好林立果，把选来的“美女”L某【叶注：原文有名字，这里隐去了。】和自己的女儿、江腾蛟女儿等人一起送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实际是把L某送给林立果寻欢作乐用。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把L某送回上海，也关押在我们这里审查。

还有毛泽东主席的原来大儿媳刘松林，这时她是空四军三十二师副政委刘的夫人。为什么关押她？后来才知道，她向王维国提供有关毛主席家庭内的情况，特别是散布江青的一些情况等。当时王洪文关照，不许其它人接触刘，专由我负责联系，由王洪文一个人审理。刘松林写的所有材料全需封好，由我直接送交王洪文。

另外，还关押了林立果在上海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教导队，实际上是全副武装的特务队的两名头目。

抓线索，抓重点

1. 抓线索

我们专案材料组，虽说主要任务是审理关押的人员，但我们对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主要是交代政策，让他们主动交待。初步接触之后，分成几个方面铺开：

(1)林立果在上海的“上海小组”即“联合舰队”的“上海分舰队”成员活动内容，特别是在谋害毛泽东主席和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问题进行突破。这里不仅从“上海小组”成员，即“八人小组”和林立果的武装别动队——空四军的教导队主要负责人突破。

(2)王维国和他的亲信，空四军内部一些异常情况，特别是后勤部部长胡锦涛、政委杜贵珍（王维国老婆），以及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章，在关键时刻的活动情况。

(3)空四军内部各部门上下揭批的内容，重点举办的“学习班”揭发有关谋害毛主席的内容。由空四军内部提供各种线索给材料组过滤采用。

(4)空四军派在全市各地的支左人员揭批提供的线索。外贸局是空四军支左，那里的负责人叫是鹤，为林立果提供了进口的各种反革命活动器材。上海市公检法是空四军王维国全盘控制的部门，在这些部门搞了不少效忠林立果的活动。上海市委警卫处处长和空四军支左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王维国的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动态。

(5)驻上海的部队除空四军外，警备区和驻沪海军，其他军事单位驻沪机构，也有

揭批林彪一伙在上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容。

2. 抓重点

上述几个方面的线索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揭发出惊人的问题，简直使办案人员不敢相信。既不敢轻信对象的交待材料，又无法否定对象的交待。我们审查的重点：一是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活动。二是反革命军事政变内容。

对关押受审人员，反复交代政策，不搞逼供信。对办案人员严格纪律，提审必须两人以上。我们所接触的对象都是有一定层次的人，而且多数是级别较高的干部。办案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机关老干部占绝对多数，都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我们不带框框，不施加任何影响。让对象主动交待，从交待中分析、掌握情况，再利用矛盾让案情深入，很快就掌握到大量重要情况。对所交待的材料，我们不敢怠慢，是真是假，我们心中没底，材料全部编印直报中央。

材料组得到的材料

1. 于新野的上海之行

于新野9月9日来上海，神秘的同王维国密谈。又当日匆匆赶往杭州，行施特殊使命。这次于新野同王维国密谈的内容，从后来对象的交待材料中证实，是正式下达对毛泽东主席下手的指令。

王维国接受指令之后，通宵未眠同老婆杜贵珍长谈，第二天杜贵珍同后勤部长胡锦涛生驾车，巡视了空军地下指挥所、虹桥的灯团等铁路专线附近地区。这些活动都是在于新野来了之后进行。

2. “上海小组”头目蒋国璋交代

“上海小组”即“联合分舰队”接到林立果处指令，进入一级战备，小组成员进行战备值班。蒋国璋交待，小组成员“一级战备”之后，议论如何实施谋害的方案和手段。采用四口火箭筒，乘军用吉普车，同上海市委警卫处配合，埋伏在毛主席专列下车至虹桥招待所沿线，伺机下手，以实现罪恶的阴谋。不仅讨论方案，蒋国璋等人还驱车，到虹桥专列停靠地区实地查看。

3. 王大章的交待

于新野上海之行，又匆匆赶到杭州向陈励耘布置任务。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杭州，但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9月10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突然离开杭州，晚上六点前专列已到达上海。于新野到了杭州，原设想毛主席在杭州要待几天，没想到会如此快离开杭州。

毛主席专列到上海，当晚找了王洪文和王维国，由汪东兴领他们上专列（主席到了上海没有下专列），见了面主席没有讲什么，简单的问了一些情况，王维国趁机检查自己在“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等。毛主席没有理睬，略有所思的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停了片刻挥挥手，让他们离开的意思，并说找许世友来见我。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才赶到，汪东兴领许世友、王洪文上专列时，没有让王维国上车。许世友、王洪文上了专列，毛主席问了一些情况说：看样子他们想动手了，你们要团结。知道许世友从苏北赶来饭也没吃，毛主席要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并说：我要休息了。许世友、王洪文下了专列之后，王洪文拉住王维国一起上了汽车，开往锦江饭店。王洪文安排丰盛的宴会，好酒好菜款待许世友。

一顿饭还没吃好，专线来电向王洪文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离开上海。王洪文不动声色继续吃饭，趁王维国不注意时，悄悄地把毛主席已离沪的事告诉了许世友。宴会有意拖了一点时间，因许世友要赶回南京才结束。送走了许司令，王洪文又拖住王维国一会，才各自分开。王维国回到空四军，就打电话向主子报信，有些话在电话里不好讲，第二天派儿子赴京面报林立果。根据王维国儿子王大章的交待，当晚王维国对儿子交代，不许他记录，要记在脑子里，用笔写在手心上。第二天凌晨王大章化名王岩乘飞机到北京，在李伟信的安排下，向林立果汇报了情况，还得到林立果的表扬：在这样的时刻，感谢你们全家对林副主席的忠心……

林彪一伙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还策划空军原副参谋长胡萍安排八架飞机，准备失败之后，在广州“另立中央”，“以长江为界”，“分南北朝”。同时，也积极准备叛国外逃。

4. 李维隽的交代

李维隽是这里关押审查的一个对像，他是李伟信同父异母之弟，在哥哥的引荐下，他也攀上了“首长”林立果，并用他的特长效力于林立果。他按林立果的要求，专门

研制出一套系统性的电话跟踪装置，能自动切换转接预定号码的电话，还进口了大量的电子元件、器材和窃听录音设备系统。如叶群同黄永胜的八十分钟电话录音，就是李维隽研制成的设备录制的。名称为A箱、B箱、小B箱。这些设备，随林立果行动，李也跟随林立果行动操纵这些发明成果。

在9月12日凌晨，林立果实施反革命计划时，拿着林彪的手令，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9月8日。”这是林立果在得知毛主席已离开上海之后，准备逃离之际，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据点里，拿出林彪的手令，让李维隽传阅，并发了一支五四手枪给李，并说：现在应该带上这个。之后，在李伟信的护送下，李维隽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这是李维隽在案发之后关押中交待的，据说他是林彪手令唯一见到之人。

对李维隽审查了几个月，没有发现他同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有直接关系，故解除对他的审查和作安置。因他没在空四军当过一天的兵，退回空四军不合适。考虑李有技术，像这样的人还是放到与电子有关的厂，可让他发挥一技之长。经王洪文批准，我们安排李到轻工局金星金笔厂，监督使用，等待处理。金星厂当时正在改产试制电视机，不久就改名为上海电视机一厂。

5. 阴谋拉拢南京

林彪一伙策划反革命政变，“联合舰队”头目林立果曾妄图以长江为界，分裂党中央，搞南北朝。为此，想要说服南京军区，拉拢许世友司令，至少让南京保持中立。

为了实现上述阴谋，林立果派李伟信来上海完成这个特殊使命。李伟信来到上海伙同王维国密谋后，由李伟信乘坐王维国的轿车，先到上海友谊商店，购买了当时属于高档次的食品、化妆品和日用品等作为礼品，足足放满伏尔加轿车后备箱。由王维国驾驶员开车，李伟信亲自秘密送去南京。因汽车在过了无锡不久发生故障，不得不让无锡硕放机场空十五师派车拉回，另用一辆车送去。到了南京，天已黑透，到中山陵边上一条路，门口有警卫站岗，和里面联系后，车子放进去。开到一幢小楼门口，里面出来个子不高的中年女同志，很客气的接待了李伟信，驾驶员和李伟信把车上的礼品搬进楼内……

以上根据“上海小组”的头目蒋国璋的交待内容，以及王维国的驾驶员交待。根据交待，还让驾驶员到南京去实地指认送李伟信去的地方，据查这地方是南京军区许

世友司令员的家，当时出来接待的妇女是许世友夫人田甫。这种材料，我们专案材料组不敢停留，迅速加印上报中央。

上海小组问题

1. 小组成员

“联合舰队”的“分舰队”，又称“上海小组”，开始的时候又叫“找人小组”，即为林立果选美女和为林立衡选美男。这些人是一开始就为“联合舰队”的头目林立果效力的。

上海小组成员都是空四军王维国的亲信骨干，大多相当于处级干部，并掌握一定的实权。先后有八个人组成，也曾叫过“八人小组”。他们的行动是直接受林立果指挥，王维国对他们的一切行动予以支持开绿灯。

袭著显开始是“上海小组”的头目，后来由于“小组”的作用变化，由蒋国璋代替。他们都是处级干部，年纪轻，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赵铃是管钱的，【叶注：在前面讲到材料组关押人员中，提到“上海小组”成员有“赵铨”，疑与此的“赵铃”为同一人。】提供后勤保证，凡是涉及经济问题，都由他直接到后勤部解决。还有一些是拍照、驾驶、写文章等多面手人材。

2. “选美”

他们通过空四军对全市区县公安局军管的特权，把“选美”工作交付各区公安分局军管组，布置到各个派出所。让户籍警报名单，然后再根据要求选送。据悉，这个“选美”是由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向三年直接布置的，驻沪海军和陆军都同时有“选美”的任务。为了掩人耳目，称之为选送首长专机服务员即“空姐”。林彪事件之后，我们从空四军收来的“上海小组”收藏的“美女”照片、底片就有不少。

(1) 发现“美女”。“上海小组”头目蒋国璋交代：他们小组开军用吉普车在淮海路上兜时，看见了一个女孩，外形、容貌、身高都比较出众，于是就跟踪这个女孩，直跟到女孩进到某弄某号。他们立即通过派出所军代表，迅速查清这女孩的情况，没有停留当天就找女孩“谈话”，许诺可立即入伍穿军装的诱人条件，这对当时的年轻人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找人小组”马上报告主子林立果，描述这是个无可挑剔的“美女”。他们利用

上海市委警卫处长李秋亭控制的密点，即巨鹿路原“国际问题研究所”，对这幢洋楼加以改造，又与旁边的空军招待所打通，进出自由，不与外界接触。他们利用这个地方，叫选来的“美女”让林立果“面试”。“找人小组”让“美女”把外面衣服脱掉，穿紧身衣服拍照、留影。在林立果的认可下，很快穿上了军装，进入空四军军部门诊所当护士。

“美女”其名叫L女【叶注：原文有名字，这里都隐去。】，祖籍天津人，家中有爷爷，父母亲。但父母离异分居，家庭并不景气。她人长得漂亮，五官端正，标准个头，也不知怎么会偏偏找上她，是祸是福对她来讲前途莫测，但当时有这样的机遇，喜从天降送上门来，真是幸运。穿上军装，飒爽英姿，没几天一朵花就被称之为“首长”的林立果采摘了。虽然当时没告诉她真名，L女也是聪明人，当然知道“首长”的来头不小

(2)“美女”失踪。好景不长，林立果玩弄之后，不可能死守在这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完成，于是不辞而别。这就急坏了L女，以身相许后又找不到人了。刚穿上军装的她，根本没有什么军纪可言，有这样来头的“首长”，不怕找不到。L女入伍之后改名L某。她一入伍就是干部待遇，每月有五十多元。她左思右想不能坐等，就决定出走。L某穿上军装第一次回到家里，神气十足地见了爷爷、父母，以及亲朋好友，还有自己的男朋友，然后就无影踪了。

这又急坏了“上海小组”的成员们，立即向王维国汇报，再向“首长”林立果报告。林立果做贼心虚，生怕L某落入他们的对立派手上，事情就闹大了。当林立果得知L某失踪，就给“上海小组”丢下一句话，不惜一切要找到她。

“不惜一切”如何理解？首先决定在火车站，船码头进行守候。再利用王维国对上海市公检法的军管，查到L某的母亲虽徐娘半老，风姿犹在，生活作风上有些问题，立即由虹口区公安分局拘留关押；又得知L某有个男朋友，在“文革”初期为L某家私藏过黄金，也同样由军管会拘捕入牢。为了寻找L某的下落，真是“不惜一切”，把无辜的其母、其友捉拿关押。后得知其母讲了L某这次北上时会到外婆家去看看的信息，“上海小组”立即乘飞机赶到石家庄，并通宵达旦的守候在火车站上。林立果得知“上海小组”如此卖命，寒风凛冽下守候L某，特地送给他们电烘手炉。这个电烘手炉，我过去从未见过，形如香皂盒，用干电池的，寒冬里虽不解决问题，也表明林立果寻人心切。

终于在石家庄火车站守候到失踪的L某，迅速报功。飞回上海后，就对L某严加管控。可是为了找L某，关押其母和男友，如何处置？男友不久释放，将其母送到苏北大丰劳动教养农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3)送“美女”去广州。自从L某在空四军出了不大不小的事，弄得王维国和

“上海小组”鸡犬不宁。林立果又不好长住上海，目标太大，怕引起麻烦。毕竟上海不是他们的天下，在上海总有点提心吊胆，不太安全。尽管王维国为林立果在新华一村修建了“行宫”，以及空军招待所连通了密点，还是不放心。

为此，也难为了王维国一伙。为了效忠林立果，他们策划了组织一个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的培训。由空四军门诊部的护士长带队，有江腾蛟的女儿、王维国的女儿、加上L某，四个人以“学医”为名齐赴广州。

广州是黄永胜长期控制的地盘，林立果在白云山有据点，民航的广州机场也是他们一伙活动的地方。林立果比较多的时间在广州活动，L某到了广州后，凡林立果在广州时，她就住到林在白云山的据点里，为林立果提供性服务。而李伟信长期跟着林立果，也可以到处寻欢作乐，带队的护士长就是李的姘妇。

根据L某的交代，她住在白云山招待所，任务就是陪林立果，平时就看看电视，可以直接收看香港的节目。山上有好几栋小别墅，不许走动，只有林立果打电话来，让过去才可以去。每次去之前，李伟信都看着她吃好避孕药才过去。还交代，山上其它别墅里也有女孩子住着，不只是L某一个人。林立果曾对她说过，要学着杀鸡，要见血不惊慌，不要怕。

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州军区同我们联系，把这些人押送回沪。当时我抱着好奇心看到这个“美女”时，同想象中完全是两回事，给我第一眼的感觉，L某满脸浮肉，象是虚肿，据说是长期服用避孕药所致。这些人全照单收下，随即送往警备团审查。

(4)安置“美女”。经过审查，L某同谋害毛主席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也是受害者。人生得漂亮，这是爹妈给的，没办法，也不犯什么法。这是飞来横祸，她无法抗拒。我们专案材料组专题向王洪文报告，解除了L某的审查，等候处理。但把L某放到何处，很是为难。放她到一个单位，如果传出去是林立果选的美女，单位会招架不住。最后商量把她暂时放在大丰农场，可以同她母亲相见，对L某的工资待遇仍维持原状。王洪文批准后，让劳改局派人送到大丰，后来又安置到上海某厂。

【叶注：戴原文中，接下来有：《“571工程”纪要》出笼，“三国四方会议”，

建立“教导队”，加快实施《“571工程”纪要》，毛泽东的步骤摧毁了他们的美梦——吹风，亲信密传阴谋策划，林彪的出逃，林彪事件败露的传达，这些段落从其内容来看，与其“材料组”工作无关，且这些段落间有一句加了括号的“注：（《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九一三事件始末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江集团主犯纪实》。）由此可判断上述段落的内容，很可能出于这两篇文章中，故在此不再采用而全删去。】

中央办林彪罪证展览

1. 办林彪罪证展览

根据周总理指示，中央专案组安排，王洪文通知我迅速把从王维国那里缴获的，林立果一伙在上海的罪证送到北京。这些罪证大多是王维国为了满足林立果反革命活动需要，通过上海外贸局负责人、空四军军代表是鹤进口的。其中有高级相机、窃听器，以及李维隼为林立果试制通讯设备所需要的各种电器、电子元件等等，足足装了一军用卡车。上海出发，我负责押送，部队送到机场，直上飞机。

到北京机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已派大车、小车等候在飞机旁，军用卡车、小车直开至毛家湾（林彪的住所），有中央专案组协同公安部的人员清点交待。那里已经汇集了从广州送来的罪证，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各种准备外逃的大量罪证。罪证限于北京、广州、上海收集的实物：有李伟信等人叛逃时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所带的大量罪证，进口的29吋彩电和各种电器，高级专业照相设备，各种窃听器，通讯跟踪设备，黄金和美钞，古玩珍品，英国女皇头像的怀表，中央的各种绝密文件和军用地图等等。

这个罪证展览就办在林彪家里，中央规定在军以上干部的小范围内参观。

我随同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到总理办公室，本打算向周总理汇报一下情况，王良恩说总理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王良恩安排我在总理办公室吃了夜宵，到凌晨三点总理的会议仍没结束，我又回到毛家湾。让我们住中央招待所，安排住宿。我坚持不住了，请办公厅安排两张回上海机票。第二天早晨办完移交手续，又由林彪大院管理处主任陪同参观了毛家湾，我在当天下午就回到上海

2. 参观毛家湾

林彪大院管理处主任的个头不高，瘦瘦的身材，一看就是部队里搞事务的人，他向我全面介绍了林彪家情况。

林彪全家四个人，他们住在一个大院，互相连起来的，不知什么缘故，一家四个人进出，各走各的门，既相连又不通。采取各自封锁，互不往来，各有各的生活方式，不受干扰。如果有事，事先约定，互相开门，内部沟通。

林彪的住房。难以让人相信，一个国家的副统帅，明文指定的接班人，生活非常简单。除了一张四尺半的木板床，外加一只屏风，其它什么也没有了。床上有木匠自制的一只便架（在床上大使用），屏风也是木制的，都没油漆过。在屏风一米多高，二米宽的面积上，写得满满的，很多人看不懂的粉笔记。据管理处主任介绍，这是林彪让记录的，就是他吃什么食品后各部位的反应。如吃什么膀胱出汗，穿什么体温多少，睡觉盖什么温度增加多少等。

林彪长期以来身体欠佳，到底是身体有病，还是吸毒成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长期以来林彪抽鸦片烟，凡是外出活动，都要吸足大烟，过足烟瘾，把精神调起来。甚至用烟土同食品混合服用，生活同常人极不正常。他一个星期大便一次，就说自己拉稀了，长期躺在床上，大便也不下床。由于食物与众不同，量少时间长拉不下来，战士就用手去勾掏。

卧室外面有一半是天井，一半是双层玻璃窗隔开，里面放着条椅、矮桌，林彪有时下床晒太阳。矮条桌上放着两本《辞源》药典的书籍，还放着一只精制的放大镜。过晒太阳的房东面就是一间会客室，里面放着比较好一点的椅子、沙发，中间有桌子（象八仙桌），桌子四周放着椅子，靠墙四周沙发、椅子，布置得稍好一点。是接待来客，等候接见的客人。

叶群的居所。叶群的住所非常气派，进门就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在房角放了一张很大的办公桌，这个办公桌不比一张床小，桌上文房四宝应有尽有。还有叶群练写毛笔字的稿纸，写了一部份，据说是叶群的自传，特别是同林彪的恋爱史，墙上挂着字画条幅。里面是会客的客厅，沙发、椅子，四面的摆式。把林彪写给她的条幅，“生不同寝死同穴”放在显著的位置。古式古香的立式花盆，红木茶椅放在边上。朝里中间一扇门，左面是化妆室，墙面大玻璃。旁边有一只象理发的椅子，边上竖立一只进口的电动刷牙机器。不要动手，嘴对准牙刷，开动电门自动洗刷。方向任你选用，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对面的大镜下的台子上。放着进口有网眼的黑色尼龙三角女

裤，看上去比巴掌还小，挺新鲜的。用玻璃纸袋封好，好象刚进口的，还没来得及使用过。右边是封闭式的磨砂玻璃，中间门一开一边是抽水马桶和洗手水池，另一边是浴缸和淋浴，这些只有在宾馆里才能见到。

朝里走又是一扇门，里面是叶群的卧室，房间四周全是古代的仕女像。进门靠床边放着一架很精美的医疗椅，既象高级理发店里的坐睡椅，又象五官科医院里的牙科椅。可以升降、躺卧，据介绍是叶群什么理疗用的。中间是一只较大的床，席梦丝垫得厚厚的。床里面是一排壁橱，全是衣服，床对面一排壁橱，据介绍单单皮鞋就有一百多双。床上绸缎被、床罩。

【叶注：以下有一段讲“叶群丑闻”的内容，全删。】

关押刘松林的问题

1. 王洪文来通知

上海市委林彪、王维国专案材料组刚开始工作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王洪文通知我：空四军有一个人要关到警备团，要我通知他们准备一间房子和女兵看守，明确告诉人是晚上送去。我一照办了。当时我们专案材料组的核心成员李恩承等人，正在空四军军部。如我赶到空四军军部，再到大场警备团，路太远了。这样，我就打电话到空四军军部，通知李恩承负责把空四军要送的人，带到大场。我自己就直接由康平路办公室赶到大场团部，去落实关押的房间。因为空四军要关押的人，必须经过王洪文批准，而空四军不好直接到大场警备团，必须由我们市委专案材料组转送。

2. 刘松林被关大场警备团

大约下午六点多钟，在空四军的李恩承来电话讲，要关押的人已到军部（据说是从外地押到上海，再关到警备团），我立即向王洪文打电话报告。在晚上七点钟左右，李恩承和何玉生等把人带到团部，这是一个胖胖的女军人，还带了一大捆行李。领她到房间后，女兵看守检查了她的行李，再要她自己整理行李、铺好床铺。

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很快从市区赶来了，王洪文和廖祖康、我一起到关押这个人的房间，我和廖、女看守均站在外面，王洪文进去找她谈话，她边讲边哭。约半小时不到，王洪文叫我进去，对她讲：这是专案材料组的负责人，你写好的材料封起来，交给他。这时我才正式见到此人。在外面时，王洪文的秘书已告诉我，她原是毛

岸英的老婆，后嫁给空 32 师的副政委刘茂之。我见到刘松林，只见她哭得很伤心，穿了军装，人也很胖，她看了我一眼。王洪文对她说：你不要哭，自己要好好的想想，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有什么事找他，不要找其他人，他姓戴，跟哨兵说一下。

我们出来之后，王洪文对我说：专案组的其他人不许接触她，她写好材料之后，直

接交给我(指王)。还讲，她在主席身边多年，知道主席家庭的一些事情。王维国为了追随林家父子，利用刘松林的特殊关系，从刘的口中了解江青和毛泽东的情况，而刘松林也确实散布了当时防扩散的内容言论。

刘松林后来一个星期之内叫了我二次。第一次是写了厚厚的一封信封材料，让我交给王洪文。我是不敢停留，立即交到王洪文手上。王也密封通过机要处快件送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收转。第二件事，刘松林哭哭啼啼的对我说，她写了一封家信，给母亲讲小孩子事和家庭事的内容。我只好安慰几句，把信转给王洪文，经他同意寄到北京。

王洪文先后来过两次跟她谈话。没过几天王洪文对我说，刘松林的事情，汪东兴报告主席了，汪传达毛主席指示：一些娃娃们不要关他们。我们为此立即通知空四军党委，让刘松林回去。后空四军向我们报告，刘松林回到空四军的当天，就回北京去了。刘松林在我们这里关了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只是关在上海大场警备团好八连的驻地。

3. 刘松林不符事实的“回忆”

后来，我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看到刘松林撰文回忆此事，有点胡说八道。也许当时气昏了，记不清事实；也许迎合形势需要，向“四人帮”身上泼脏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做人要有点良心，不可违背事实，说话要对自己负责。

第一，刘松林说我坐在汽车前面，押送她到关押地。事实上，刘松林从盐城三十二师怎么送到空四军的，我不清楚；从空四军带到大场一路上，我也不在。我根本没押送过刘松林，而当时我也不戴眼镜，怎能信口开河，张冠李戴，肯定是我呢？

第二，刘松林还“像刹有介事”【叶注：上海俗话，意即“做得像真的一样”。】，去“旧地重游”，跑到少教所【叶注：少教所没拆前，可参见叶永烈所写有关文。】，肯定地说，自己当时如何被关押在这里，什么房间等等，“就是这里”地乱说一气，有损自己形象。事实上，刘松林根本没有关到过少教所，她在我们专案材料组时间很

短，就是关在一个地方，即上海警备区警备团，在大场镇。

【叶注：据知，刘松林放出后，其夫空 32 师刘副政委因涉案，仍在关押审查中。】

结束上海材料组的工作

1. 成立专案材料组

林彪事件之后，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成立了专案材料组。根据当时空四军武占奎政委、郑长华军长为首的党委会，提供的王维国当道时的“亲信”名单，对号入座，进行审查。其中关键性人物、重点对象由市专案材料组审理；属面目不清，未发现同“谋害”、“政变”有关的人，留在空四军内办隔离学习班。空四军的学习班也分档次，重点和一般，根据问题大小，态度好坏，可以升级也可降级。

空四军在地方上“支左”的单位也不少。市公检法是大头，由市委派进工作组接管，“支左”人员全部集中到梅陇附近的什么学校，办揭批王维国的学习班。还有各区、县的军管组、劳改局系统的军管组，全部集中学文件，揭批王维国一伙的罪行。

空四军利用支左，还把手伸到全市各处。市委警卫处是重点，他们主要掌控、提供市委领导人的行动信息。外贸局主要是为林立果反革命活动需要，进口不少的器材，王维国派了一名叫是鹤的人在那里负责。另一个是上海有名的“老大难”单位 5703 厂，空四军驻在那里一个排，长期插手这个厂，搞得不可开交。

王维国为了他们的需要，派了某师姓周的政委【叶注：疑是师政治部主任】到普陀区公安分局任军管组长，以帮助杨富珍解决困难之名，拉拢杨富珍。【叶注：杨为著名劳模，中共九届中委，时任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常委、普陀区委书记。】先给她派秘书，又派驾驶员，还经常把杨富珍拉到空四军进行感情笼络，每去军部回来，汽车后面装满了农副产品。利用军管的机会，把杨富珍的丈夫从一般消防队员提拔到一定的领导岗位。她儿子当兵，也是通过王维国关系走后门办理。特别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王维国拉拢上海的两名代表与他呼应，一个是杨富珍，另一个是陈敢峰，【叶注：陈是上海文革初，同济大学“东方红”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后任上海大专“红代会”负责人，时任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委员。林彪事件后被关审，文革后被逮捕、判刑 8 年。】这两个人同王维国搞得挺热乎的。王维国曾经对王秀珍也打过主意，连续给王秀珍派过两个秘书，但时间不长都回绝了。

王维国为了控制我们文革造反上去的新干部，他利用公检法军管的机会，对王洪

文等一些人员都秘密进行调查，掌握各人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情况。

2. 解脱一些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我们专案材料组对揭露出来的问题线索，属于有价值的转给有关方面。对一般性问题，我们认为市里面应该拿一个态度，也就是权威性的政策标准，解脱一些人，不要纠住不放。

经过我们专案材料组的分析、讨论，送给王洪文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是极少数，被审查人员中同“谋害”和“政变”有关的也是少数人。空四军中绝大多数人与王维国一伙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是能够同王维国一伙划清界线的，也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和忠于人民的。

为了解脱一些人员，先要做好空四军一些军管人员的思想工作。为此把关押在我们这里的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两个副主任，拉到公检法军管人员集中的大型学习班，进行揭发、批判。我们借此机会宣传，王维国的死党是极少数，只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放下包袱，广大军管人员和公安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我还陪同王少庸【叶注：老干部，时任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召开了各区、县公检法的负责人和军管组的负责人会议，明确宣布，各区、县空四军的军管人员中没有发现一个人是王维国的死党。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和表态，解脱了大多数军管人员。

我们将关押的对象逐步进行清理。我们审理的重点，一是“谋害”毛泽东的事，二是策划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事，从一开始就抓住这两个重点进行，关押人员中与以上两事无关的逐步解放。一开始，空四军关押在我们这里的先后有近四十人，逐步清理出一批人，下放到空四军继续弄清问题或等候处理，最后只留下关键人物十几个人。

我们在康平路办公，到大场要横穿上海市区，天天要去大场，虽然车辆有保证，但劳命伤财。而且路太远了，关押人员出点事，处理也不及时。为此，专门打报告给远在北京的王洪文，把关键人物转移到靠市委近的地方，等候中央发落。具体就是从大场警备团，转移到上海少教所，警卫工作不变，仍由警备团负责。少教所内，警卫部队住吃的地方，关押人员的住吃地方，每个关押房间全部是低压电源。总之，住吃洗拉和安全，缺一不可，包括关押人员的放风、晒太阳问题，治病问题等等都给予落实。

3. 关押人员的自伤、自杀事件

在大场被关押审查的人员，生活上都是自费(都有原工资)，按警备团干部灶伙食标准供给，自己可要求加菜。只要不死、不跑、不串供，生活上尽可能提供方便。

每个关押对象一间房子，平均有 15 个平方米。房内有办公桌、椅子、床。门前有一间简易的厕所，一排有六七间房子，轮流合用一只大马桶。因为房门、窗户始终是关闭的，看不到外面，出房提审就等于放风。看护的哨兵门里有一个，门外有两个流动哨。每小时换一次岗，白天黑夜都是如此。

(1) 林立果制定的《“571 工程”纪要》里面，明确建立武装特务别动队——教导队，就是这个教导队的头子，名叫宴剑锋也关在这里，他的态度比较顽抗。一次宴趁外出上厕所时，他拣了一粒象鸽蛋大小的有棱角的石子，这一点哨兵很难发现。回到房间，宴剑锋用手把这粒石子硬往喉咙里塞，但塞到手指无法触及，石子又有棱角，既下不去，又上不来，堵在咽喉锁骨上面。因为难受，而且影响呼吸，被哨兵发现。当我们接到报告，已经是下午了。让八五医院医生去，也弄得束手无策。我亲自把他送到华山医院，开始用钳子，想把石子钳出来，钳子弄断了两把，石子还是钳不出来。医生建议开刀手术，切开喉管取出石子，这件事一直搞到半夜三更，总算解决。又让医院腾出一间病房给他独住，派部队警戒守护。

(2) 空四军后勤部部长胡锦涛，这个角色是王维国的亲信。王维国的一些活动也不瞒他，胡锦涛为王维国的活动提供物质上和经济上的保障。

胡锦涛在于新野来沪第二天，伙同杜贵珍，乘车到虹桥路伊犁路的灯团附近，这也是毛主席专列要经过的地区。他们有如此闲空和雅兴，部长和政委双双到这个敏感区域活动，为了哪桩？后来又双双进入到值班的地下指挥所。胡在被关审时，自己带了把进口剃头刀，放在棉大衣里，把衣袋搞破，这把刀便沉到大衣的边沿。在审讯关键时候，他便把剃头刀拿出来割断自己静脉血管，便痛苦倒在自己房间床上。哨兵见他反常的动作表情，立即发现，医生及时赶来。中午发生的事，我从市区赶到大场，见还血流不止，没有专门医生，立即同市革会一办联系，安排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赶到大场。专家们来了之后，看他操作非常简单，取掉包扎的纱布，把伤口扒开，对流血的血管一头用夹子一夹，另一头也用夹子一夹，都不流血了，然后提出送医院做手术缝合消毒。我们还是送往华山医院处理。

据医生介绍，胡锦涛用剃刀割的是静脉血管，如果是动脉血管，早已没命了。也

许这把锋利的进口剃头刀，当他准备了结自己一生时，虽下了决心，但当他下手之时，一刀下去还是留有余地。因此，他也命不该绝，没有切到动脉血管。

还算好，我这个专案材料组长，总算幸运，没有出人命的事，没有死掉一个，没有跑掉一个。这件事发生之后，警备团上上下下，进行了检查，对在押的对象又一次彻底清查，以防万一。转移到少教所，特别注意安全，绝不能出任何事情，因为留下来的人，是案子比较关键的人物。时间一长、生活上有很多不便，洗涤、放风、晒太阳、家属有特殊情况子女相见等等，都要一一安排。

我在1973年底，1974年初离开专案材料组，到上海后方小三线当“总指挥”去了。

四、任职上海后方基地(小三线)

引 子

“三线”是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形成的政策措施。饱受战争痛苦的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浴血奋战为人民打下了江山，迎来了相对的稳定。

然而世界风云，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在这大千世界里，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面对两霸争雄，向外扩张，对我国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此时此刻，党中央领导人居安思危，不失时机的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加强“三线”建设。国家有“大三线”，地方各省市，有自己的“小三线”。毛泽东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

常言道：“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这样大气候下，全党动员，国家决定有备无患。不至于到时候，手忙脚乱。对这个基本思想，从战略上讲，不能讲是“过”。中国人有句老话：“好天防阴天”，天有不测风云。从整体上讲，这是正确的，也一直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应该看到“三线”是历史特定环境中的事物。用现代人的眼光，特别是从经济角度上讲，是绝对劳命丧财、得不偿失的事。那个时期，那种环境气氛下有谁能否定？中央作了决定，从上到下谁敢讲“不”字？那个“接班人”还讲：三线建设要山、散、洞。山——就是要近山，分散——不能集中，洞——厂要建进山洞，在山洞里生产。这是错误的估计形势，描绘一幅可怕的画面。实践证明，这样的决策把我们有限的“血汗钱”用到不恰当的地方。这种浪费和损失是无法估量。适当作些

准备，有备无患是可以的。

【叶注：这段话有些矛盾，没讲清。】

上海“小三线”是全国唯一能够自成体系，独立生产并已产生相当的效益。当然，离开它的投入是微不足道【叶注：应是指投入与产出相比】，尽管如此，已经是不容易了。可以这么骄傲的说，凭借上海老工业基础的实力，凭借上海全市人民的支持，凭借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凭借“小三线”全体军民辛勤劳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能较快完成“三线”建设的任务，从试生产、投产、到能上缴利润给国家，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况且，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生产的武器、弹药，在越南战场上打出高水平，打出国威！尽管越南人民军代表到山沟里参观时，不相信、看不起，他们认为穷山沟里不可能生产出高水平的武器，但事实胜于雄辩，毕竟是上海后方“小三线”生产的产品！

接受新任务

1. 新的任务

1973年下半年的某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找我个别谈话，他对我说：你到后方小三线去，过渡一下，那里准备建党搭班子。市里决定你去待上半年再回来。

在后方“小三线”的领导们，听说我要去，也非常“热情”地一次次来向我所谓的请示汇报，弄得我心神不定，又无法推托。事实上，那里确实非常需要年轻的干部，能为后方“小三线”沟通上下级的关系，左右渠道的联系，方方面面的平衡、协调。

2. 上海“小三线”的由来

上海的“小三线”，原来是华东地区的“小三线”，由华东局、南京军区牵头主办，它是配合国家的“大三线”，根据本地区的实际，从战时各自为政、独立作战考虑的。当时是由南京军区副司令饶子健和华东局组建班子，作前期选点、拍板设计定型。由于“文革”的发生，华东局撤销，其它省无法落实，华东地区“小三线”适当集中收缩，改为上海的“小三线”，建设任务全落到上海。上海此前已在那里建成相当大的两个劳改农场，一个黄山茶林场，还有练江牧场，铜岭矿，荻港战备油库，以及军舰修理厂等企业。周恩来总理曾提议把整个皖南山区划归上海“小三线”，但当时的安徽省领导人不愿丢掉这棵“摇钱树”，就讨价还价，被拖了下来。

【叶注：似指周总理拟把整个皖南山区的行政体制划归上海“小三线”领导，但安徽省不愿。故造成后方基地的单位归上海领导，但单位所在地属安徽领导，双方易生矛盾。】

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的概况

1. 概况

我到后方基地时，整个“小三线”的工厂布局都已定型，有的在建设之中，也有的已在试生产。大多数工厂的土建在收尾或已结束，主要在安装调试和试生产。初具规模的后方基地战线相当长，进入后给人有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1). 基地 88 个单位，职工和家属近 10 万人。这些单位分布在浙江、安徽的三个地区，计 16 个县、市的范围内。这些单位的建设、生产、生活，涉及到上海的许多部门，如：一机局、冶金局、轻工局、仪表局、电业局、邮电局、交通运输局、公用局、建工局等，还有公安、检察、法院、一商局、二商局、财税局、粮食局、卫生局、教育局等。

(2). 整个基地的建设布局，是按照战争时期，上海各方面处于全面或部分瘫痪，后方的工厂能快速应变，接纳上海转来的生产任务和大批人员，组织生产自救减轻国家负担，生产急需的武器弹药支援前线，医院应变扩大接纳伤员等等，一切从战时出发。后方基地相当于一个大城市战时的缩影，各单位“小而全”样样都有，实际上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

2. 各单位的分布

(1). 上海一机局的工厂，分为贵池、宁国两个地方。

贵池生产 57 和 85 高炮，包括炮管、炮车及联动装置，由贵池钢厂配套生产毛坯炮管给他们，贵池这一块把炮装配好用炮车拉出去就好用。整个一条线在贵池山沟里，上万名职工，相距几公里、十几公里，借助高山峻岭、绿树成荫，非常隐蔽。

宁国一块包括浙江境内是专门生产新“40”火箭筒、火箭弹的重点厂，另外生产手榴弹、枪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弹药的生产。

(2). 上海轻工局的工厂，主要集中在积溪县山区，他们沿天目山山脉，布了一条生产炮弹的生产线。各个部件厂从原材料进去，生产弹壳、弹筒、底座、引信、弹头

等，配套的有木箱厂、塑料厂、电池厂、印刷厂等，全套流程完备。

(3). 上海仪表局的工厂，在黄山脚下的旌德、祁门两个地方，布点最多，人员集中。

旌德是生产为高炮配套的“眼睛”和“耳朵”。全部电子化的测距机、瞄准仪、雷达、指挥仪等电子高科技手段，还有战场上用的步话机等通讯设施。以及为之配套的工厂、零部件生产厂。

祁门几个厂是生产磁性材料和医疗器械。

(4). 上海化工局的工厂，在东至县邻近江西省庐山脚下，北邻长江边，地处安徽江西交界的山沟里。主要是生产各种炸药的工厂，包括黄色 TNT 炸药、黑索金、火箭上天的助燃剂，以及为之配套的单位。

(5). 为基地单位配套服务的单位有：

供电系统：由上海华东电管局先后布点，服务宁国的 366 电厂，贵池的 312 电厂。

供水系统：原则上各单位自己打井或利用河流，抽水建塔，自行解决。唯独东至地区生产各种炸药，需要大量的水，由上海自来水公司独立建水厂供水。

交通运输：由上海交运局在后方组建一个“683”运输总场，根据三线生产实际需要，分建六个运输车队，另外一个培新汽车厂，以保证各厂材料和成品运输的任务。都建有为车队服务的油库、修理和生活设施。

通讯系统：由上海邮电局建立一个通讯总站枢纽，下设 6 个通讯分站，它的任务保证厂与厂之间，指挥系统随时通讯联络，做到同上海一样方便。

医务系统：保证三线职工的医疗卫生就医，同时也考虑战时的后方医院的准备，由上海卫生系统从各医院抽调力量，在基地分别建立医院。在宁国的胡乐，有市仁济医院等单位新建的医院；在积溪地区的瑞金医院，是市二医负责新建的；贵池 85 钢厂新建的长江医院，东至新建的天山医院。这些医院的病房和设备都是比较先进的。

客运系统：为了方便小三线职工的进出，有的是工作，有的探亲访友，上海客运开辟新的长途线路：

上海→屯溪（黄山市）、上海→黄山茶林场（旌德）、上海→贵池、上海→东至。

3. 六个片区

上海的小三线，虽是分散，却又相对集中，为了便于指挥管理，把原来的“812”

和“507”两个指挥部合并之后，在行政上形成6个区域。

(1). **宁国片**：以机电一局单位建立的后方机电公司为主，下属单位：

联合厂：是比较大的工厂，主要产品手榴弹、枪榴弹、手雷、炸药包、爆破筒等产品。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检验装箱，进入国家弹药库验收。

协同厂：是生产40火箭筒，从材料进厂到成品入库。

协作厂：生产40火箭弹，包括研制“改40”、“新40”弹生产。

配套的单位有“366”电厂、汽车运输队、“260”通讯站和胡乐医院，包括广德的汽车中转站（加油、停车、住宿）

(2). **积溪片**：以轻工业局单位建立的轻工公司，它主要生产57高炮和85高炮的炮弹。

(3). **旌德片**：以仪表局单位成立的仪电公司，它又分旌德片和祁门片，它主要生产高炮的配套设备，如测距仪、指挥仪，及电子原件材料。

还有交通运输局在泾县的683汽车运输大本营，以及为车队服务的修理工厂等。

(4). **屯溪片**：是后方基地的指挥机关，附近的工厂有：

交运局的培新汽车厂，制造与高炮配套的指挥车，拉炮的牵引车，以及修理汽车等。

跃进机械厂：生产精密机床，出口的机床。另外还有一个红旗车间，生产为“40弹”配套的引信（是弹的关键部件）。

向东厂：是仪电公司的一个生产元器件的厂。

还有基地的一个五七干校。

基地机关西边的祁门3个厂也是后方仪电公司的，生产电子元器件的耐火材料、医疗器械等配件的工厂。

(5). **贵池片**：以贵池85钢厂为主体，它生产的炮管毛坯，提供给机电公司几家制造厂。

胜利厂是总装厂，主要加工炮管。

还有永红厂、五汾厂，及为这个片服务的配套单位：683车队，长江医院、江边运输码头、电厂，260通讯站等单位

(6). **东至片**：主要是化工局单位，生产各种炸药的厂。配套的单位如自来水厂、电厂、天山医院、283车队和通讯站。

后方基地领导机构和成员

1. 基地班子构成

根据华东局和南京军区当时确定的实施方案，由华东局和上海警备区组织班子，进行具体落实，由上海承担对口建设的任务。

先在安徽徽州地区成立“812”指挥部（这个812怎么来的已记不清楚）。这一摊子起步较早，它主要负责宁国片、积溪片、旌德片和祁门的单位，包括浙江的40弹厂，泾县的交通运输总场等单位。该地区的工厂主要生产“弹”和炮用指挥仪、测距机等产品。

后来相继在贵池姚街成立了以“炮”厂为主体的“507”指挥部，它主管池州地区的贵池和东至片的炮厂一条线和炸药一条线。

以后根据上海市的统一管理和布局，将这两个指挥部合并，组建成上海后方基地。市委决定让我参加后方基地的党委班子，大家后来管我叫小三线总指挥，我从来没意识到什么总指挥，也许是为抬举我吧。

2. 基地机关仿照部队的司、政、后的分工形式

党委办公室和政工部门一条线，生产一条线，后勤保障一条线。下辖：机电公司、轻工公司、仪电公司、化工公司和贵池钢厂。基地直属管理的：通讯总站、运输总场、财税组、电力组、电影组（下属6个放映队）。

3. 基地主要领导成员

韩克辛，基地党委书记，是位级别不低的老干部，胶东人。文革前刚从上海邮电局党委书记提升为上海市委交通政治部主任，不久文革运动开始，就被派往参加小三线的建设。韩在文革初期，虽没受大的冲击，但对文革有想法的，加上筹建小三线的特殊的使命，……。

张克宽，党委副书记，是上海警备区后勤部的副部长，也是位南下的老干部。办事不分巨细都挺认真，勤勤恳恳，坚守岗位，绝对是个好人，能同大家同甘共苦。其特点什么都不担肩骶，怕负责任，说话模棱两可，婆婆妈妈缺乏果断。山东人酒兴很高，但又喝不多。

李文彬，市委常委，负责抓生产的，原市纺织局副局长。据说他自己平时吹嘘曾当过康生的警卫员，经常发牢骚，对谁也不买账。李是出了名的酒葫芦，爱酒如命。

高景平，市委常委，是上海华东局的老干部，据说1957年反右受到过批判，任劳任怨埋头抓军工生产。

市委常委，李真是警备一师副参谋长、炮团团长李，他们都是调来负责抓军工生产的。

我去之后，市委常委班子里增加了两名新干部：*曹文金原是王洪文厂里技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毕业分配到基地的工厂，被提为市委常委兼基地团委书记；*顾榴令是解放日报的编辑【叶注：但后面又讲顾是一铁路小报的编辑】，随家属支援三线，后提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又补为市委常委。

【叶注：戴立清时任基地党委副书记】

4. 参加三线建设的成员要求

“三线”建设，作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因为保密的缘故，透明度不高，凡参加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要求相当高，人人都过政审关。凡是决定某某人支援“三线”，说明你历史上清楚，组织上信任，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你也无法推托。有困难克服，有思想帮助，对不少要求进步的青年入团、入党这是个重要的考验之一。这项工作，从上到下，都暗暗的有专门班子进行落实。不少单位的班子里党、团员多，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多，有的是技术骨干，要求进步的人……。也有个别单位是全迁进山。

各单位来到后方，方方面面有很多未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能解决的。上海各部门间本身都无法沟通，得不到解决，更何况同外省市的关系。各个单位自找门路，各显神通。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落实到各个基层。后方同前方的关系，同前方的各部门关系，上下级的关系。生产是死的、物质的东西好办，人的关系、人际的处理是十分复杂微妙的。

要树立上级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威，就必须带领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列宁曾讲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什么叫革命？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我作为市委派到后方“小三线”来的“少壮派”，面对的是一批朝气不足、暮气有余，畏首

畏尾、困难重重，人在三线、心在上海，工作无计划的领导人。党委班子组成，7个常委，包括我只有新补的2个年轻人【叶注：这与上述的常委9人数不符，如除去顾是后补的，还多出1人，莫非那李副参谋长和李炮团长是一个人】。机关里的工作班子，各部门都是老机关干部。办公室主任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一个小报的编辑顾••，后调到华东局转来后方【叶注：这与上述的顾是解放日报编辑不符】。组织部门是海运局机关调来的老干部，里面没有一个是年轻人。生产部门是上海长宁区人武部部长相农同志，除他外还有两个人也是武装部的政委调到后方的。我们领导机关是这样，下面各公司、各厂也都基本差不多。

群众的心理，进了山沟里，等于定了终身，都为自己切身利益考虑得多，低头不见抬头见，免得找麻烦，能忍则忍，对矛盾回避，不想惹事生非。你好我好大家好，也有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受到压制的人，憋了一肚子气，心理极不平衡。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一句口号在后方没有落实、没有实际内容。我提出基地党委要统一认识，必须补上这一课。我们召开后方基地党委扩大会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集中到指挥部，学习文件，思想务虚，典型说话，统一认识。从基地机关到基层单位补充了新生力量，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的组织作用，加强指挥部机关的生气，把年富力强、有朝气的青年人进驻机关各部门，组织活动放手让他们工作，轮训基层力量，充实基层领导。

解决联合厂的问题

1. 联合厂的情况

联合厂在全基地工厂中规模较大，有一千多职工的党委厂。也是生产手榴弹、炸药包、枪榴弹、爆破筒等常规弹药的重要工厂。

该厂是在上海文革初期，工厂造反派刚起来时，就全迁到“小三线”的，故厂领导班子除了一把手是新配来的，基本没动。而厂党委书记严承元虽是后调来厂的，但他思想观点对“文革”抵触。进山之后是原班子“多数派”掌权，少数派始终抬不起头来。特别运动初期，受到“造反派”冲击的领导们，始终耿耿于怀，进山之后，就千方百计利用机会整这些人。在严承元的统一布置下，厂里“多数派”的头头摇身一变成为“新干部”，又成了厂领导班子的第二把手，与原来厂里一套老班子抱成一团，形成气候，一统天下，他们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残酷的

打击报复。

这个严书记以军工生产特殊，当地县公安局局长据说是他的战友，可以把手铐借给他，随时都可以抓人。驻厂的军代表，穿了军装，活象厂里的太上皇，因为产品验收，银行要有他的图章才可以拿到钱。老婆孩子住在厂里最好的房子，在家属区还养了几头猪，搞得乌烟瘴气，也是同厂里一鼻孔出气，倚老卖老。厂里还养了一批专门整人的班子，上下配合演出一些惊人的冤假错案。严承元在全厂大会上讲：我让公安局抓谁就抓谁。还真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

2. 联合厂的严重问题

(1) 告状信

这个厂在“文革”前，从部队转进来一批复员军人，在文革初期造反过。后来工厂全迁后方，他们面对厂里一伙人的倒行逆施，以及深受冤假错案的迫害，曾联名写信给党中央王洪文副主席。王洪文阅信后批示：“如果反映问题属实，这个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王把信转给了张春桥、姚文元，张、姚又阅转给上海马天水，马把信批给市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并提出要派调查组进山。于是市工交组的军工组、机电一局和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进了该厂。经过二个月的调查，虽有很大的阻力，终于把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十六个问题，查清了十四个半完全属实，尚有一个半问题，有待查证。

根据全基地的实际情况，抓住联合厂查出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如实向市里作了反映。我数次向马天水、黄涛和机电一局汇报和交换意见，决定按照王洪文的批示，揭露联合厂的严重问题，支持厂里的广大群众进行夺权斗争。基地党委召开扩大会，会上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以及给市里的调查报告，大家就联合厂的问题进行讨论，统一了认识。其间我们单独找了联合厂党委书记严承元谈话，虽然他与厂里的两个冤假错案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党委书记轻信一派的胡言，造成假案，陷害无辜，也应严肃处理。

(2) 联合厂的两个冤案

冤案之一：厂里有位保卫干部，也是个老同志，北方人很耿直。“文革”初期，一些厂里的复员军人造反，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对厂里一些领导的所作所为，也喜欢

提出点看法。厂里领导对他既恨又无奈。

清队中，厂里一些人认为有机可趁，又在这个保卫干部的档案里发现一张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他们如获至宝，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利用手中的权力，突然把这个干部关押起来。厂里的这伙人，把这张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翻拍印发到全厂各车间，大造舆论污蔑这个保卫干部是什么特务，以此打击报复之，进行精神上摧残。而本人关在里面，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其实，这件事档案里说得清清楚楚：抗战尾声，我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歼灭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收复了大量失地，日本人投降了。当时的苏联同蒋介石政府有外交关系，为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对日本的受降，同意以国民党军队服装出现。因此，东北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穿国民党军的服装，受降接管了日本统治区。厂领导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为了派性的需要，编造假案，利用清队的口号，进行打击报复。这位保卫干部，人很老实，不多说话，受到这样的迫害，全家遭殃。老娘年纪很大，听到儿子是什么特务，急成重病，不久离开人间。他的老婆，得知丈夫如此下场，为划清界线，带着孩子分道扬镳。好端端的一个家，祸从天降，家破人亡。

冤案之二：联合厂另一起案子，更说明厂内掌权的一派人，为打击异己，已不择手段。厂里有一个车间，办公室一台新装的电话机失窃，山沟里没有人进出，又有铁丝网围墙、警卫，有谁能偷电话机呢？厂里发生这样的事，当权者不加分析，无限上纲，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厂里分散的各车间有警卫十四人，他们在运动中又都是造反派的观点。为了整一整这些人，厂里的领导们小题大做，组织专门班子查此案，把这十几个警卫全部关押起来，不许回家，办什么“学习班”审查。其实这不是为了电话机失窃，而是借题发挥，进行打击报复。

十几个门卫无辜地关押了五六天后，邻近的一个公社有人来报告，发现村里一个低能小孩，拿着一只电话机的话筒在玩，问我们“三线”厂有否丢失。专案组的查案人员迅速到当地村里，找到这个低能小孩，查问电话听筒的来路。经查问，小孩子带路，找到厂车间，钻进围墙，指明办公室作案的地点。同时，在车间后面山沟里，找到已敲碎的电话机，全部拣了回来。这件电话机失窃案已告真相大白，那么为此被关押的十多人“学习班”也该结束了。然而，联合厂的这些人并非如此，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对已查清的事实封锁消息，不让声张，继续关押这十几个人。这些警卫人员，已受尽了折磨，被逼供、审问，本该随案件搞清，结束这非人的待遇，但他

们没有这样做，继续关着人不放。又拖了三四天，才草草收场，解散这个“学习班”，也根本不理睬这些人结论如何。

总之，联合厂的这些人派性冲昏了头脑，权欲熏心，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欲制人于死地。一手怎么能遮天？纸如何包得了火呢？“文革”已进行了7年之久，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令人不可思议！

3. 处理联合厂问题

联合厂的问题查清后，我向基地党委提出严肃处理的意见，党委研究后汇报了市工交组黄涛，又向市委作了请示报告。

1974年3月28日，基地党委召开全基地的广播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联合厂大礼堂，各单位派代表到中心会场参加大会，其他职工都拉线收听直况广播。我们经市委同意，邀请了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人来基地参加大会，市工交组和一机局也派来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先由市里驻联合厂的调查组主持，揭露厂里一些人滥用权力，拉帮结伙，违反政策，打击报复不同观点群众，触目惊心的事实。会上宣读了联合调查组上报市委的调查报告；宣布了基地党委对联合厂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厂党委书记严承元停职检查，厂“第二把手”新干部、厂原清队专案组长和办公室主任隔离审查；会上还宣布了联合厂的新领导班子。

之后，大会由基地党委主持。基地党委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各单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必须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看到对文革至今耿耿于怀是个立场观点的问题。告诫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不要坚持专想整人的资反路线，应转变立场，深入群众，保持晚节。在市里各单位代表讲话后，大会结束。这次大会规模空前，声势之大是后方基地从没有过的。

通过联合厂的问题，我看到一些老干部绝大多数是好人，辛苦勤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但总想不通怎么会在文革中成为走资派，被造反派批斗。虽然绝大多数人已落实政策，出来工作了，但有些人的感情、立场还是老的，一有机会就表现一番。这次处理联合厂的大会，也可以从正面教育下大多数。

解决单位小社会的困难问题

从“抓革命”入手，扫清思想障碍，全面推动后方“小三线”的各项工作。要保持后方的好形势，关键是用人，机构健全，人员配齐。要优先提拔把家属全迁进山和在后方建立家庭的职工，这样才会从后方的实际利益考虑，克服那种临时工、混日子思想，安心于“三线”工作。

1. 小社会的现实困难

“小三线”处在非常时刻，抗美援朝的生产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这是毛主席直接抓的重要任务。然而，几万人到了山沟里，吃住用，衣食行，油盐酱醋茶，件件少不了。每个厂就是一个小社会，样样要管，件件全包，单位里的领导就是那里的小政府。凡是社会上有的，单位里都有。

每个厂都有小商店，每个厂都有临时小菜场。除了厂里单身职工，厂食堂一日三餐外，还有迁来的家属、子女。家属户有多，有少，各厂不等，他们天天要吃饭吃菜开伙。厂里要为他们样样想到，件件摆平。特别是大雪封山，无法进出，短的三五天，长的半个月。开始没经验。思想上没准备物资上不来，只好组织群众下山，人背肩挑找吃的。我们“三线”厂吃的菜，当地是无法满足全部供应的，各厂自己想方设法去采购，汽车满世界跑。甚至到温州海边去买海鲜，杭州、祁门购蔬菜，萧山、芜湖买咸腌菜、萝卜干，西面到景德镇、婺源等地。沿长江的还好一点，到芜湖、贵池、东至、铜岭、南京，有的直接到上海的沿线，平望、湖州等地是最多。但吃荤的肉，在计划经济下，都是计划供应，上海的指标不放弃，农村里还可以打点擦边球。真象“三线”职工讲的：我们吃的菜是汽油里“泡”出来的。一点不假，三五天供应一次，车子出去采购，厂里已经象上海的小菜场一样，篮子、砖头、石块排起队来。车子一到厂里，厂领导和科室里的干部一齐动手，按大户、中户和小户分配……。

各厂里的商店，除了日用百货，还有“三线”厂必不可少的老酒、香烟，日常生活用品，针头线脑，包括职工的邮件代寄等。最感到麻烦的，山沟里农民，特别是农村里的干部来光顾小卖部。常年来，农民分散居住在山村，交通不便，较大点的村子有供销社，东西单调，价格不便宜。我们“三线”厂虽远离村子，不近居民，自己的小商店只是为解决“三线”职工生活需要。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农民们还是纷纷赶来，商品多，价格便宜，服务态度和条件好。毕竟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又引起同地方商业部门的矛盾。

每个厂都有招待所。来山里出差、访友一时回不去的都得住下来。有没有人来，每个厂都得准备好。住一宿收五角钱，这是厂里的额外收入，解决同当地部门打交道的开销。诸如村干部来厂，招待茶叶、吃饭等费用。每个厂必有的医务室，代办邮政、长途电话；每个厂户口、油粮关系的管理、纠纷的处理；事无巨细，样样管，来到“三线”的职工，多数是青年人。男女分配又不均匀。男人集中的地方找不到女朋友，如机电公司系统、钢厂和运输场，男同志相对集中。而仪表系统、女同志集中，男同志又少。住在山沟里，厂与厂之间距离近的几公里，远的几十公里。有的厂，车间与车间也有十几里地，又没有交通之便。

上海后方基地的全部职工，户口迁出上海的，安徽、浙江当地不收，也不管，户口、油、粮全部没有着落。到“三线”的人员，吃粮经过省里同意，让当地粮食部门暂借，吃油按当地标准借给。户口不解决，不仅涉及到油粮关系；结婚青年哪里去登记，生了小孩后户口报在何方？有一对进山的年轻夫妇生了孩子，已经7岁了，还是“黑人、黑户”。

一些家属子女迁进山区，读书求学无处去，如果读了谁管分配？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如何解决，怎么解决，这是一些厂领导无能为力的。当地没有我们的教育计划，再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困扰，有了也不愿去。学校离厂区很远，家长怎么放心子女去读书？

治安的管理，特别遇到刑事案子、交通案件的处置，由于地区差别，政策界限不统一，处理的结果悬殊很大。让当地处理，掌握政策认识不一，量刑处理尺度不同，有的当地公安部门干脆不管。报上海公安部门，路途遥远，拖了时间，影响破案效果。比如轻工公司一个厂的门卫，也有了一点年纪。家属区的小孩，山沟里也没有地方好玩，常常聚在门房间玩。一方面大人上班，小孩子没有管，门房间有人可以照应。结果，这个门房把一个小女孩给奸污了，这件事使“三线”职工非常气愤。这个案子放在上海，奸幼必定是重刑打击，决不含糊。但是，材料报上去，当地公安机关把门卫关押了几天，“教育释放”，这怎么让人接受。

就连小小的吃糖问题，没有户口，计划糖没有。“三线”职工生肝炎，住在后方几个医院，由于户口没解决，病人的糖没处供应。真是岂有此理！

来到后方基地的一些干部们，绝大多数都是临时观点。大量的实际问题，谁来管，谁来问，具体困难不解决，怎么能让人安心生产？干部们户口、家属都该迁到后方，

但他们不会的，因他们根本不考虑长期留在山区，故也不去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那里的干部职工，业余生活根本谈不上。“小三线”各厂的小卖部，生意最好的是香烟、老酒。晚上无所事事，从领导到群众，都迷恋酒，以酒浇愁，搞吃搞喝。玩扑克是允许的，打老K、捉猪、放羊等，无处可去，没有电视，生活枯燥。当然，专心求知，要求上进的，发挥个人爱好的也不乏有人。

2. 下决心解决困难

“三线”工厂，面对大量的实际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除了我“上窜下跳”到处呼吁，大造舆论，求得各方面同情和支持，还亲自去邀请上海市有关方面领导到“后方三线”实地视察，就地办公。

(1) 解决粮油和副食品供应问题

请上海市财贸组（六办）的主任黄金海，上海市粮食局的党委书记彭朴，上海市商业二局的市委常委、副局长等一行，到后方基地视察，听听反映、看看实际，当场拍板。凡是上海市民的计划商品，后方基地的职工一视同仁，定点由上海供应。烟、酒、糖、粮、油、肉、布等全部解决。

关于菜篮子，基地党委研究用两个办法，争取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或完全解决。

一是基地党委同当地政府联系，请他们划出一些荒地给基地单位，也充分利用厂内的边角空地，开荒种地、养猪。并且抽一定比例的工人、干部轮流到“五七”田劳动，定点、定人、定指标，生产部分能自给的蔬菜。基地和各公司、厂设机构和人员，专抓落实。

二是搞几个副食品生产基地。蔬菜基地：利用宣城县的省军区军垦农场四师的关系，划出广德县附近28团作为“三线”种植蔬菜的基地，同各公司、工厂签订供销合同，品种、数量、价格等落实。

猪肉基地：利用上海市公安局在安徽有两个农场（白茅岭、军天湖劳改农场）的条件，为他们建造两个半机械化养猪场。二、三年之内解决“三线”工厂每人每月的猪肉定量供应。劳改局的领导们对此非常热情，表态很坚决。为给两个养猪场配套，我们还设想搞三个冷库，五部冷藏车。在白茅岭农场、贵池块、后方基地机关各处各建一个一百吨的小冷库，便于存放猪肉，统一调控。

(2) 建立“后方基地”自己的交通网

一是在基地内的短途交通。我们向上海市委报告，为改善“三线”职工在山区的交通，方便进城、去医院、厂与厂之间的往来，在整个后方建立自己的交通网络。我向马天水申请了十五部大客车，划分六条线：东至、贵池、旌德、积溪、宁国、屯溪。每条线各自负责本地区“三线”厂职工去医院、上县城办事、厂与厂之间联络，每日对开上午、下午各一次。

二是长途交通。由市客运处为后方基地开通长途客运线路：上海至屯溪，上海至黄山（旌德），上海至贵池，上海至东至，也是每天对开班车，专为“三线”职工，也对下乡知青予以照顾。

(3)在基地设上海的公安处和派出所

在外省市建立上海的公安处，管理自己的“三线”工厂，户籍、治安、刑事，以及交通事故。这个设想的实施，首先上海市委要通过，这个问题比较顺利的通过了。然后让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配备人选，组建上海后方基地公安处。

我是单枪匹马，横冲直撞，不厌其烦地往来上海——合肥——屯溪——上海，马不停蹄。找安徽省委三个巨头，再找省公安厅领导，报请公安部批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抓住公安部两位副部长来视察安徽、浙江、上海的机会，全程陪同，让各方面点头、拍板，联合书面文件上报公安部，他们备案批复，一气呵成。

经过不少周折，劳动的汗水没有白流，后方公安处正式成立了，统管后方几万人、上百个单位的公检法业务。后方基地公安处的业务受上海市公检法领导，行政、党组织由后方基地负责。公安处的领导班子，由市公安局派了一名局党委委员林长青，以他为主，配了副处长，检察院、法院也相应配了干部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公安处的同时，建立上海后方基地民兵指挥部。各公司相应建立六个派出所，配备警服、警具、枪枝等物质装备，公安处同民兵指挥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互相配合共同维护后方“小三线”的安全、保卫和稳定。

(4)活跃文化生活

我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商谈，并由他陪我一起到电影发行公司，让他们指定专人负责“三线”工厂的各种影片发行。我强调“三线”职工文化生活太单调枯燥，要求他们保证每星期能看到一部或两部电影片子，凡上海市公开发行的影片，必须同时发行给后方基地。同时基地电影组也建立了六支放映队，统一管理安排到各单位去放映电影。

文化系统也动员文艺界人员到后方“三线”体验生活，组织慰问队到“小三线”的工厂演出。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曾到后方“三线”各厂轮流演出。文化系统还保证今后会分期分点经常到后方来演出。对有条件的单位，我们就上山安装电视差转台，可收看电视节目。这些尽管还刚起步，但我们尽可能创造条件改善职工的业余生活。

教育局进山调查研究，同意“三线”各厂建立小学，师资、教材可以支援，小学升中学计划列入市里指标；后方“三线”以块为主各建立一个中学，列入上海市教育局计划，教材、师资、以及学生分配计划等全由上海教育局统一归口。小学、中学以“三线”职工家属为主，有条件的也应提供方便，照顾解决当地居民就学困难，但中学不包括分配。

上海市体委领导主动向我提出：他们可组织上海市的篮球集训队进山，对“三线”工厂进行友谊赛、表演赛，也可同当地的专业运动员作公开友谊赛。乒乓队、体操队等都逐步到“三线”工厂，同“三线”职工见面，丰富他们的文艺、体育生活。同时，也促进、指导我们后方的体育活动的开展。我们也让工会、团委组织文体活动，让职工、青年人活跃起来。篮球、乒乓球等层层选拔赛，各单位分几个赛区，选拔出来后，就在基地开运动会。

(5) 解决怪病

当地发现一种怪病，一个人本来好好的从事各种工作，一切都正常，根本没有反常的预兆，会突然间暴发。主要症状：四肢无力，动弹不得，头脑清醒，心里明白，不会讲话，没有表情，其它没发现什么。检查，没有热度，血压、心跳没有异常。医院里讲不出所以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观察，常规补液，根本无济于事，这样拖几天就无声无息的死亡，病因无法知道。这件事在后方“小三线”也引起一些恐慌，类似的病，指挥部也接到过报告，我们走访当地，调查研究，同时立即报告市委。地方上也告诉我们，这种类似的怪病，死亡年年都有，但从来没引起足够重视。因为不是普遍，也没组织人专门探讨。我们还发现，当地居民养成一种习惯，经常在街上发现买卖臭的咸鱼、海带之类的海货，以及咸肉腌制品。

“三线”职工来了没多久，就不明不白死了，什么病都不知道。上海市委非常重视，我们进山的医院，由卫生局专门组织班子对死者进行解剖，第二医学院还组成医疗队到山区蹲点。检验结果一切常规都属正常，谁也没想到在血液分析中发现钾的比重较低。是否因为缺钾引起的症状，后方几个医院向当地进行通报，凡有这种不明病

因的病人，立即查血液中的钾。实践证明，后来发现几起类似的病人，送到医院补钾，立刻见效。对这种病，我们后方“三线”的医务工作者给它起了名，叫无力综合症——缺钾引起。病因找到，这种病极其简单，但谁也没想到，一发病，钾到病除。我们后方基地后勤组组长蔡，就是这种病。他是驾驶员，车子开得好好的，突然间无力，车子向山边一停，人就瘫下来，再也无法动弹。他心里很明白，无法表达出，拦车送医院，补钾即愈。

生活实践中，长期以来人体缺钾产生的后果，从来没有引起医务界的认识和重视，为此不明不白的送掉多少性命。在我们上海后方基地发生，上海市委的重视，上海卫生局和医务工作者的重视，通过实践找出原因，查出结果，为此，上海专题报告了国务院。这不仅解除了“三线”职工的后顾之忧，也给地方上解决了多年历史遗留的难题。国家卫生部根据上海的报告，特发文件给全国各地卫生部门、各大医院，望引起重视。

然而，由于人们惰性的作用，医生的习惯治疗，这种病还未能引起医务人员的足够重视。就在我们后方“三线”发现人体缺钾病因之后的一年里，天津市委的秘书长大约在七五年上半年来上海办事，突然感到不适、无力，住进了华东医院检查，几天之内便死于非命。常规检查一切正常，找不到原因，结果还是发现缺钾是死因。这件事对天津市委的震动很大，也引起他们的重视。

(6) 改善住房

凡是进山职工有家属迁来后方的，住房优先予以照顾；凡是在后方“三线”结婚成家的职工，新婚分房楼上楼下，外加厨房卫生间；凡是外地的“三线”职工家属、子女插队在外地的，原则上可以照顾迁来“三线”全家团聚，住房尽可能满足，提供方便。在后方“三线”工作的单身职工，原则上每年两次回沪探亲，工作上方便的给予照顾，可借出差机会回家。

(7) 召开“五·七”种田经验交流会

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我们总结不同类型单位的经验，召开上海后方基地“五·七”生产劳动大会。有的单位，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发动全厂职工，以及家属、学校的学生、老师，开荒种地，在林场里广种博收，种的玉米、地瓜做饲料。辛勤的汗水，得到丰厚的回报，收获的饲料养猪，全厂自给有余。而隔壁一家厂，截然相反，领导不重视，没发动群众，“五·七”田劳动冷冷清清，没有肉吃。我们动员搞得好的单位，

把多余的活猪，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送给兄弟厂。这样刺激他们自力更生。

全后方召开各“三线”厂后勤保障工作会议，除了表彰先进单位，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如养猪缺乏苗猪的供应，我亲自找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请她为我们“小三线”开展“五·七”活动，提供技术和物质的帮助。还由她陪同去了“葛隆大队”参观种猪场。

(8)没完成的设想(办小型纺织厂、农场)

后方“三线”的实际情况，男女分布不均衡，还有“三线”职工夫妻大多数分居两地，特别是家属户口在农村，包括子女支农在外地，最好能搬在一起，或靠近一些。

我们想到贵池地区靠长江边，有大片荒地闲置，如能办一个中、小型的纺织厂，招用一批女工来生产纺织品，可以解决贵池钢厂和炮厂的男女失调问题。同时，再在旁边建一个农场，把家属、子女在外地农村的可以迁来，让他团聚，有利于安心“三线”生产。我们后方基地党委的几个人曾开会议论过，也到现场看过地形，只是还没能放到议事日程上。

抓革命，推动了各项工作

1.抓革命，促工作，扭亏转盈

由于完善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各责任部门的主动积极作用，特别抓了联合厂的典型，推动整个后方三线厂的生产。在全国各省、市的“小三线”，据了解没有一个地方是能正式投产的，更没有上海这样的规模。上海“小三线”在市委和各局领导的重视下，投建的工厂80%以上全面投入生产。在1974年当年，全后方三线工厂基本扭亏为盈。

后方1974年的“3.28”大会，全面发动了群众，会后组织各方面力量，解决“小三线”长期拖着实际困难。这些带普遍性的困难，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是无法解决的，而实际困难不解决，成为三线职工的包袱，越背越重影响三线的稳定。要解决也是有相当的难度，我是花了全身解数，上至公安部、上海市委、安徽省委，下至上海公安局、省公安厅，以及各地委、县，以及各公安局，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解除了后顾之忧，大大的促进了后方的干部、职工、家属的积极性。

我进山的当年军工生产就扭亏转盈，第二年后方小三线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全年上缴二千多万元人民币。

2.11 发炮弹，打掉9辆坦克

文革中全国不少地方生产不正常，我们上海“小三线”的军工生产任务非常忙，当时抗美援朝物资的任务很多都压在上海地区生产。

基地机电公司的“协作厂”，位于浙江省紧邻安徽宁国县的一条山沟里，他们根据苏联四〇火箭弹，改进装置成“改40”火箭弹。经过试验，得到国家武器装备部门的批准，在我们“小三线”成批生产。它的性能优于原来好多倍，功能上高温、高速穿甲，然后到心脏内部爆炸。穿甲的厚度达到20公分的钢板能穿透，打苏式T72的最新坦克不在话下。我们改进的“新40”火箭弹，不仅穿透力强，还能延时，到坦克内部心脏爆炸，杀伤力极强。

就是这种改进的“新40”火箭弹，在越南战场上，用11发弹打掉9辆坦克。为此，兴奋的越南军方通过外交部向我方提出，要求派代表团到这个生产厂进行慰问、学习。经报告周总理批准，由上海负责接待。上海接到这个任务后组织接待班子，通过江苏、浙江、安徽的省军区，沿途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十几辆轿车浩浩荡荡开进了山区。车队开了5个小时，到了浙江省的一个山沟里，一排排的平房，简易的生产线，分散在山沟里。这个厂对我们“小三线”来讲，已是有相当规模了，是土洋结合、因陋就简，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抢时间搞出来的。为了迎接越南朋友来参观，还特地把工厂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

出人意料，这些外宾到厂里转了一圈，既没有慰问，更不是学习，连屁股还没坐热就打道回府。我们的接待人员感到莫名其妙，非常纳闷，不知原因何在，什么环节上得罪了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到了北京后向周总理告状，说接待单位不给看现代化的工厂，只是到山沟里转了一圈，根本不相信所看到的“三线”工厂，能生产出“新40”火箭弹。

可是我们这个厂的师傅们，为了改进“新40”弹的威力，从试验到生产，一丝不苟，反复试验。为了产品百分之百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一名炮手在试验中牺牲了，另一名成残废。军品生产马虎不得，经过多少次安全试验，严格规定保证质量。这样的产品出去，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也经得起考验。

3. 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支援地方生产

(1)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

从上海大城市到山沟里来，对“三线”职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僻静的荒山沟里，环境大变样了，在生活上产生了很大的级差，对本人来讲已经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然而常年累月在山沟里生长、生活了一辈子的当地农民百姓，他们用嫉妒的眼光看着我们，惊奇同样的人为什么生活差异如此大。对上海来的人，从生活习惯、衣着打扮，带羡慕的眼光，细心的捉摸、效仿。不论怎样讲，“三线”职工进山区，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都市里的文明。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是客观存在。根据《矛盾论》的理论，有差别就有矛盾，而且我们面临的是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有着双重的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当然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通过斗争达到矛盾的缓和逐步的平衡，再有新的矛盾和斗争。我们来到落后的山区、农村，带来了物质上的现代化、精神上的都市文明，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那里的生活，可是也出现新的矛盾。

平静的小村镇，安定的生活，自产自销、物价平稳。这里的农副产品丰富，由于交通不便，物资流通缓慢，自给有余。“三线”工厂一来，大批人员进入，突然给当地人们带来很大的变化。物以稀为贵，所有农副产品价格成倍的上涨，给农民增加了收入，也刺激了农业生产。而给城镇居民、非农业居民，靠工资吃饭的人，行政干部们的生活，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负担。当地属三类地区的工资，最高是芜湖属五类地区待遇，而“三线”工厂是八类地区的待遇，收入相比差异甚大。难怪上海人看到当地的农副产品，简直象“强盗抢”一样，从不问价钱，有多少要多少。当地人形容“三线”职工是“蝗虫”，走到哪里哪里遭殃。而他们的心里也非常矛盾，对上海的“三线”职工，既喜欢又憎恨。当地人还为三线职工编了一个顺口溜：

上海佬、上海佬，左手戴个表，右手挂着包，
穿得好，吃得好，口袋里钞票莫佬佬，
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死得早！

这些矛盾客观存在，不能回避，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上海。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作为上海市派出的一级机构，要为当地百姓造福，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小三线”地处两个省、3个地区、16个县，542个公社，几千个大队。我们也经常听到反映当地农民不讲道理的事发生：如有的把公路挖断，不让“三线”厂的车辆通行；有的公社到你“三线”厂里办公，吃用开销全靠你；一些矛盾连当地政

府也无法解决。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委专门开会研究，从思想上、理论上统一认识，在实际问题上认真处理好同地方上的关系，正确解决好各种矛盾。凡是矛盾突出的地方，我们高姿态，主动上门拜访地方官员，并且尽力从技术、物资上支援当地农业生产，改善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我们“三线”厂应有的贡献。

(2) 尽力支援当地

当时农民在田间作业，还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老规矩：收割稻子时，用一只大方木桶放在田里，一面收割，一面人力甩打、把稻粒打落在方木桶里，相当原始。如果说我们工人是老大哥的话，看到农民兄弟如此劳命，不帮一下心里是如何滋味呢？为此，我们后方基地发出通知，专门开会强调，凡是“三线”工厂附近的生产队，三年之内要全部改变这种面貌。上海早已制造出的脚踏打谷机，后方完全可以生产，而且可以改成脚踏、电动两用的打谷机。我们发动各厂团委、工会组织制造，免费装备各厂邻近的生产队。在农忙季节，还发动“三线”厂职工青年组织队伍去支援。

另外，上海农村淘汰的工农十一型的手扶拖拉机，因马力小，不适应上海地区而换代。我从上海市委马天水处争取到500辆，支援“三线”工厂邻近的生产队，这一举措帮了我们后方的大忙，我要有关部门去落实做好这件事。

为了支援各县的邮电系统，改变他们肩背、自行车送信、报纸等，我向上海要了50辆幸福牌摩托车，这样整个后方16个县，每个县支援两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自行车都是紧俏商品，搞一辆不容易，不要说搞50辆摩托车了。真是天大的面子！

口子一开，各方面都来伸手，有什么办法呢？穷！有的地方就依赖你“三线”厂。到公社开会，到县里开会，当地的干部常常会向“三线”厂开口，派车、派人没完没了。“三线”厂的条件是优越，每个厂大车、小车、货车都有，电灯电话齐全。当地农民多少年没有电灯，我们的原则是花钱不多的有计划的帮助。支援抗旱，我们毫不保留，把厂里的设备无偿支援地方。凡是在“三线”工厂附近的生产队，农作物的长势就是比远的队茂盛，青枝绿叶，经济收入也成倍的上涨，整个经济都带动起来。

(3) 解决招待费问题

但是这样下去，对三线厂来讲也是个很大的负担。当地的风气，大事小事很会利用，能依赖三线厂的决不放弃。一次次来找“三线”厂的人，不是一般农民，都是有

官职的。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管解决不解决，先要招待吃饭，不讲大吃大喝，就是当地一般的吃喝。我们“三线”工厂从上到下各个部门，财务制度规定不允许请客吃饭报销，可是他们来了就要招待的，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也得求人家办事的，为处好关系，只能当领导的自己掏口袋。可是他们经常来，个人掏不起啊！生产队、大队、公社或县里什么部门的人经常光顾，来了就要吃饭、喝酒，确实负担不起！我每次到了各厂都听到这种反映，党委开会时头头们呼声一片。这是个实际问题，但我们无权解决，只能矛盾上交。上海市委被我缠得没法，马天水只好答应，“三线”厂有特殊性，可适当解决。后同财政局商定上报办法：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报销一个标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元钱的伙食费。同时，允许各厂用招待所的收费补贴这方面的不足，但必须从严掌握。

后记

写到这里，我觉得主要的方面都有了。去“小三线”将近三年，凭记忆写出来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差错，毕竟几十年前的事，没有一点资料可查，有些名字，数据记不清了。

五、杂谈——有感而发

【叶注：戴原文在这篇中抄录了许多报刊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如反腐的案例、国企改革情况等；还有许多网络段子、打油诗等。因都是抄录的，故不采用，全删。这里只摘录了“有感而发”中的部分段落。】

1. 三十年前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发展，而且如此的规模，除了对领袖的神化迷信之外，客观因素是人民对党的热爱，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杰出的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就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文革”在历史长河中是不足为道，而它确实实地十年。由于长期实行的“革命”左的路线，经济上“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大家有饭吃，上下没多大差别，尽管都很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那个时期的风气，今天不能同日而语。

2. 改革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开放了，思想长期在一种模式下紧固，

决堤而泻。经济大潮，让相当一部分人眼花缭乱，不能自持。泥沙俱下，大浪淘沙。当事者昏，旁观者清。“摸着石子过河”，给一些冒险者令箭。失败了喝几口水，付点学费应该的，到底河有多深不清楚，水流急不急也不知晓，形象的比喻，其实是盲目尝试，拿生命当儿戏，拿财产当赌注。真是，“子败爷产不心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揽的一切，“白猫、黑猫”是名言、在一定范围内的“真理”，并不是普遍真理，如果作为一种理论推而广之，就出现庸俗化。把它奉为划定是非的标准，其结果事与愿违，相差千里。“发展是硬道理”，这是猫论的翻版。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何种方式，你大楼盖起来了，高架修好了，就是“硬道理”，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大量的楼宇空置，据有关方面统计：去年底商品房空置面积破九千万平米，其中商品住宅空置占74.4%——2000.5.22WZ。背了一屁股债，造了子孙的孽，我们这一代还不清，连儿孙一代这些债也还不清。这种“硬道理”有点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了。

3.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富没有具体交代，而事实上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领导者想方设法提供了方便，大开绿灯。大家都是过来之人，都亲身经历耳濡目染的事实。首先由政府出面，所谓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计划物资极其紧缺的前提下，自由市场议价买卖红火。于是出现了计划物资徒有虚名，高出计划价多少倍的物资敞开供应。那些有权势的皇亲国戚、王子王孙，从上到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力的充分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不见一张批文转转手，一夜之间可以暴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也许是有意识的，“政治上几十年没得到什么，落个不公正的待遇，经济上让他们翻翻身，后半辈子享享清福，（这不讲全部，有相当一大部分）”，眼开眼闭算了。从头到尾，这样开放三年之久，正当的渠道根本无法保证物资的供应，只有在混乱的自由市场上应有尽有，价格恰是昂贵的代价。这个“双轨制”谁得利了？这种不平等的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再清楚不过。而这件事本身造成的危害远不止看的见摸得着的，还有看不见的后遗症，如：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成本直线上升，恶性循环带来的苦果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搞过经济。只觉得“放开再放开”，市场放任自流，价格完全失控，目的很清楚，达到“浑水方可摸鱼”的局面。但这决不是贫民百姓的事，因为他们沾不上边的。农副产品的生产者即使得利也是微不足道，也是些辛苦钱。而真正的物资，生产资料，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钱权交易，他们以各种手段，贪婪的吸着劳动人民的鲜血，窃取了劳动者的成果。

4. 改革以来，封官许愿，为了各自的官位牢靠，培植亲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各级政府从上到下设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庙宇”机构。有庙就得请菩萨，各路神仙“对号入座”，从中央到地方，吃“皇粮”的人数直线上升，这些人呼风唤雨、吹喇叭、抬轿子、发谬论，把水搞混，浑水可以摸鱼。因为他们实在没事可干，闲得发慌，于是想方设法出歪点子，搞点花样，达到标新立异。人多了、机构多了，相互扯皮，文山会海，助长官僚主义。于是出点子公款旅游，“出国风、吃喝风”，到名胜古迹的地方开会，飞机、轮船、汽车、火车，一派“繁忙景象”。中国的老百姓真好，他们又实在太苦，负担太重，养了那么多的闲人，要什么给什么，没有一个朝代象今天这样，有那么多人吃“皇粮”。

我们党历来注重精兵简政，把他作为防止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来抓。然而，改革以来为了某些人特殊的需要，助长了不良倾向的发生。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同历史上难以相比，过去党群、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共产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一呼百应，他们的形象吃苦在先，享乐在后，那里有困难那里就有他们。访贫问苦，关心群众，克己奉公，是群众的榜样。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事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广大党员干部都在群众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工作办事政治动员、思想领先，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党员干部都在群众监督之中，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今，通过“改革”开放，这些好的传统为过眼云烟，荡然无存，为什么？

政府机关人浮于事、机构重叠，是历来反对的。它的后果可想而知，看看事实上的“衙门”难进、脸色难看、事情难办。真正想办事，走正当渠道，可以拖上一年半载，歪门邪道，一办就成。台前台后都在交易，台后的交易比台前的交易更热火朝天，钱权交易更加露骨。宾馆、豪华饭店，天天爆满，高档游乐场所，夜夜盈门。君不见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某一年的请客吃宴，有案可查的开销，就有二千多亿元。

5. “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别”，一个社会，一事物都是如此。我们中国人也只是能同历史进行比较，纵向比较。不错，现在商品比较丰富，想吃什么，都能办到，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不管怎么变化和发展(不讲它怎么得来的)，用句简单的话来说，这是有钱人的社会。干什么事，必须有钱，再难的事也可以办到。邓公曾经讲过，改革开放，“如果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改革的失败。”现在的客观事实将严正的胜于雄辩。

我们现在的干部，他们脑子里有多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待遇远

超过一般劳动人民的收入。在金钱万能的影响下，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现在的干部同过去干部也有质的变化。老百姓有顺口溜，也有画龙点睛的味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四人帮”的干部杀杀冲冲，华国锋的干部老态龙钟，赵紫阳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某某的干部腐败成风。当然，这种腐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逐步由量变而形成。要解决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老百姓总觉得反比不反好，抓比不抓好。从上面来讲，抓是要抓，决心已下，也动真格的，但是太多，太滥。腐败现象，已形成气候，动大手术怕伤筋骨，也就是常言讲：急转弯要翻船。调头得慢慢来，没有后顾之忧。事在人为，只要坚持不懈，措施有力，会收成效。

腐败案例数不胜数，这就是商品经济带来的悲剧。这些人的蜕变，又同我们的政策管理分不开。改革开放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也确实害了一大批干部，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弄潮儿”、“能人”，也得到当政的承认和肯定，他们手中都掌握很大的权力。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全被荣誉光环所掩盖，明明干了坏事，下面已有反映，而上面“不知晓”，反而被奖励、提拔。即使上面知道是干了坏事，因为自己树的典范，或上头的上头树的“旗帜”，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任何事物的演变是由量变到质变，这种变化有个漫长的过程，产生这些腐败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这是有一定气候、温度、适者生存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产物，不是偶然的现象。

总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意识形态等方面来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特色”的内涵。政治缺乏方向，人们没有信仰，于是到处寻找枯神依托，封建迷信四起，不少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带头刮起歪风。经济上泡沫严重，投入大回报少，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内债外债一大堆。老一辈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财富，一点点被败家子蚕食，可谓“子败父财不心疼”。

6. 一个社会或者某个事物，它都存在着是与非、对与错、正与反之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一些理由和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然而，这些事实和例子是不是事物本质的东西，值得推敲。如同一个人在行将就木之前，不是有个假象——“回光返照”吗？这种假象不是好转，而正好相反。那么现在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病入膏肓，如果不动大手术是难以维持的。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的先进性，逐步淡忘或者被取代。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比，今天的社会还存在多少？而战争年代、建国初期，我们的干部、党员能同百姓划等号，可以说同甘共苦，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支部

也起着战斗堡垒作用。而今如何？有目共睹，有好处都是当官的先得，歪风邪气许多都是由官员带起来的。我搞不懂，在极其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确实是大家的带头人。而今条件好了，生活改善了，为什么风气如此的坏，这说明什么？还是个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

不是讲上行下效吗，在任何时候群体的绝大部分是“人随王法，草随风”。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抵制什么，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然而，在所谓“转轨”的名义的下，放弃了社会责任，放弃了领导权。相反的迎合沉渣泛起，早已被抛入历史垃圾堆里破烂，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下，全国一哄而起，名正言顺的为私有制大开绿灯。把原来党的传统，好作风，成功的经验全抛光。带来的后果是百姓遭殃，假货、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行业道德荡然无存，尔与我诈，陷阱遍地，防不胜防。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鼓励支持造假，坑害百姓。为了地方利益，为了小团体利益，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于是地方封锁，人为割据，人民深受其害。

7. 这么大的国家，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怎么能没有计划呢？一味的强调市场经济，而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跟共产党的初衷是格格不入的。一概否定计划经济的人是居心叵测，现在推行的一套不是什么新玩艺。因为共产党人就在打碎旧世界，建设新时代的口号下造反的，在老一辈的艰苦卓越的斗争中，不断总结，不断摸索。尤其在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带领大家在实践中前进，取得世界公认的奇迹。改开后的当权者们，迎合一些人的需要，走历史的老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走老路比较熟悉，比较便当，比较容易，不需要冒险，全世界都有样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是讲“人民当家作主”吗？而大批的工人下岗、失业。“啥人养活啥人”的事实教育，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简单的阶级教育，激发大家的热情。现在没有阶级了，却造就了一批官僚阶级、阶层，他们骑在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侵吞了人民的财富，百姓何以平衡。

叶昌明. 2019. 7. 5. 整理

【本刊声明】**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编校：方惜辰